

目 录

北平和談前的几个片斷·····	张治中 (1)
回忆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集的 最后一次重要軍事會議实况·····	宋希濂 (14)
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戰爭的回忆·····	陈长捷 (21)
蔣軍辽西兵团的复灭·····	郑庭笈 (41)
蔣介石破坏停战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的 实証·····	袁桓楚 (54)
我和司徒雷登·····	叶篤义 (57)
国民党軍隊中的美軍顧問·····	王柔德 (71)
蔣家王朝末日的狐鼠哀鳴·····	萧作霖 (85)
袁世凱帝制活动与粵皖系之爭·····	周志俊 (89)
遇变日記·····	金 梁 (94)
进步党和研究系·····	华觉明 (112)
关于进步党史料的补充·····	陈叔通 (128)
我对許崇智了解的片断·····	周一志 (130)
詐欺取財的万国儲蓄会·····	祝世康 (138)

附注

对《我和司徒雷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进步党和研究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十八辑二三三页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七页

北平和談前的几个片断*

張 治 中

一 忽想退保西北

(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一上台,和談空气显得更浓厚。先是孙科內閣在十九日提出“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为中共所駁斥。李这时发表宣言說:“中共所提八項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談。”但是中共的答复是:等北平解放以后才能决定。我看这情形,和談一时不得开始,就向李請求先回西北一行。他同意了,但說快去快来。照理說,和是我一貫的主张,到这时候我为什么又萌退志?真是說不出什么理由。不过看到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特别是孙閣早已在风雨飘搖之中,李一上台就想改組內閣,以刷新內政来收攬人心,促成和談,他多次表示要我来担任,这是我所不愿接受的。于是我的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的意念更坚决了。回到兰州后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而且打电报連和談代表也辞去了。

記得我是元月底回到兰州的。在这时候对于如何保全西北一事,除了在新疆有相当把握外,宁夏、青海两馬是棘手的,甘肃也得下功夫。在二月七日甘肅省党部紀念周中,我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有长篇的大胆的講演。除了叙述这三年来的和运

* 张治中先生近曾写出近百万言的《七十回忆录》,现将其中第六章第四节《北平和談》的前六段先在本輯发表,题目是編者加的。

經過外，把自己一貫的主張坦白地和盤托出；末后指出我所以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將來也非和不可。這是為將來和平轉變的思想準備，對社會人心具有強烈的安定作用，但亦為少數頑固分子所暗中反對。

自己很想在蘭州安定下來多做些準備工作，但是李宗仁的電話電報是不斷地來催。在李的方面，當時他確實不會答應我置身事外。好些朋友們也以大義相勸：“不管和談成與不成，你既然一貫主和，現在雙方都願意談和，你是不能規避責任的。”我自己也想：此時和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對人民、對國家應有的態度；同時由於自己二十多年來對和平的痴心夢想，使我对當前的和談仍然存了萬一的希望。經過鄭重考慮后，還是接受了李的邀請，在二月二十日飛回南京。那一天，南京氣候異常惡劣，能見度只有二百公尺，雲層既低，又有濃濃細雨。當時何應欽、白崇禧、李漢魂等都到機場迎接我。白還說：“我聽到半空飛機聲音盤旋了半小時之久，尚在替你禱告平安哩！”

二 溪口盤桓

我回到南京后，雖然北平已于元月三十一日和平解放，中共方面還沒有表示開始和談的確實訊息，只好住下來再說。就在這時候，我常常聽到李宗仁的左右很憤慨地在發牢騷，說蔣表面是下野了，事實上還在溪口指揮一切，和各方聯絡，特別是對各地高級將領都聯絡不絕。而李發表的七項措施，特別是釋放政治犯（指明張學良、楊虎城）根本做不到，因而說：“我們管不了，就交還給蔣吧！總統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我看這情形不對，便動了勸蔣出國，以便李放手做去、促進和平，且對蔣個人亦屬有利的念頭。

这事我曾和李和张羣、吳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都表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刚好吳忠信也想去看蔣，我們兩人就一道坐了飞机去。

那是三月三日，蔣还派了蔣經国到宁波机场接我們，轉乘小車到溪口。蔣和我們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說：“你們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經登出来了！”（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說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蔣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現在正在劝蔣出洋云云。事后查詢，却是李宗仁对甘介侯說过，由甘传出去的；但不知道他們基于何种見解而有意外洩或者于无意中洩露，則不得而知。）跟着很气憤地說：“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这几句話把我們的嘴巴封起来了，我們兩人只有先說別的話把这問題攔在一边。不过既然来了，且住下再說吧。

当时蔣住在溪口雪竇寺妙高台，我們兩人也住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天，以后回到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白天蔣和我們逛山水，其余時間就談話。上午談，下午也談，吃飯談，逛山也談，晚上围炉也談，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談，一切的問題差不多都談过了。当时我还作了一个記錄，要点如下：

（一）关于和談限度及代表人选問題，我們曾請蔣表示意見，蔣反問我們有什么意見。我說：“南京方面意見：中共所提八項的第一項，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关于軍隊改編一項，認為应先决定全国軍隊數額，然后研究双方軍隊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編成，並且在三年內分期逐步把全国軍隊縮減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數額，並且确实完成軍隊国家化的目标。我們希望能夠確保长江以南若干省分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領導

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問題，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議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轄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統一。至于其他各項，都可加以考虑。”蔣对这些意見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我們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談代表人选，报上有增請張羣、吳忠信两位参加的傳聞，吳当时坚决表示不愿干。蔣說：“不干也好。”我也表示不愿参加，蔣先說：“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說：“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又彭昭賢、鍾天心已經請辭代表名义，蔣說：“于北方籍的立監委員遴選最好。”

（二）关于党的問題，我們力言年来全国党务几乎已經完全陷于停頓，党的神經中枢亦呈癱瘓状态，如果长此拖延，恐怕会无形解体，应该切实整頓，团結并發揮革命組織的力量，达成新生的任务，对这方面有詳細的分析。蔣对此頻頻点首，并說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何健全本党，作具体詳尽的研究。蔣又多次表示他必竭力支持李宗仁，李現在負的責任就是他的責任，李的成敗就是他的成敗；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認識，才能做到內部的团結。就是希望李、白先从心理上轉變，对他的态度有所改正。最后一再表示他不会再度出山，終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執政。又說今年他当总统实在是一切失敗的根源。

（三）关于外交政策問題，我們拿平时一貫的主张，作詳尽的申述，认为必須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設法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結安定。蔣对这点表示也可以，但一再說对中日

問題不宜忽視，認為中日兩國能够親善合作，不但對兩國有利，對遠東以至世界和平都有利。我們將來可望因此不再受白種人的欺負壓迫，不過目前還做不到——或者終他的一生也還做不到。

（四）關於特殊建議問題，我們建議他對革命的領導方針應該重新鄭重考慮，從今以後，應該放棄和中共軍事鬥爭的企圖，移作政治競賽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分中，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爭取人民對黨的同情，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至於今後國家的體制，當然是實行多黨政治，所以我們可能一時執政，一時在野，絕不能再存那種由本黨一黨專政，或以為以本黨為主體執政能够行之久遠的錯誤觀念。我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應該有遠大的打算，只有實行政治民主化，實現多黨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後中國應走的路向。蔣對這兩點頻頻點頭，但表示：我們雖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區，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可是共產黨是不願意我們這樣的，同時我們也不容易做到，我們現在應該先做最惡劣的打算，即使毫無完整的地區，亦要做復興國家的努力。

（五）關於蔣的出國問題，第一天看到蔣，便被他發了一頓脾氣，我們不容易再開口，以後只得轉灣抹角地从老遠的地方轉到這個問題上來，給他委婉分析，認為他留在國內，無論對大局對個人，都只有害處而毫無益處。談了好幾次，有時一接觸到本題，他就故意談到別的問題去；有時很憤慨地說：“我是一定不出國的！我是一定不亡命的！我可以不做總統，但做個老百姓總可以自由！”有時我舉出事實說明他還在那里指揮軍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孫德操，自己移駐到宜昌去，便說是奉了他的電報，以後孫到重慶便很憤慨地告訴蕭毅肅，由蕭傳了出來。蔣連說：“沒有這回事，我沒有發這個電

报！”后来他的态度比較和緩，只說：“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地来！他們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絕對不能出之于逼迫。”到这种地步，我們不便再勉強說下去，只好留到以后再說了。

（六）关于內閣改組問題，李上台后，孙閣就有总辞职的消息，立法院对孙极不滿意，李也不愿意孙繼續下去。三日到溪口后，我們曾和蔣談到这一問題，蔣表示对孙不勉強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到七日，孙閣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话到溪口和我們商量，提出几个繼任人选，特別着重在何应欽，但是蔣表示不贊成說：“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應該託別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且指出：（1）在准备和談期間，敬之（何应欽字）任行政院长頗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現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繼孙組閣也不相宜。我又以电话和何商議，何对組閣很犹豫，并說：“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我又回过头来劝蔣：“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組閣，內閣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責任推給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蔣仍未同意，問題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到十日我們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蔣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給何，要我們帶去。

由于这八天的盘桓，我們用尽种种委婉的言詞来和蔣談，培养大家的感情，后来蔣的态度就和緩多了。临別还送我們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場上飞机，欢然握別。

三 何应欽組閣

我們回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和顧祝同、白崇禧帶了蔣的信到杭州勸何應欽。何在極為躊躇之後終於答應了，不過他一再鄭重對我說：“你一定要答應負起和談的責任，我才干！”到了這種地步，我也只有同意了。于是何的新命在三月十二日正式發表。

何閣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和談，其次是財政（特別是物價），再就是外交。為了打開中蘇僵局，我主張邵力子先生出任外長，但是邵不願意。不得已而思其次，我曾建議以當時的駐蘇大使傅秉常出任。內閣名單發表後，外間便紛紛傳說：“這是張某人提出的，今後要改走蘇聯路綫了，”各種反對的論調紛至沓來。其實，我和傅只有一面之緣，並非素交，我的建議只是着眼在外交政策為事擇人而已。後來因黨內頑固派的反對，傅也不敢就了。

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共正式發表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和談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聶榮臻做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以毛主席元月十四日“關於時局的聲明”所列八項和平條件為基礎，自四月一日起在北平開始談判，並由廣播電台通知南京政府依據上述時間地點，派遣代表團，攜帶為八項條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舉行談判。這個消息一發表，沉悶的空氣為之一振。而南京政府的和平商談代表團名單（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秘書長盧郁文，顧問屈武、李俊龍、金山、劉仲華）也在这時通過發表了。

四 和談腹案

在中共通知和談地點與時間前，對於如何進行商談，有過四次

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席。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燕外（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

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

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綏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

共軍集結渡江材料及運兵船隊時，得採取自衛行動。

四、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意宣傳。

五、雙方對於間諜之防范及維持後方秩序之一切行動，不受限制。

六、為免除誤會與衝突，除另有協議者外，雙方第一綫交通通信之恢復，應俟另行協議，在停戰期間暫不開放。

七、關於雙方俘虜之交換另行協議。

五 頑固派的壓力

和平虽然是絕大多數人民的渴望，但是近視盲目、自私自利的頑固分子，依然多次從中阻梗，給我們很大的壓力。我舉幾個例子：

“……惟願諸公始終勿忘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安全、生活自由、軍隊國有五大原則，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決；否則苟安于一時，必抱憾于無窮也。……”——潘公展等給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的寅艷電。

“……和談為國家之大事，決非國共兩方可得而專。其在政府，尤須不忘自身之立場，乃為國民大會去歲依據憲法所產生者。苟先漠視憲法而又置國民大會于不顧，試問諸公將凭借何種地位，有何種權力以與共黨談判？本日本會開會，竊認為此次和談，政府應在合情、合理、合法範圍以內，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須堅持者，應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則。至于一切軍隊之必須國有，基本人權之必須維護，尤為天經地義，毫無假借牽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為憲法與政制之任何修改，絕對為國民大會之職權，不容任何人可以越俎代庖。特主張即請政府根據去年國民大會之決議，尅日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以為最後之決

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給李宗仁、何应欽并轉各和談代表的寅艳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須維護，如須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的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以切实保障；(四)自和談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談結果，必須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談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道，准許新聞界自由采訪。……”——留穗立法委員联谊会給李宗仁、何应欽轉各和談代表的寅世电。

“……(一)和談內容，攸关全民利害存亡，况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故和談进行，国共双方而外，宜有民意代表参加，容許双方記者自由采訪，随日公开，以示坦白无私；(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纵可依法修改，而不容任意放弃；自由为国民基本，人权尤为任何政府所当尊重，本会前电所提政治民主化、經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不但为往年政协決議之原則，亦且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此次和談，仍应遵循不变。……”——全国和平促进会給李宗仁、何应欽并轉各和談代表的寅陷电。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談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談进行詳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談判結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和談內容，应坚持下列原則：(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須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須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責任問題应毋庸議。……”——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談話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发給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欽的寅卅議穗午电。

“……(一)在总的原則上，必須將和談與投降界限劃分清楚，雙方應以平等合理為談判基礎；(二)現在華北國軍扼守之各據點，如青島、太原、歸綏、包頭、大同、新乡、安陽等地必須保持，不能以和平為借口而輕易放棄，或有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三)雙方為表示和平誠意，于和談開始應即停止戰鬥行為，並對上列各據點先行解圍。……”——立法委員王秉鈞等六十一人沒有日期和稱謂的來信。

從這些電文中，顯然已看出了頑固派的組織行動，也充分說明了國民黨內部極大多數人不知己、不知彼的昏憤糊塗情形。在那種情形下，給我們的壓力是顯得十分沉重的。

六 再到溪口

決定了四月一日動身到北平去之後，我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去看蔣。這件事，外間傳說有“奉李宗仁、何應欽之命”之說，這是與事實不符的。這事是我自動提出，我的用意是：(1)蔣雖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還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談得到協議也沒用。這是一種現實的做法。(2)那時候，京滬的頑固份子十分囂張，常有對我不利的謠言，溪口之行，我認為對他們有一種鎮壓的作用。(3)蔣當時還是國民黨的總裁，在黨的體系上，代表們除了章士釗外，都是黨員，應有向他請示的必要。(四)在禮貌上說，也有去看蔣的理由。其實，當時李宗仁對這件事倒是並不怎樣同意的。

我在二十九日飛到溪口，三十日回南京，同行的還有屈武。吳忠信是早住在溪口的。到溪口以後，我就感覺到空氣和上次頗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沒露面。當我把和談研

究的大概情形报告了蔣，并把上述“腹案”給他看，他只說：“我没有什么意見。你这次負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談，沒有具体的意見。

这次和蔣談了几回話。二十九日一到溪口就单独談，以后有吳忠信在座也談，三十日离溪口前又作最后一次的談。記得二十九日下午蔣、吳和我，从蔣住的蔣母墓庐由山径边談边走一直走到溪口，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終老是乡。我听了很高兴地說：“总裁这話对和談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蔣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后，我馬上把在溪口时蔣的表示写成新聞稿发表，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請，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当时博得全場不断的掌声。事后朋友們还对我說：“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會議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到四月一日飞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別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員到明故宮机場送行，可以見出他們——至少是大多数人心理的趋向了。

回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 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

宋 希 濂

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把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悍然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蒋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作垂死的挣扎，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

聿明、宋希濂、黃維、李默庵、霍揆彰、孫立人、黃伯韜和劉峙的代表李樹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軍長余錦源等二十餘人，加上國防部一些主要負責的廳長署長等，共一百二十餘人。

會議由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三人輪流主持。蔣介石在會議開幕時的發言，充滿了沮喪的神氣，對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他把兩年來在軍事上的慘敗，完全歸咎於許多戰場指揮官的貪污腐化、貪生怕死、指揮無能。他感慨地說：“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十倍，制空權、制海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斗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最後，他鄭重地警告大家說：“現在‘共匪’勢力日益強大，‘匪勢’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覺悟、再不努力，到明年這個時候能不能再在這裡開會都成問題。萬一共黨控制了中國，則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

會議的头兩天以大部分時間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幾個較大的戰役的失敗，進行了檢討，尤著重於西北戰場的宜川戰役（此役胡宗南部劉戡所指揮的五個師共三萬餘人被消滅）和中原戰場的豫東戰役（區壽年兵團六個師和黃伯韜兵團一部共九萬餘人被消滅）。大家因為知道胡宗南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人，對於他指揮上的錯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說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時任兵團司令）的驕橫跋扈，對區壽年兵團被圍時坐視不救的行為。同時，還演了一幕滑稽戲，說是黃伯韜救援區壽年兵團行動很積極，救出了區兵團的一個師，作戰有功，由蔣介石親自授給他一枚所謂國民政府的最高勳章——青天白日勳章。

會議的第三天，由當時任國防部部長的何應欽作全般軍事形

勢的報告，這是會議期間最緊張的一幕，也是蔣介石何應欽間矛盾尖銳化的集中表現。何應欽的報告的头一段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大肆誣蔑，企圖把內戰的責任推給中共；第二段就懸掛的許多軍事地圖說明各個戰場的雙方態勢；第三段也是最動人心絃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開了兩年來作戰損耗的數字，計：兵員的死傷、被俘、失蹤總數共三百餘萬人；步槍一百萬支、輕重機槍共約七萬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餘門、迫擊炮小炮共一万五千餘門；還有戰車、裝甲車、汽車以及大批的通訊器材和大量的各種彈藥數字，我記不清楚了。他報告的最後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話，因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應欽的報告刚一結束，大家就議論開了，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說：“共產黨在江西時，只有那樣一點力量，打了十年都解決不了他，現在共產黨已發展成為這樣大的力量，這個仗怎樣打下去？”有的說：“陳辭修太可厭，這個仗就是他極力主張打的，胡說什麼三個月五個月解決共軍主力，結果弄得一敗塗地，他應負完全責任。”也有的說：“中國的存亡（應該說是蔣介石王朝的存亡），和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他們決不會坐視不救，美國一定會大力來幫助我們的。”議論紛紛，……總的說來，充滿了悲觀疑慮的情緒，真是連一點歡樂的影子也沒有了。

何應欽為什麼要把這些數字公開報告出來呢？他是具有兩種用意的。第一，兩年來對人民解放軍作戰失敗得這樣慘重，表明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因為軍隊指揮權和軍政大權這兩年來都是由陳誠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蔣介石和陳誠迫使何應欽交出軍政部長，其後又派他到紐約去充當派駐聯合國的軍事代表團團長，既無實權，又無事做，何應欽是極不甘心的。他作這樣的報告，實

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誠的洩憤和报复。

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參謀长(司令是徐庭瑤),蔣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會議。同时蔣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輪流到会,記錄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观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欽的报告和一般情緒的反映,他們立即向蔣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我說:“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蔣介石)气得滿臉紅脹,連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撐着在室内走了許久。”第二天也就是會議的第四天,蔣介石穿着軍服,掛着他自已发給他自已的一枚最高勳章和美国杜魯門总统贈給他的一枚勳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繃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說:“我自黃埔建軍二十多年以来,經過許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終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軍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諱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爭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傾軋。尤其我們这些高級負責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鎮靜,絕不可有絲毫悲观失敗的情緒和論調,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蔣介石这一番話,是針對何应欽說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傾听着,沒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蔣介石繼續說:“对共产党的問題除軍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經濟、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問題是个哲学問題。”我听了 he 这一段話,好象进入了迷魂陣似的,是怎样的一个哲学問題呢?以我这个仅具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人，向來把哲學當做一門高不可攀的學問，蔣介石打了敗仗，為什麼扯到哲學上面去了呢？蔣介石在發言中既沒有說出他自己的哲學是什麼？共產黨人的哲學是什麼？也沒有說出對付的方法，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後，蔣介石說：“現在我們在軍事上，海空軍占絕對優勢，陸軍還有幾百萬人；在經濟上，有九億美元的基金，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物產豐富，糧食絕無問題；國民政府仍然統治着廣大的地區，有眾多的人力可以征調。就总的力量對比來說，我們要比共產黨大過許多倍，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賊易，去心中之賊難’，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並講了一段大漢奸和封建皇帝的奴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掃平太平天國及捻軍的歷史，勉勵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負起削平大難，挽救國家民族的重大責任。”（即是要大家為挽救四大家族的國家去奮鬥。）

會議的第五、第六兩天，多為參加會議的人的發言。那些人說了話，內容如何，我記不清楚了。但有一個总的印象，就是幾乎所有發言的人，都是申訴本指揮單位處境的困難，向國防部要求增加部隊，要求新成立部隊的番號，要武器、要新兵、要軍糧、要器材、要車輛、要彈藥，……總之一句話：全是困難、危險、叫苦。

我也在會上講了約二十分鐘的話，除了簡要地報告新疆的情況外，我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我今年由新疆兩次來南京，路過蘭州、西安、武漢等地，會見過不少的軍官，他們都說對共產黨的仗很難打，前方部隊充滿了悲觀和厭戰的情緒，幾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為什麼要打這個仗。師出無名，怎能鼓勵士氣呢？（二）現在幾百萬元法幣抵不上一塊錢，而物價仍然不斷飛漲，幾乎是一天幾個價錢。弄得老百姓叫苦連天，人心惶惶，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一天

一天地減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設法穩定物價，安定人心，又怎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三）由於物價飛漲，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飽、穿不暖、面黃肌瘦、精神萎靡，許多中下級軍官每月所得，不能維持其家屬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殺者有之，姦淫者有之，棄兒鬻女者有之。這怎能維系軍心使之殺敵致果呢？總統說，現政府還有基金九億美元之多，我建議：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費一律改發現洋，每人每月叁元，將校尉級的薪金也改發現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過三十元，借以維持官兵們的生活。”我的發言尤以我的建議得到了與會者許多人的同情，孫立人、黃伯韜、李樹正等在發言中都支持我的意見。

會議的第七天也是最後的一天，由參謀總長顧祝同提出一個戰略方案，原文記不得，大意是這樣的：為鞏固長江以南地區，防止共軍渡江起見，應暫時停止戰略性的進攻，將現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地區的部隊，編組成為幾個較強大的機動兵團，將原有的小兵團概行歸并。這幾個兵團應位於徐蚌地區、信陽地區、襄樊地區，其主要任務是防止共軍渡江，並相機打擊共軍。在長江以南地區迅速編練第二綫兵團。這個方案獲得了全場一致的同意。這個方案也就是國民黨反動集團企圖作垂死掙扎的方案，但很快地被偉大的毛主席軍事思想徹底粉碎了。

閉會後的第二天下午七點，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勵志社宴請參加會議的人，蔣介石又講了一些打氣的話，並散發了一篇題目叫“為什麼要剿共？”的宣傳印刷品，他叫大家帶些回去對官兵講解。這篇東西的內容仍然是什麼“共產黨是不要國家民族的，共黨是蘇俄的第五縱隊，共產黨人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產公妻……”等等的陳詞濫調，想以此來迷惑人心，鼓勵士氣。這個中

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和最凶恶的暴君，早已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空前孤立的地位，他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我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我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他对我们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早已证明无用的他那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我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我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我们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我们送走。我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这个蒋家王朝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由于自己没有决心跳出火坑，又不知追求真理，投靠人民，仍然走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这说明我的思想是多么顽固！我的行动是多么愚蠢呀！

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

陈 長 捷

从来华北各軍閥的火併混战，乃至几度帝国主义侵略入犯到津沽地区，都止于津市卅余里以外，或者也只扫边而过。而我抗拒人民解放軍，竟把这华北唯一的有百余年历史、拥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工商业大城市，构筑为設堡障地，将战火引入市内，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毁灭而不顧。我对人民負着严重无比的罪过，死有余辜。如今觉悟，无限痛恨！虽感党和人民的寬大，内心疚痛，終难自己。茲将当时情况分述如下。

一 傅作义給我的反动任务

傅作义接受蔣介石的“华北剿总”命令，经过易县涞水之役，潰丧了他所恃为“精悍”的三十五軍后，鉴于解放軍的野战威力，采取了集結部队于平綏、北宁鉄道綫区的措施；将张垣、北平、天津作为三个基点，以及鉄道綫上必要的城市，預行工事設施，以为依据，实践所謂“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

一九四八年六月从兰州（当时我任第八补給区司令）調我来天津，以“警备司令”名义，負天津基地之責，主要筹办两事：

（一）改建并增強天津的城防工事，（原来是孙連仲战区指揮所上官云相同天津市长一年前所筑）为設堡強固障地。

(二) 征津市壮丁，編成“警备旅”(等于三团制师)作經常守备，以便灵活調度駐防在津的部队。

以上两事，限于三、四个月內完成。

二 沈阳解放后，傅作义考虑的动向

是年九月初，济南解放，十月底东北完全解放，傅軍在华北更为孤立暴露。无论华东、中原解放軍的北进或东北解放軍的入关，联合起华北解放軍，都要形成绝对优势。(当时傅所指揮的連杂編的护路旅、保安团以及后勤部队，不逾五十万。)对此形势再不容排成一綫，必須集結一头去，策定根本动向。計有三条路綫：(一)傅內部属于察綏系的，傾向西去，保察綏基地。但不能帶动所謂“中央軍”，尤其不能和馬鴻逵合作，沒有后路。(二)蔣介石以徐海在危急中，想放弃平津，免蹈辽沈复轍；給傅以华东全責，依青島为后路，尙图挽救淮海危局。(三)美帝以司徒雷登通过胡适等的呼喊，要以軍火直接給傅，就須东靠，死踞津沽海口，扰乱华北。十月后，蔣介石两度到北平，顧祝同(当时的參謀总长)、徐永昌也不断到北平，和傅的一度飞到南京，都是为討論这等动向。終于傅傾向于“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的向东靠，以观望形势。对蔣表示尙能保持平津，支撐华北；为蔣介石所首肯，更为美帝所奖励。当时蔣介石支持平津的措施是：

(一) 将华北的“党”政和經濟(連中央銀行的支付权)付与傅，表示对其信任，叫傅直接接受“美援”。

(二) 編成渤海艦队，派到长山列島筹建基地，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三) 派后勤部工兵署署长到平、津、沽間，設計“陣地网”。

三 顧慮東北解放軍入關，所作的準備

傅作義決定堅踞平津、主力保持海口的策略後，我曾和他談到最可顧慮的是東北解放軍的入關。但估計經一度大會戰後，需要一時的休整，從戰爭史實看，都得三個月以後才能舉行一次會戰。現在東北解放軍要消化遼沈的大戰果，從事擴展，或者需要半年才能再作大舉。當此隆冬嚴寒，難作遠程；預計到明春化凍後，應準備一場大會戰。最高估計，東北解放軍進關，至多為五十萬人左右。因此在量上要爭取平衡，急速擴軍；應即接受美械，在三、四個月時間內，增軍廿萬左右，以應付明春的決戰。這時傅的腹案已決定放棄張垣，逐步轉移主力到津、沽、芦、唐近海方面來。他的措施是：

（一）再加強平、津的城防及塘沽的港口工事，派出副總司令宋肯堂，組織工事督導列車，活動於北平綫上，檢查津、塘工事，并督導沿綫上據點工事，和平、津、沽地區陣地網設計相配合，連成基綫設備。

（二）部署九十四軍于楊村，六十二軍于芦台，八十五軍于唐山，九十二軍于塘沽、軍糧城，八十三軍（青年軍二〇一師改稱，從北平移來）于北塘、塘沽。又將兩護路旅（一個從唐山，一個從北平）配置于天津到廊坊和天津到馬廠沿鐵道綫上。占好天津、塘沽、唐山三基點相犄角的形勢。

（三）把張垣的私家當（如小兵工廠和一些經濟組織）和在那里的軍政眷屬（約三千多戶，孫蘭峯的眷屬也在內）移來天津安頓。

（四）命河北主席楚溪春和保安司令陳光斗急編河北保安團，從所轄的幾十縣里，每縣編組一團至兩三團，發械升格為正規團，

加紧动员扩张,作为第一步扩军廿万的计划实施。

(五) 傅总部准备从北平西郊移来津市,已经派总务处长到津选定津市图书馆地址,安起各项通信设备。

以上设施,待张垣的家当移净后,傅的基本“实力”三十五军(重整的)、新三军、新四军,也就要移来津市和津、沽、唐三角地区内控置。可能只留八军、十六军、十三军在北平和通州方面,交李文兵团司令负责。塘沽海口叫侯镜如兵团司令负责。傅自己来津坐镇,指挥全局。察綏的骑兵一部委给董其武向綏区去。更事征湊察綏杂部,强行河北的大力扩军。

四 出乎意料所不及的

我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同情于保持海口,支持华北反劫局面,牵制华北解放军不得加注于淮海方面,争取时间大事扩军,增强傅系势力,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夏间,于平、津地区对入关的东北解放军来一次华北大会战的。自负还“不弱”,可争以主待客,以逸乘劳的“优越”,争取“胜利”,扭转孤立局势。即未能取胜,但依设阵的收容、海口海军的支援,还可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和蒋军结合。但出乎始料所未及的是:

(一) 淮海蒋军竟然那么快地被消灭了。

(二) 东北解放军就一步不停地于解放沈阳后(十一月二日)长驱入关,且达八十多万人之多,那么神速强大;又先趋于张垣、新保安方面。

(三) 傅作义竟勇于捐弃新保安,令在那里的三十五军,强行突围西去,动摇了迅移主力于津沽集结的原计划。他把新三军、新四军推向怀来以西还不够,连已经部署好的九十二军、六十二军也

調度于南口怀来方面，翻为“勾相联系，稳步东移”，一时“权宜灵活”的应付。这正是落入解放軍环中，把三十五軍、新三軍、新四軍他的基本得力的十多万本钱喪光；使得唐山、芦台、楊村空虛了，塘沽、天津暴露出来，置于解放軍的直接攻围之下。

如果解放軍对于张垣、新保安的三十五軍，不是作“围而不即击”的神妙运筹，而是可能的迅击解决，在傅仍保其新三軍、新四軍的基本軍，則在平津的其他各軍亦不会被牽連出去，重点尚可在津沽，傅的指揮中枢也会立即率同他的基本余力到天津来的。

五 贖贖地負隅

我总是对解放軍估計得低，既对东北解放軍的猛进入关，尚在贖贖中，而自己的反动劲又甚狂妄。傅系基本三軍复沒于新保安、怀来間，傅犹极端秘而不宣。当时天津附近駐軍被調一空，我在事先是一无所聞，只余九十二軍一个待整补的殘师，和新編起的尽是強征街道居民編成、还不会操枪的所謂“警备旅”，又两营宪兵、五个市公安局所屬的保安大队。

十二月二日夜，我正和副司令秋宗鼎談到：傅总部为何尚不詎各部队安定下来，爭取大冻结前完成要点陣地网工事，而急調大軍西去，对摸不着的解放軍作非必要的局部会战。正难为解释中，总部參謀长李世杰来電話說：“空軍情报，有解放軍一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向天津方面行动中。傅传令叫你紧急布防。”問：“用什么部队布防？”答：“急抓吧！現从南口調六十二軍当夜火車急运去津。”那时除了鎮定并以警备部队，警戒市的东北区、城防綫外，也别无可处理的。三日早晨六十二軍林伟儒軍长帶了两个师，通过鐵路到来，其另一师（一五〇师）到丰台，临时被傅总部留下，

但是当夜丰台即被解放军袭击，下車接受临时任务。震于不知解放军从何方突袭而来，傅总部也仓皇从北平西郊向城内移退。调到怀来、南口的各军，撤得还快些，来得及回到北平。廊坊路断，单独林军的一五〇师，也不敢窜过来津，就都归于北平的防守部队序列了。

六十二军是广东系的老部队，经过对北塔山战役的很大损失，整理为两个师（一五〇、一五一），此外还有一个师（番号记不得）是以新编的华北各团队凑成的新部队。林伟儒急盼他的广东部队在一起而不可得，以不相习的两师在他指挥下应付紧急战局，感到十分为难，不得不勉强以天津的河北（金钢桥以北地区）地区作为阵地，把他的基本得力的一五一师放在那里。

五日，八十五军由刘云翰军长从芦台带来，亦只两个师（另一师，尚未编补，该军的师番号都记不起）。

当日傅作义在北平，为应付紧急的局势，决定“分区坚守”，颁布命令：

（一）天津防守区：配置六十二军（缺一五〇师）、八十五军（两师）、八十二军的留津一个师（番号记不得）为主力，另附以两个护路旅，两个河北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儒为副司令。

（二）塘沽防守区：配置八十三军、九十四军、又交警一个纵队，以侯镜如为防守司令，段云（八十三军军长）为副司令。

以上又合天津、塘沽为一个津沽区，使互相支援，以侯镜如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用意是保持海口，贯通两处交通，也判断解放军将先攻海口塘沽方面）。

（三）北平防守区：这时八军、十六军、九十二军（缺一师，在津）和从承德撤到通州的十三军，以及被留在丰台的六十二军的一

五〇师都撤到城内去配备守城，名义是李文兵团司令为防守司令，实际是傅自己直接指挥的。

三区的兵力比较起来以北平为充裕，形成重点所在。傅不会再来天津是很明显的。而侯镜如对天津部署亦不肯负责，仅派一个参谋来联络了解。

这样的仓皇分区设防，是不得已的临时应付。傅的自己“得力”部队搞光了，再无可控置活动的部队。各区在形势上也不能相互支援。徐海情况日趋危殆，蒋方更绝无余力来增援。据守各区有什么目的？无非是无路可走，缩到一个设防的区内，图一时的苟全。也知道“政治洽商”为必然的倾向，不外要以顽强的抗拒，把牺牲人民作“要价还价”的条件而已。我还期望于傅作这种适时的活动的。为了给傅以可恃为活动的基础，就尤其以为应凭恃天津的复杂“险固”地带，作“较长期”的顽强据守。

六 蒋介石的指示

蒋介石对天津军务交付傅作义统辖，在东北解放军入关前没有干涉过。辽沈会战开始，蒋亲去沈阳、葫芦岛指挥时，两度过津，曾看到“高碉林立”目标显露，认为对于已有炮兵、战车能攻坚的解放军并不适宜。我告他说：“这是孙连仲时期上官云相所构筑的，现在新的城防工事已不加应用，亦不拆毁，留以迷惑一般，更隐蔽起新的工事。新的工事是很秘密的低的碉堡群，在二百米外是窥不出来的。工事绕以大而深的壕沟和铁条网，必要时布以地雷，是三线纵深的设堡阵地，犹在不断加强中。”旋即就实地指点给他看，他才“啊！啊！”地首肯；立时又再三叮嘱，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特别注重军机秘密。他痛骂了王耀武失守济南败坏鲁局，以

及孙連仲冀中的失敗，都是內部參謀作了“匪軍”的間諜 沒有察覺，而完全泄露了軍機所致。同時他還說明他的親臨東北、華北面授軍機，調度部隊，並不通過“國防部”三廳，至多是侍從參軍臨時傳達意旨，都為的是要極端慎重，保持機密。

當傅作義報告實行平、津、塘分區防守布置時，蔣介石認為津、塘兩區兵單，不如并到一區，以固守海口為主，派副參謀總長李及蘭和參軍羅澤凱持他的親筆手緘飛來天津，分致我和各軍長，鼓勵我們協力堅定固守，抗拒解放軍，對各軍長叮囑他們要服從我的指揮。這函是同樣投給塘沽區和北平區的軍長以上人員的。對於放棄天津，并到塘沽去的意旨是命李、羅作口傳，商酌實際辦理。李、羅兩員經市長杜建時招待，我集合軍長到那里共作商議。六個人會商了一夜，認為這個并區保海口的意旨是正確的，但時機已不許可；軍糧城是津沽間的要點，已被有力的解放軍截斷，津西南據點“灰堆”業經失陷，海河南側通“東大沽”的路亦被堵塞，海河北路的“東局子”機場已受到不斷的襲擊。兩軍勉強突圍只有側貼河邊的一條路，士氣是不好的，將要自相阻塞，立見復滅。鑒於東北大凌河轉進的復轍，兩軍長都不敢勉強執行。我是關切着北平方面傅作義的處境，和天津尚有許多軍儲。在我離開天津很可以卸責，但將更置北平于死地。也感到如果徐海完蛋，蔣方為了解救南京的威脅，還要再撤去塘沽部隊。當夜我幾次以電話向北平請示，傅無表示，以“待考慮考慮”作答。這個不指示等于已指示，我能領會。我當時的決心是一切應為傅負責，實踐他沒有變更的命令，不嫌兵單，還特“陣固”，為北平免于孤立，以後好隨北平的局面同樣轉變，也為避免轉移中一下子的被消滅，就決定堅守下去，不實行突圍。

七 設備部署,絕望的希图

天津市区是东北和西南偏斜的长方形,南北廿五华里,东西窄处尚不及十华里。经过傅总部指示,縮紧构筑的周沿城防工事綫,达九十华里,間隔着海河、永定河、运河,分成河北(金钟河、运河以北)、河东(海河以东)和市区的三个方面。西北和西,亘于南和东南,地面低洼,河渠交错,形为河网与泛滥区;只东及东北方較平坦,来攻者可以展开大的兵力。对此設成三带障地,虽未完全达成原計劃,配以临时野战工事,已經基本是設堡的坚固障地。以为来攻者非經“很长”時間,构成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強攻急袭摧毁的。但有个矛盾,实际可用的兵力和三带設備是极不相称的,能就守区作战的仅仅是五个师(还欠一个团)。警备旅是新兵,兵員虽足,不能作战,只可和宪兵、保安队用以监察和维护很复杂的市内治安与交通,防范人民的“异动”,不能担起核心的守备。最負累的是从东北潰散入关的游勇,到处騷动扰乱,为数达到五、六万,超过作战部队,既不能受編,又极影响士气,还得派部队予以監視。其它后勤和留守杂部,并各处很多的伤病兵也达万許,傅系眷属三千多家,穿着軍服护理的随从,亦近万余。所以津市最后解放时,反动官兵竟达到十三万众那么多。

当时天津两軍的配备情况如下:

(一) 刘云翰的八十五軍在河东区,从民族門亘于津东南的海河岸上,指定一个加强团踞守着障前的“东局子”营房(前美軍营房子)大据点(是死守,而不是前进障地),重点在民族門方面。

(二) 林伟儔的六十二軍在河北区,接民族門以北,北宁总站

亘于恒丰紗厂至小西門运河地区，同样以一个加强团踞守“北站”前的“宜兴埠”大据点，軍重点保持在小西門方面。

(三) 九十二軍的师(大約是九十四师，还缺一团)在津西南区，接小西門以南到南开一带，重点接近于小西門方面。河北保安团踞守“灰堆”据点，靜海保安团活动于南开前方，警戒泛滥区，均屬該师指揮。要該师掌握一个正規团做机动应用，以該方不是受攻方面，尙准备急編游勇成师来接替，騰出該师作机动之用。

(四) 顧慮到陣势的弱点，在民族門和小西門要遭受东西的夹击截为两段、瓦解了陣綫的体系，特指导两軍軍部接近于該方的第二綫上，并控置有力的部队，以作准备。

无奈两軍都感到兵力不敷配备，勉強保持了两綫的縱深，至于第三綫，則預想靠集結到北仓、楊柳青的两个护路旅和在南开、減河地区的靜海保安团，适时撤回作为控置，希望能保有三、四团的力量。

炮兵是准备多处陣地，活动集中火力，由警备副司令秋宗鼎統一指揮。两軍各有榴弹炮、山炮各一营，另有九十二軍留守的榴弹炮八門也加入。到处有大楼，得以制高观察，应用集中火力，尙称方便。

弹药、粮食相当充分，照明器材、通信設備也多而方便。平、津、塘間，有无綫电话和埋綫电话，随时連系。加紧大造地雷，日可得三千顆。因此視為配合泛滥水网(是市长杜建时督同工务局所筹办的)，可以坚守三、四个月，以觀时局的变化。但深晓得走头无路，孤点絕无外援。(北平方面即是突围来合，相隔二百四十多里，也将同于东北大凌河廖耀湘的复亡。塘沽力单，稍支出一部援津，

海口立見危殆。当时徐海形势已見分晓,只有塘沽守部被蔣撤走,絕无蔣軍海运来援的可能。)

从来即是要塞孤守,沒有不終于陷落的。我們之所以犹作困兽之斗,实因軍閥派系观念,认为平津一体,要待傅作义来解决,否則要影响华北的“政治問題”。看到傅招邓宝珊从綏飞平的消息,早已知道邓和解放軍有联系,认为傅已在向解放軍謀求和平的“政治解决”。当天津战事日趋紧急时,傅总部參謀长李世杰頻传傅作义指示:“坚守就有办法”,体会为很有含蓄的命意。我一本軍閥混战习惯,以能頑強相拒就是用来討价出售的本錢,一点沒有想到人民的利益,一意在軍事上为傅負責到底,很“自負”地要坚持到粮尽、弹竭时再說。曾向受愚蒙的官兵作狂妄的宣达說:“这样堅強的設堡陣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創造战史上的伟迹,我們現在傅总司令的指揮下,也必要坚持胜利。”这样激励軍心,要他們拼死恶斗。

也还要两套准备:恶斗是基本的,和談是为拖緩对方进攻的阴谋,那里肯放下武器。軍閥的想法有部队有武器才是本錢,妄想人民跟前私图出路。处在围城中,当时市參議會議长楊亦周,和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頻来詢問局势,仍告以听傅主持,并举邓宝珊到平,看出平方已在談判中;平津是一体,傅不会置津市于不顧。託他們派天津市銀行經理(忘其名,在綏和傅曾有关系)代表飞平(当时市内跑馬場开辟了小机场)向傅請愿去,但終未得有明确的回报。

八 战斗經過——宜兴埠一炬的罪恶

十二月二十日,外围的激战开始,“灰堆”据点在一个夜間就經

解放軍襲占，保安團團長以下全部被俘。布了許多地雷，也沒有起一點效用。在楊柳青的兩個護路旅，經一日夜激戰後，余有一團撤回市內；在北倉的一個旅經解放軍一夜猛襲，潰亂得零散不堪，收容起來還不足一團。靜海保安團尚在滅河地區對解放軍炮兵的占領陣地作了很大的妨害，終于被驅回來。另有個寶坻的“還鄉團”也隨護路旅退入市內。對這些地方團隊，既要利用它作戰，又顧慮它起內變（據說灰堆是因河北保安十團內部事變而陷落的），都把它收槍而重新改編在收容回來的護路旅內（護路旅的干部是傅總部教導團逃編的），作臨時新編師，置于第三綫工事上。在西南區九十二軍那一師方面，由于“灰堆”的失落和前方靜海保安團不能立腳，也受威脅，不能以重點支持“小西門”方面即將發生的劇戰，就強迫關外流入市內的游勇（多選“雲南”籍的）再急編為一個新師（為的收容滇籍師長以下的不少軍官）。軍械庫存尚有余，因而能夠急就。不少反動滇籍軍官也受到利用，暫時作為總預備部。“小西門”一接火，又把這個師加到它的西翼來縮短林軍的陣綫，加深它的纵深。

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鑒于“北倉”、“灰堆”外圍據點的孤立，輕易就被解放軍摧毀破滅，他為“宜興埠”據點之團擔心。又以他的基本一五〇師留北平不得歸還建制，感到主陣地兵力不夠用，以為“總站”和“小西門”雙方都要受攻，再無能顧到“宜興埠”據點，就撤回那個是一五一師派出的加強團，作軍的預備部隊。他怕原來陣地為解放軍所利用，作為進攻“總站”的根據，令該團撤出時加以破壞。原指的是工事而言，那知該團長竟然是縱火焚村，給千數家人民造成嚴重災難。我尚無所知，杜建時來告，同為驚愕，電話問了林軍，才明究竟。雖然嚴斥了林偉儔，而未將那個罪惡團長置諸

軍法以平民憤，我亦負有嚴重責任。趁解放軍尚未進占宜興埠時，責成林軍迅即搶救，市消防隊全數出動，收效也不甚多，造成一笔莫大罪債。我曾對杜說：“這不同于長沙大火嗎？還‘防守’什麼！”杜當時還強慰我以“軍務為重，急籌善後！”那也就是援照傅作義所宣布的“布設城防陣地、撤除民房的賠償辦法”，會同杜出了布告，由市府撥款“賠償、救濟”。結果軍事日日緊張，災民也乏人顧視，就又等于空文“口惠”而已。

同林偉儒的處理相反，八十五軍軍長劉雲翰認為“東局子”營房據點的重要而又堅固，遮蔽着接近主陣地的要害，能堅持該點全綫，就都可保安全。他特別加強該點的配備，並從主綫增加炮火，作強力的支援。這還是他所見特到之處。但這樣的設陣配置思想，對着特具攻堅威力的解放軍的英勇強戰，又屬枉然。八十五軍舉其“精萃”力量用在“東局子”支點上，只經解放軍一日夜的猛攻強襲，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沒起作用。團長戰死，一個大團干淨滅亡。只逃出一個營長是半死的，他在堡內，被解放軍戰士塞進爆破筒，震死復蘇後爬回本陣地，成個不能言語的啞子，寫了解放軍攻擊迅猛、穿插入陣、爆炸各堡的大略。這使得原來軟弱的劉軍（是杜聿明關外所編的地方團隊，劉接收過來，才改換了裝備，從未經過大戰）就全部喪胆了。

一九四八年底，外圍各據點已經解放軍掃蕩干淨，全陣綫處在圍困中，如同瞎子般看不出解放軍的調度。但從楊柳青、東局子的受猛攻和解放軍炮兵重點針對這兩方，臥出小西門和民族門將受猛攻，而對小西門的顧慮更大，但還沒想到會一下子就被突破。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陣綫各處都有不斷的接觸，河北和小西門地區起了激戰。在解放軍的一虛一實的迷惑作用下，林軍竟將

控置的有力一團推進于河北地區，恢復一五一師建制，置于無用之地，而呼籲縮緊小西門陣地綫的配置。

小西門戰鬥日緊一日，蔣機曾有兩次，每次兩架轟炸機乘夜從青島飛來，在小西門、滅河間找出目標進行轟炸，擲彈即去，不敢參與地上作戰。

小西門初戰，曾有解放軍一個突擊隊插入林軍陣地網，大約是偵察隊的過分勇猛深入以致被擊滅，林軍那一師防守的部隊得了“尖刀隊”的旗幟，視為“珍重”的戰利品，從事宜揚。一時虛驕之氣大作，而不知滅亡即在眼前。

十日解放軍的攻圍部署已經完畢，炮戰更趨激烈。解放軍戰士從一點、一點的地堡，逐步、靈活地迫近陣前。反動守軍日夜放射雨一般的機關槍火傾倒陣前，以壯孤胆。其實是虛耗彈藥，要想制止解放軍已不可能。由於小西門的不停地激戰，東局子的被猛攻陷落，已看出受攻的重點，將是在小西門和民族門的東西兩方面。解放軍的重炮火更多傾注于小西門的“西頭”一帶，並有戰車活動于運河自來水廠附近地區。當這緊急時期，請求青島的飛機來助戰不見答應（正為應付淮海的危殆，而不遑顧天津），就將護路旅所改編的新師，推進于“西頭”方面，支援小西門。當小西門激戰中，林偉儒恃着新師的準備援應，仍忧虑到“河北區”的孤立突出，將所控制之團（一五一師，有力之團）交給該方師長使用。民族門方面，除了炮戰，只見解放軍的小部迫近，逐步奪取劉軍陣前的小支點，在構成地堡、作攻擊準備中。

九 拒絕和平解放的通牒

十一日接到解放軍經由民婦展轉送來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

諜，是分致各軍長，同時收到的。即夜約杜建時（他是軍官出身，和蔣介石的關係較密切）和兩軍長到部會商，開始是各懷鬼胎，以目相視，默然無語。我先持出來諜給他們看，他們也同樣持出函諜，這才開始敞開談話。劉雲翰是蔣介石、陳誠的“嫡系”心腹，對戰事雖然懷慮，他那一軍更軟弱，但仍默不做聲。看杜、林和副司令秋宗鼎（是蔣的侍從室參謀派任的），又都囿於特務的監察，有所欲言，而又吐吐吞吞，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願意談判，無非為的緩攻、觀望而已。

來諜限至十二日晚答復，說明十三日以後就要開始全綫進攻。當由秋宗鼎執筆起草答復，大意是：“為了津市免于糜爛，可以商談和平，要解放軍派負責人員來商談，并表示放下武器有為難處。”這就等於拒絕來諜的指示，由杜找了參議會的两个回教參議員送去。當時也不知解放軍總指揮部所在的方向，從南開區出去瞎摸，作為應付的公文，料定不會得出什麼結果。但也認明解放軍即要實行總攻，大家表示堅持踞守，等待北平傅作義主持全局的動向。這一段經過，自然立即報給傅總部。得到李世杰參謀長的回報，還是那句：“堅定守住，就有辦法。”

林偉儒曾經天津師範學院院長張般若以詩諷示他考慮時勢，走光明道路，但他沒有動心。處到臨頭，如果他有所表示，那或不是這樣斷然拒絕來諜。林偉儒認為自己基本的廣東部隊，一師被隔在北平，嫌無實力不起作用，在下意識地搖擺着，只時常問秋宗鼎：“怎麼辦？怎麼辦？”不敢道出衷情。大家各不互信，防着特務的耳目。蔣在各軍和軍事機關都置有從“侍從室”直接派出的所謂“視察官”，參與一切軍務與軍機，時時向蔣直接通電報。對天津防守的當時，就派來“視察官”叫程子踐，作戰中每夜匯報情況，指導

軍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謂“电务員”的执着密碼本在監察他。蔣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更是很多方面的箝制。这一种特务恐怖,也懾伏了反动部队长,使其迷惘不省。

十 不得不放下武器

十三日拂晓,全綫受到猛攻,小西門一度突破,投入新編師和九輛裝甲車(非坦克,是汽車改裝的)进行反扑,到晚是堵住了,但沒有奪回原主陣地綫。到十四日解放軍再行攻击更为猛烈,小西門区成为主力爭奪战地,小西門終被突破,几处被插入,扩展到“西头”市区里来,开始了巷战。

河东区、民族門方面,在十三日尙无严重的激战,解放軍已步步逼近,将八十五軍陣前的层层小据点,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毁灭。刘云翰想拒敌于陣地外,却无准备反击的余力,他的計劃又破产了。到了十四日午后,民族門的主陣地,經解放軍的一陣猛攻之下就被突破,刘軍再无力堵击,听任解放軍直插到金湯桥,就形成和小西門西头方面的呼应夹击,截断市区交通、瓦解整个陣綫的体系。河北区始終无激战,但有力的一五一師貼在那里,想放弃河北区,撤回海河以南,反击金湯桥侵入的解放軍。指导下去又未能实践。林伟儔这时才派他的參謀从河北区出去向解放軍接洽“停火”,也同时向我說明,为了緩和危势,調整陣綫。刘軍方面,也經作同样的措施,这是一种梦想而无济的。十四夜里,巷战愈形激烈,抽不出可应付的部队。又集两軍长同杜建时到部作最后的会商。刘云翰才变易其以前虛囂的习气,而靦覷地报道失陷主綫无力反攻,表示了歉意。至此,第三綫是不能也无兵力可以站住的了,再打下去是“分区的核心战”,无非頑抗到底,牺牲到底。大家都已認識到解

放軍战士的英銳威猛，沒有攻不開的核心堡，支持時間亦不會太多。提出所謂“核心守備”問題，估計兵員，除了兩軍部和總部的特務營、工兵營，再無可用的兵力。各區被分割開的小部也都無斗志，步步將被瓦解破滅。到此沒有外援可望，多堅持，地方多糜爛，而無救于戰局。大家觀點均同，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決定放棄“核心抗拒”計劃。如何接受和平？還見不到林軍自行派出的參謀的回報，即着由各部前綫徑自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實現和平。

當夜林偉儒回去河北，到金鋼橋就被解放軍隔住，予以狙擊，林便和劉云翰一塊走了。十五早七時許，我正在以無線電話和傅作義詳報主陣綫突破後，巷戰發展、核心戰無力繼續以及夜里會商經過。傅作義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這是天津受圍開始和傅作義親作交談的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是他在無線電上得到解放軍宣布捷報“突入天津市”而震動關心，由傅那面向我急通的無線電話。我和傅通話尚未完，一個解放軍的副營長只帶幾個戰鬥員，已站到我的後面了。我就是這樣受解放于我的指揮所地下室裏面的。

十一 幾點認識

（一）為蔣介石反革命、壓迫人民的不義戰爭作垂死掙扎對抗，不見機覺悟、起義反正，即逃到天邊海角，遲早是一道滅亡。為封建派系保全反動勢力，危害人民，任何凭托堅陣，就更快被壯大解放軍一舉圍殲淨滅。天津戰役的事實就是這樣的說明——“反動派必然滅亡，人民革命軍無敵于天下！”。

（二）毛主席策劃戰略指導作戰的正確適切，達到掌握敵方使之聽命調度：

(1) 沈阳解放立即发动东北解放军入关，使蒋介石不得转移和调出华北部队策援徐海，也不给傅作义以扩军余暇。

(2) 进军不先截住，围着张垣新保安，则傅作义的主力军将可能尽移到津、沽、唐的海河三角地带负隅，而引进美帝的支援；几倍大军围住新保安了，即把三十五军立刻给以消灭，则傅作义还要急于东向，不会迷惘地动摇已部署到津、沽、唐的计划。相反地，暂援新三军的灭亡，就使傅作义听调度。因为他不肯捐弃基本部队，不但尽掷出新三军、新四军的本钱，更大驱各军西向，作所谓“连锁勾移”，送了更多的本钱。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中外古今战史所未曾有。傅作义不是搞光他的基本三军的本钱，即不在津沽负隅，将尚恃有本钱从海上逃往江南依蒋，有如白崇禧带领皖中桂军向两广扰乱一样。所以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也指导了傅作义又走上光明前途而保全了北平。

(3) 截攻塘沽海口，关起门净扫华北反动军是重要的，已和进军张垣同时进行，并开始攻战中。从地形观察上的反映，海口一片盐滩，一毛不长，既无遮蔽又不克筑壕进迫，在海军炮的肆意轰击下，损害将是很大的。因此立即灵活地指导：改为“监视塘沽先攻天津”。本来北塘受攻时，天津已适应侯镜如的要求曾调一师出为策援。如果解放军未转以大力进围天津，则正合蒋介石的“舍津固塘”的意图的实践，就要从海上逃走更多的反动军。傅作义频频指示天津“坚守住就有办法”的命意，犹在陷落死坑里“讨价还价”，不迅速猛烈地干净扫灭了天津反动军，则北平的和平解放，又要拖延时间，加重北平人民的痛苦。

(三) 东北解放军于辽沈大会战连续几个剧烈战役后，立即在隆冬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季节，连续十九天跋涉二千多里的长程

入关,不停步地即展开次一度的更伟大的大会战,彻底扫灭了华北五十万反动軍,在中外战史上創造了特迹。这說明了:

(1) 对毛主席掌握情况、指导战略正确、神算的崇高信仰,毫无游疑地善于克服困难,执行得坚决准确。

(2) 解放軍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被剝削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爱国的战争,指战員的政治觉悟极高,万众一心,不怕牺牲,藐視困难,因而表現了羣威羣胆,压倒困难,压倒敌人,战无不胜。

(3) 八十万大軍,二千里进程,在一个大会战之后,未及半月就要发动进军,任何迅速也来不及布設兵站,輸备粮糈。适合人民愿望,为人民利益,进行消灭人民公敌的匪帮,就显出到处人民大众,在簞食壶浆迎接自己的子弟兵。軍至如归,減消长途跋涉的疲困,伟大丰实的后勤,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

(四) 天津的設堡障地,經年累月經營,尤其增修隱蔽錯綜的低碉,工事的設計、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得十分机密。然而解放軍虽是长途驟临,却即瞭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障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党地下工作組織的深入、机敏与細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主要还是靠人民大众的觉悟,所貢獻的实情加以积累总结。相反地在反动軍的任何层层監察保密,仍不免于泄漏,即临战时还要被人民临时冒险摄取而应机传报。反动派对解放軍的情报,机关設备得密如蛛网,却无论大小远近的情况,常是瞶瞶无闻。解放軍八十万大軍越过长城入关,傅作义无所知;进到宝坻、唐山趋向津沽,我犹未及察;受围之前,尚摸不清多少敌軍到来,一切都在人民封鎖遮蔽中。陣前咫尺挨到重打,依然不明确切情势。反人民的結果,不能不是被塞耳掩目,瞎碰到死。

(五) 解放軍战斗員的英勇堅強精神,小組獨立战斗攻坚的技術与威猛是惊人的。陣地的隱蔽主碉羣不是被強烈的炮火所摧毀(是鋼筋、水泥构成厚达五十公分以上,即被榴彈击中亦不致毀),而是解放軍战士三、五成羣的小組,疏散逼近陣前、詳細偵察后,机敏地乘夜黑照明不及的地方摸进,堅忍在丛密的机关枪火网下潛伏,逐步扫除一路的地雷,揭穿鉄絲网,在“三九”的大寒天,踐葦席,涉着要沒頂的泛滥河水与塹壕,再潛进到認清楚的主碉前,常是一組繼一組地前扑后繼,敢于逼到碉前,从火力孔塞进爆破筒,正确爆破,甚至同自己一起炸灭,为了达成任务而不反顧。使得反动守兵常是一整班被炸灭于碉內,尤其主碉的排、連、营长的指揮所,愈在深处愈被插入,先事爆炸,就动摇了一大片,打出突破口。这样有步伐的、強烈的硬攻強逼,都是各战士的自觉自动表現,使反动官兵見到听到而丧胆,不敢坚持在碉內。主堅綫抗拒不及两日就垮了。巷战的发展更迅速,同样是小組獨立插入逼炸,占了一座楼房又一座,一經三、五小組占領的楼房,就成为堅不可拔的支点。反动軍的反扑愈甚,就死亡愈多而愈速。整个新編师用于小西門西头的巷战反扑,一夜間被消灭干淨。解放軍战略、战术的正确貫徹,取得胜利的偉大,正是成就在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革命战士,自觉自动的堅毅、神勇的战斗威力的基础上。

蔣軍辽西兵团的复灭

鄭庭笈

一 一九四八年初的东北形势

东北战场，經人民解放軍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春季、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后，蔣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軍、新六軍^①以及东北全境的蔣軍，都被打得焦头烂額，退守长春、沈阳、及錦州的三大城市。蔣介石恐怕东北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也将步其后尘，曾在一九四七年八月派其参謀总长陈誠到东北代替杜聿明。蔣交給陈誠到东北的任务是“坚守东北，确保华北，力爭华中，巩固华南”。不料陈誠到沈阳后，东北的形势比过去更坏。当时沈阳的老百姓对陈誠写了一首“陈誠真能干，火車由南站通北站”的歌謠，描写当时沈阳的交通情况，表明沈阳只是一个孤城了。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那天，在沈阳郊区的公主屯地区，人民解放軍只經過一昼夜的战斗，就把新編第五軍全部消灭得干干净净；新五軍軍长陈林达、师长謝代蒸、留光天都被活捉。这充分表現着解放軍战斗力的强大和国民党軍隊战斗力的低落，陈誠为之寢食不安。在南京的蔣介石得到新五軍全部被歼的电报后，认为要坚守东北，非整肃軍紀不可。他于一月九日到沈阳召开軍师长紧急会议，追究新五

① 蔣介石的五大主力美械装备部队，是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第五軍、第十八軍、第七十四軍。

軍全部被歼的原因。会前蔣和陈誠、罗卓英、李树正(副參謀长)先开秘密會議。据李树正对郑庭笈說蔣介石要惩办廖耀湘和新六軍軍长李涛,因为罗卓英向蔣报告第九兵团沒有执行陈誠的命令,增援不力,所以使新五軍全部被歼;蔣认为廖耀湘、李涛不服从陈誠的命令,决定开会予以惩办,整肃軍紀。會議由蔣亲自主持,駐沈阳的軍师长都出席。廖耀湘和李涛先后站起来报告說,他們沒有奉到增援公主屯、解新五軍之围的作战筆記命令,所以部队在沈阳市郊待命。罗卓英站起来說只給电话命令,因時間关系沒有給筆記命令。蔣追問陈誠为什么指揮作战沒有下达筆記命令?陈誠推到參謀业务身上去,接着陈誠站起来說,請按国法惩办他,說新五軍全部被歼是他指揮无方。后来蔣介石說仗正在打着,以后再評功过。會議就这样結束了。蔣回南京后,将东北行营改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接着派卫立煌接替陈誠,三易主帅^①。一月底,陈誠离沈阳的时候对郑庭笈說:“东北局势搞得这样糟,我有什么办法?”卫立煌到沈阳来,蔣介石交給他的任务是:“稳定沈阳局势,确保北宁路的安全,从共軍手中夺取主动权,”就是說要卫立煌集中全力来打通北宁路,和关內保持联系,能保住北宁路的暢通,才能有主动权;否則,处处都是被动的。但卫立煌认为能确保东北的长春、沈阳、錦州三大据点就可以了,要集中兵力来打通北宁路,这样容易分散兵力,不能达到确保三大城市的任务。

① 杜聿明原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式輝任国民党东北行轅主任,均因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东北解放軍夏季攻势中遭到慘敗而被撤职。陈誠原任參謀总长,因指揮山东历次战役屢遭失敗,于一九四七年八月,調任东北行轅主任代替杜聿明、熊式輝。陈誠在一九四七年冬季和一九四八年春季,又遭到解放軍攻势而失敗,陈被撤职,由卫立煌接替。

二 卫立煌图守长、沈、錦三大城市

这年三月間，卫立煌派參謀长赵家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軍軍长罗又伦見蔣介石，說明要打通北宁路，就要从沈阳、錦州同时出兵，才能迅速地完成任务；但目前錦州部队还没有补充好，部队沒有訓練，毫无作战能力，仍然以巩固长春、沈阳、錦州的任务为上策。蔣当时同意卫的意見，赵家驥等回沈阳复命。有一天，卫立煌得意揚揚地对郑庭笈說，蔣介石同意他的意見，暂时不作打通北宁路的企图；又說：如果主力部队出动必遭到失敗，那个时候不仅北宁路难保，連三大城市也难保，东北局势更加危急了。如果东北失守，华北、华中、华南也难保。“現在只有坚守东北三大城市，爭取国际局势的变化”，这話意味着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据卫立煌估計：人民解放軍目前沒有力量向錦州和沈阳进攻，原因是从北滿至南滿交通补給綫太长，同时解放軍对大城市的攻坚战还没有經驗，所以今年固守錦州和沈阳是没有問題的。他最担心的是长春，解放軍的主力都集中在北滿，长春处在解放軍的重重包围中，解放軍攻击长春的交通补給条件也好。长春工事虽然坚固，但粮食和燃料都发生困难。他已下命令要部队将长春城內的柏油馬路的路面挖掉来供燃料之用，这說明当时长春国民党軍队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了。

卫立煌要坚守沈阳，秋季在沈阳召开搶粮的紧急會議。由卫亲自主持，到会的有辽宁省主席王鉄汉，兵团司令周福成、廖耀湘，軍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罗又伦、郑庭笈、刘玉章、向凤武等人。規定在各軍的駐防地区和空心地带征购粮食，并发給部队二成奖金（例如买一千元粮食，发二百元奖金）。久困在沈阳市区的国民

党軍隊趁购粮机会，到农村把鸡、鴨、猪、牛一搶而光，造成沈阳附近老百姓很大的灾难。但卫立煌还得意揚揚地对郑庭笈說：“沈阳部队今冬的粮食沒有問題了，存的白面和白米等到紧急时再吃。”又說：“南京美国軍事顧問团派人到沈阳来找美械装备仓库，預定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間，有三十个师的装备运到南京，东北部队准备装备十个师，新一軍新六軍的装备也准备換新的。”美国軍事顧問有一天由廖耀湘陪同下，到新六軍新廿二师視察在印度装备的美械武器使用的程度。这样坚守长春、沈阳、錦州好象更沒有問題了，准备反攻也有基础了。

但是人民解放軍彻底执行了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針”，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錦之敌^①。“你們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轉移兵力包围該敌，然后徐图歼击”^②。就是要先把錦州啃掉，把国民党軍隊关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九月中旬，辽西义县发生紧急情况，人民解放軍主力已在义县附近地区，将义县紧紧包围，义县至錦州的交通已經切断。卫立煌的判断破产了，他手忙脚乱起来。接着守义县的暫二十二师主力被消灭，师长王世高被活捉，解放軍的强大兵团，正从四面八方直驅錦州城下。九月二十四日卫立煌乘专机飞南京見蔣介石，决定从沈阳空运四十九軍增援錦州。二十六日蔣介石亲派參謀总长顧祝同和卫立煌回沈阳指揮錦州作战。专机过錦州时，顧祝同就不主张在錦州下机和范汉杰見面，恐怕解放軍炮击机场，將他們包围在錦州城里。当日黃昏后，专机到达沈阳，顧祝同詢問參謀长赵家驤各方面战况，赵說他在北平养病，因

① 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三三八頁。

② 見同上书一三四〇頁。

錦州情况紧急，也才刚刚赶回。顧祝同計劃將四十九軍空运錦州，規定二十七日拂晓开始，先运該軍第七十九師第二三五团，和軍部參謀長周声夏先到錦州指揮。二十八日繼續运二三七团和師部及直屬部隊。二十九日拂晓，錦州机場已在解放軍强大炮火控制之下，飞机不能降落，停止空运。卫立煌当时向顧祝同建議，命令范汉杰放弃錦州，退守葫芦島。顧祝同表示未經蔣介石批准，不能下达命令。部隊不能空运，顧祝同就回南京了。

三 錦州告急，蔣介石到沈召开會議

卫立煌曾判断解放軍是沒有力量攻击錦州的；并說錦州既設工事非常的坚固。但郑庭笈得四十九軍參謀長周声夏的电报却說：“解放軍攻击錦州的炮火比八一三抗战、日軍攻击上海时还猛烈得多”；并說：“解放軍完全用坑道式进攻，已接近錦州城牆”。原来决定空运四十九軍增援錦州的計劃不能实现，目下錦州又告紧急，迫得蔣介石再到沈阳召开軍事會議。會議于十月二日下午四时在沈阳“剿总”四樓上举行，由蔣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有“联勤”总司令郭忏、空軍总司令周至柔、參謀总長顧祝同、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參謀長赵家驊、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新一軍軍長潘裕昆、新三軍軍長龙天武、新六軍軍長李涛、四十九軍軍長郑庭笈、五十二軍軍長刘玉章、七十一軍軍長向凤武等（第六軍軍長罗又伦在北平养病沒有到会）。首先由赵家驊报告錦州、长春、沈阳的情况，特別強調解放軍攻击錦州使用的炮火猛烈，多是远距离的重炮，我軍的炮兵射程控制不到。他說：“围攻錦州是解放軍的主力，有五个縱队以上的兵力；据报还有解放軍的有力部隊在彰武、新立屯、四平街地区，准备攻打从长春、

沈阳援錦的部队。要解錦州之围，最好是从关内調有力部队从葫芦島登陆，既可解錦州之围，沈阳的防务也确保无患，是一举二得的上策。”卫立煌也表示同意赵家驥的报告，沒有新的意見。廖耀湘說他判断解放軍攻击錦州是要引誘长春、沈阳的主力部队增援錦州，在中途进行歼击，这是解放軍在东北一貫所采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如果沈阳主力部队沿北宁路增援錦州，必上共軍的圈套。他除了同意赵家驥援錦的建議外，認為如要沈阳主力部队援錦的話，应从沈阳經辽阳出营口，在营口占領后方交通基地后，再联合关内部队合击錦州地区的共軍；这样比較有把握些。当时蔣介石只听取各方面的报告，沒有发言，也沒有作出任何决定。会后接着会餐，师长和辽宁省政府厅长以上人員参加。餐毕政府人員先行退席，蔣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員講話。他說：“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們出去。你們过去要找共軍主力都找不到，現在东北共軍主力已經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們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够發揮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軍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軍的协同、后勤的补給，郭总司令和周总司令已給你們計劃准备好了。我經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島，你們有什么情况，要多連絡。万一你們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見。”到会的人听到蔣介石最后一句話很不滿意，認為是“不祥之兆”。这虽是迷信的想法，但也表明蔣介石心中已經有数，要同共軍决战，連他自己都是沒有把握的。

四 辽西兵团的任务和行动

第二天(十月三日)早上，蔣介石召集卫立煌、赵家驥、周福成、廖耀湘等人开会，規定将沈阳部队編成为攻击兵团和防守兵团二

大战斗序列：(一)以第九兵团編成为攻击兵团，称为辽西兵团(西进兵团)或廖耀湘兵团，廖耀湘任司令官，指揮新一軍潘裕昆部三个师、新三軍龙天武部三个师、新六軍李涛部二个师另一个步兵团、四十九軍郑庭笈部二个师另一个步兵团、七十一軍向凤武部二个师、和騎兵旅，炮兵团，战車，装甲車等部队；任务是打开北宁路，协同关内部队在錦州地区和共軍决战，并解錦州之围。(二)以第八兵团編成为防守兵团，周福成任司令官，指揮第五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第六軍、保安团等部队，防守沈阳为核心以及开原、鉄岭、撫順、本溪、辽中、新民、辽阳等地区，并随时准备协助攻击兵团作战；第五十二軍以辽阳为核心，向鞍山、大石桥地区扫蕩，掩护攻击兵团左翼的安全。

廖耀湘接受任务后，十月三日发給攻击兵团各軍战斗命令，摘要如次：

(一) 新編第三軍由沈阳驻地出发，向新民县通彰武公路地区集結，准备向彰武县城攻击前进；占領彰武县城后，切断共軍从北滿經彰武到黑山县的鉄路交通綫，掩护兵团右翼的安全。

(二) 新編第六軍由沈阳驻地出发，在新三軍之后，向新民通彰武台門地区集結，向叶茂台地区搜索敌情，掩护新三軍右翼的安全，并随时准备策应新三軍进攻彰武县城。

(三) 第七十一軍、騎兵旅从新民县出发，沿北宁鉄路向大虎山、黑山县攻击前进。

(四) 新編第一軍从辽中县出发，向新民县二台子地区集結，向新立屯攻击前进，并随时与新三軍、七十一軍取連絡。

(五) 第四十九軍从沈阳出发，在新六軍后向新民县巨流河地区集結为兵团总预备队，向新民通法庫公路搜索敌情，掩护新六軍

右翼的安全。

(六) 兵团前进指挥所設在新民县火車站附近。

各部队遵照廖耀湘的命令,十月四日开始向新民县地区集結,六日早上,廖耀湘在新民县火車站前进指挥所,集合团长以上人員讲话,并轉达蔣介石命令屠杀共軍乡村干部的規定。廖在讲话中特別強調共軍这次围攻錦州的目的是打从沈阳援錦的新一軍和新六軍的部队,所以首先要打下彰武、新立屯,切断共軍的交通綫,以后才能向北宁路前进。其次要部队注意联络,战斗时要善于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其一点,宿营时要注意共軍对指挥部的袭击;如果通信中断,部队要能独立作战。最后他轉达蔣介石命令团长以上有权杀害共軍乡村干部等等。

八日各部队向指定的目的前进。按蔣介石的規定,辽西兵团要集中主力沿北宁路前进,迅速增援錦州,牵制解放軍主力围攻錦州城,达到解錦州之围的目的。但在廖耀湘思想上,恐怕辽西兵团进到大虎山附近,解放軍从彰武和錦州进兵把它包围在該地区予以歼击,所以他把主力向彰武和新立屯方向攻击前进,认为切断解放軍的后方交通綫,就可以使解放軍放弃对錦州城的进攻;同时,如果錦州早日被解放軍占領了,辽西兵团就可以退守沈阳。因此,新三軍占領彰武后,就停止在該地区不动,大量地劫运粮食。

五 錦州解放,杜聿明到沈指揮

十月十四日錦州情况紧急,十五日解放軍攻克錦州,歼灭守錦州的国民党軍队十万余人,范汉杰被活捉。这个时候辽西兵团仍停留在新民、彰武、一半拉門地区。蔣介石命令廖耀湘,限十八日以前攻占新立屯,迅速向錦州前进。廖耀湘命令四十九軍派一九

五师接彰武城防务，新三軍协助新一軍向新立屯进攻。解放軍有計劃地撤退，新三軍遂占領新立屯，繼續在該地区搜劫粮食。蔣介石派杜聿明到沈阳指揮廖耀湘兵团繼續前进，杜聿明亲到新民前綫視察，并和各軍长見面。卫立煌又抽調二〇七师第三旅到新民归廖耀湘指揮，廖立刻派該旅沿北宁路前进，攻击大虎山解放軍陣地。这一战斗很激烈，大虎山变成拉鋸战，大虎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十九日解放軍收复长春，六十軍軍长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

二十二日杜聿明到达沈阳，代替蔣介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刘玉章下达命令：（一）命第五十二軍軍长刘玉章率領該軍立刻从辽阳經大石桥，向营口市前进，占領营口港口为辽西兵团保护陆海上大后方交通补給綫。（二）命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領第六軍、第五十三軍部队守备沈阳既設陣地。（三）命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率領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等部队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前进，以营口为兵团的后方連絡补給綫。

据杜聿明說他当时在沈阳問过卫立煌、廖耀湘、周福成、刘玉章等，他們都表示沒有意見，照命令执行。十月二十二日黄昏，廖耀湘在新民火車站召集各軍长下达部队向营口前进的命令。

这时辽西兵团被解放軍阻击在大虎山、黑山东北地区，二〇七师第三旅在大虎山战斗中，获得解放軍的命令，要守在大虎山的解放軍部队，“战到最后—兵—卒，固守大虎山陣地，俟后續主力兵团的到达，将敌人包围歼灭之”。大虎山陣地已經变成拉鋸战，廖耀湘判断要攻下大虎山、黑山陣地后再沿北宁路向錦州前进是不可能的，必然被解放軍包围在大凌河东北地区，他借口蔣介石命令辽

西兵团以营口为大后方交通連絡綫，就令辽西兵团主力首先占領营口，然后再向錦州前进，免中解放軍“围城打援”之計。廖耀湘的命令摘要如下：（一）我五十二軍已从辽阳經大石桥向营口前进，占領营口港口，掩护兵团后方交通补給綫，各軍直接向五十二軍用无綫电連絡，通报情况。（二）騎兵旅立即从大虎山地区向彰武县城前进，接替第一九五师彰武城的防务，掩护兵团后方交通綫的安全。第一九五师将防务交騎兵旅接替后，派工兵营用炸药破坏彰武县铁路桥樑后，該师到一半拉門地区归还四十九軍建制。（三）二〇七师第三旅确保大虎山陣地，集中炮火向解放軍猛击，掩护兵团主力通过大虎山地区，用无綫电随时与兵团保持連絡。（四）新六軍、四十九軍归新六軍軍长李涛統一指揮，沿公路向营口前进，到达后与五十二軍取連絡，向錦州方向搜索情况。（五）新一軍从芳山镇地区出发，經盘山县向营口以北地区集結。（六）第七十一軍从黑山东北地区出发，向营口西北地区集結。（七）新三軍从新立屯地区出发，經台安县向营口以东地区集結。（八）各軍用无綫电与兵团部連絡，前进时廖在新六軍軍部。

六 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灭

各部队从十月二十三日起依照廖耀湘的命令行动。二十四日新六軍、四十九軍到达大虎山、一半拉門附近地区，李涛派新六軍的廿二师、一六九师协助二〇七师向大虎山解放軍陣地攻击，毫无进展。一天之內在空軍和重炮掩护下，向解放軍陣地进行猛攻，都被解放軍坚守陣地的英雄們所粉碎了。战斗的猛烈和解放軍的白刃战是完全出乎廖耀湘、李涛意料之外的。二〇七师第三旅沒有完成大虎山的战斗任务，廖耀湘认为二〇七师的战斗力不强，但

他使用所謂“王牌軍”新六軍投入战斗，一样被解放軍阻击在大虎山陣地前，使他无所适从。二十四日夜間，解放軍夜袭胡家窩棚新六軍指揮部，廖耀湘、李涛狼狽不堪，徒步逃到历家窩棚新二十二师司令部^①，和各軍失了連絡。二十五日拂晓，郑庭笈在一半拉門仍然命令四十九軍依計劃向营口前进，不料部队刚刚前进不到十华里的地区，第一〇五师駐在六間房的一个步兵团已被解放軍包围，失了連絡。这时大虎山附近的战况更猛烈，四十九軍停止前进，投入战斗，但和廖耀湘已失連絡，只与在历家窩棚附近的新六軍二十二师、在一半拉門附近的新三軍十四师取得連絡。該軍正面情况緩和，解放軍沒有进攻。郑庭笈将当时情况，电告沈阳卫立煌，說“廖耀湘、李涛在胡家窩棚被解放軍夜袭，失了連絡，情况不明；二十二师、十四师与該軍也失了連絡，解放軍已将辽西兵团包围在大虎山、黑山东北地区，战况紧急，如何处置，急电复”。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得卫立煌回电，命令郑庭笈率領二十二师、十四师、一〇五师、一九五师立刻向沈阳撤退。郑准备夜間行动，但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十四师师长許穎均坚持要和李涛、龙天武取得連絡后再行动。不久，得廖耀湘也从二十二师师部打来电话，說战况紧急，要四十九軍同心协作，才能挽救危局。这个时候彰武县、新立屯已发生情况，从錦州向大虎山前进的解放軍主力向辽河前进，将辽西兵团包围在大虎山、黑山东北地区。二十六日廖耀湘奉到卫立煌命令，要廖率領各軍向沈阳撤退，以新一軍、七十一軍向北宁路以北地区向新民县撤退；新三軍沿北宁路向新民县撤退；新六軍、四十九軍沿北宁路以南地区向辽河老达房渡河口撤退，渡辽河向

① 新六軍第二十二师是廖耀湘、李涛的基本部队，在印度时，廖、李先后任过該师师长，所以逃向自己的基本部队。

沈阳前进；四十九軍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后，在新六軍后前进。各軍撤退時間均在二十六日黃昏以后。

二十六日在大虎山、黑山、一半拉門地区的战斗时稀时密，郑庭笈早上派赴老达房偵察辽河渡河口的特务营来电报說老达房沒有情况，要部队急向該地区前进。半夜，廖耀湘、李涛到达陈家窝棚四十九軍指揮部，和郑庭笈会面并用晚餐后，繼續向沈阳撤退。冬夜严寒，士气萎靡，大都垂头丧气，毫无战斗意志。廖耀湘前进不远，就发生情况，汽車不能外駛，徒步从村庄的空隙小道逃命。这时战况四周猛烈，已被解放軍四面包围，合围圈愈来愈小了。各軍陷在解放軍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已丧失指揮和控制，兵团和軍、师、团連絡已断。解放軍东面炮击，我們就向西面逃走，西面一击，又向东面逃走；毫无目标地乱逃，互相乱撞乱碰，人仰馬翻，东倒西歪。郑庭笈自己率領指揮所人員和一九五师师长罗莘蕓逃到該师一个步兵团里，在李家窝棚被解放軍包围着，二十七日激战整日，村庄陣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次都冲不出去。到了夜間十二时左右，四面枪炮沈寂，郑庭笈和罗莘蕓率領特务連突围，盲目地向辽河方向前进，走有二十华里左右，在二十八日拂晓，郑庭笈和罗莘蕓被解放軍第七縱队某师俘获了。

二十八日打虎山地区已經沒有激烈的战斗了，枪炮声时断时續，各村庄已經变成蔣軍俘虏官兵的收容所了。三十日解放軍后勤部把郑庭笈、罗莘蕓送到北鎮收容所，在那里遇着新一軍副軍长兼三十师师长文小山、該軍第五十师师长楊溫、副师长陈时杰、新三軍參謀长李定陆、十四师师长許穎、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緯、暫五十九师师长梁鉄豹、新六軍二十二师师长罗英、一六九师师长张仙羽、四十九軍一〇五师师长許玉楨、七十一軍八十七师长黃炎等，

都在那里集中了。后来又知道廖耀湘、李涛、向凤武也被活捉了。廖耀湘兵团全部十多万人，十月四日从沈阳出发，到二十八日战斗结束只经过廿四天的时间，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辽西大虎山战斗也结束了。

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后，卫立煌更惊慌失措，杜聿明三度飞沈阳，在沈阳高空看到沈阳的混乱情况，不敢降落，遂原机飞回北平。蒋介石闻此消息后，象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人民解放军不顾疲劳，日夜兼程，飞速向沈阳、营口猛追急进，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地解放了新民、沈阳、营口，十一月二日东北全部解放了。从九月十二日开始，经过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二千人。

这篇回忆录，主要是将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的事实经过写出来，供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参考。作者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有待有关方面作全面的补充。所述有错误和不符合事实的，希望多予指正。

蔣介石破坏停战协定进攻 中原解放区的实証

袁 桓 楚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簽署停戰協定後，暗地里却下密令，“嚴密監視共軍的活動，待命進攻”。

那時我在武漢行營參謀處主管軍事情報的第二科當參謀，就當時一鱗半爪的跡象，也可証實蔣介石當年一手下令停戰，一手密令“剿共”的兩面手法。

在武漢地區協議停戰的是軍調十三小組，中共方面代表是中原軍區參謀長王震，蔣軍方面代表是武漢行營參謀長郭忏、代替郭忏執行具體工作的是武漢行營參謀處副處長盧濟時，美方代表的名字不知道。大約在六月十日左右，三方代表在漢口德明飯店，議定豫鄂皖邊區國共雙方軍隊，立即停止軍事衝突，按照簽字那天的雙方駐扎態勢，原地停止敵對行動，靜候調處，並在那天中午三方代表都簽了字。

就在那天下午三時左右，盧濟時匆匆回到參謀處，向我和劉當陽（參謀）詳細地了解共軍的活動和態勢。他並叫主管作戰的第一科熊彭年（參謀）馬上用電話告訴花園的第六綏靖區周鼎密令各部隊“迅速占領有利地形，嚴密封鎖共區，隨時待命行動”。同時告訴武昌的整編第五師、咸寧的整編二十六師待命行動。這時劉當

阳笑迷迷地問卢济时：“副处长，已經签了字，为什么还要这样作？”
卢济时冷笑了一声，馬上沉下脸來說：“你們晓得什么？”

到六月中旬，蔣介石調到华中地区的軍队和集結态势：除汉口的武汉行营、武汉警备总部、宪兵第二团外，第六綏靖区駐京汉路南段的花园；整編十一师駐孝感黃陂之綫；整編六六师駐京汉路上的东篱店、武胜关卫家店之綫；整編七二师駐麻城亓宋埠之綫；整編七五师駐应城皂市之綫，一部駐沙洋；整編二十师主力集結襄樊，一个旅分駐枣阳；整編第五师集結武昌徐家棚一带；整編二十六师駐咸宁亓岳阳之綫。此外国民党徐州綏署的第八綏靖区（夏威）所屬的整編第七师集結合肥，整編四六师集結六安、金寨一带，郑州綏署（刘峙）的整編第三师集結在商邱淮阳一带地区。以上总计国民党集結在豫鄂皖边区外国的有十个整編师，总兵力約三十万人。

中共中原軍区司令部駐宣化店；第一纵队轄一、二、三旅，駐大别山西麓的白雀园、沙窝、新县一带地区；第二纵队轄一三、一四、一五旅駐鸡公山以东礼山（現在改大悟）姚家集一带地区；三五九旅駐宣化店附近。鄂东軍区轄一个旅八个县中队，駐黄安东南亓黄梅西北一带。江汉軍区轄二十八个县和一个独立旅駐大洪山东南及襄河以东以北一带。总兵力約五万八千人。

大約在六月十四、五的一个晚上八、九点鐘的时候，卢济时夾了一个皮包，匆匆地来到第二科办公室內，对刘当阳和我說：“从現在起你們要值夜班，密切注意共軍动态，随时将情况告訴我，我在德明飯店，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告訴王振旅（也是二科的参謀）。”又跑到第一科去密談了一个多鐘点走了。不久，熊彭年走来开玩笑地对我說：“好了，你們忙，我們失业了。”我鼓着两只眼睛望着他，并打着京腔“此話怎讲？”他悄悄地对我說“南京的电报来了”，接

着就談起，那天蔣介石給武汉行營的电令的主要內容是(一)出動豫鄂皖邊區外圍所有軍隊，對共軍嚴密封鎖，分進合擊，徹底消滅中原地區的共軍。(二)為避免共方的責難與美方的為難，著令武汉行營所轄部隊，均歸鄭州綏署(劉峙)指揮出擊。這就可以使武汉行營推諉簽字的責任。

第二天下午，我們就看到鄭州綏署請武汉行營轉達各師的所謂作戰部署，並請武汉行營隨時將共軍動態通報鄭州，其作戰部署的主要內容如下：

“整三師進出于界首、周家店以南之綫，阻擊北竄之敵。整六十六師進出于五里店、札山以東之綫，重點置于左，進擊宣化店以北之敵。整十一師主力進出于卫家店以東姚家集以北至黃安之綫，進擊宣化店以南之敵。整七十二師主力指向白雀園以東以北地區，進擊新縣以東以北之敵。整四十六師指向叶家集、金家寨之綫，阻擊東竄之敵。整七十五師主力進出于皂市以北桑樹店之綫，圍擊大洪山以南江溪地區之敵；一部開京山聊屋山之綫阻敵西竄。整二十師荊陽之一個旅，向大洪山北麓攻擊前進。阻擊大洪山北竄之敵，主力集結于樊城待命。整五師集結于橫店黃陂之綫待命。整二十六師集結武昌待命。”

以上就是蔣介石一面叫武汉行營簽訂停戰協定，一方命鄭州綏署出動六倍于共軍的兵力，以宣化店為攻略目標，分進合擊，企圖一口氣消滅中原解放區五萬多人民武裝，並誣蔑共軍破壞停戰協定的事實真象。戰鬥持續到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時，宣化店外圍已發生戰鬥，中共中原軍區已处于絕對劣勢地位；為了保存人民革命的武裝力量，分為兩個梯隊，北梯隊于東簋店附近，南梯隊于卫家店，突破蔣軍封鎖，越京漢路西移。

我和司徒雷登

叶 篤 义

司徒雷登給我的最初印象

我是旧北平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在学校时所选的科目是“政治系”，所学的課本差不多都是外文的，而且差不多都是用英語誦授，即使教員是一个中国人。当时学校里的风气，无论写东西、誦演或个别談話，都习惯用英文，比誰的英文写得最漂亮，英語誦得最流利，不以为耻而以为荣。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不参加任何活动、埋头讀書的“好学生”。我是政治系的学生，很自然，认为美国那套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最理想的。除此而外，我还最喜欢看美国电影，被电影上所宣传的那一套美国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所迷惑引誘，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方式是最自由的。总而言之，比起一般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来，我所受的毒化和奴化是更深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和司徒雷登从来没有过私人来往。当时全校学生八、九百人，除非在学生会里活动的同学，很少有同校长(司徒雷登当时的中文名义叫做“校务长”，英文则是 President)接触的机会。他在公开集会上誦話，每年都有机会听到若干次。他誦話时喜欢夹杂几个中国字，有时甚至整段誦中文，听起来外国味还不算很重。他经常說他是生在杭州的，可以算为一个杭州人。当时学校里

有各省同乡会的社交活动。有时开浙江同乡会，他也去参加。他经常说他爱美国，也爱中国，有时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生在中国也愿死在中国”等等好听的话。那时我对司徒雷登不但抱着一种崇拜的心情，而且也抱着感激的心情。

毕业以后

我毕业以后，同司徒雷登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从一九三四年我离开燕京到一九四六年我在南京和他见面这十二年的时间内，我回忆起来，只在天津和北平校友会联欢的场合上同他见过两三次面。我记得抗战以后在一次这样的会上，他讲话时候曾说到燕京校园里发现了一枚炸弹，是日本人拿来恐吓他的。并说：“我宁叫日本人象炸天津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貽我们全体在校和离校同学之羞。”听后使我非常感动。饭后，我同他谈抗战的前途。我说中国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不能坚持抗战。他当时也表示同意，但紧接着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我还认为他这句话是对中国共产党表同情。

我是怎样被司徒雷登引上美帝门路的

一九四一年日本轰炸珍珠港，日美开战，司徒雷登被日本人当作战俘拘留在北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恢复自由，一直到次年他做大使，我和他没有接触过。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三日南京下关惨案，我被国民党特务毆伤，在南京中央医院治疗。当时司徒雷登刚刚被发表为驻华大使，在南京庆祝他的七十生日。他派人到中央医院给我送了一块寿辰蛋糕，并致慰问之意。我出院后，到他

那里致謝，这是我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同他見面。当时他对我說，馬歇尔推荐他做大使是因为他在中国办教育多年，学生遍中国，各党各派都有他的学生，因此他在中国的糾紛中是一个“真正的中立者”。他并举例說，他的学生在国民党中有沈昌煥，在共产党中有龔澎、黃华，在第三方面有我，希望我在工作中常常和他联系合作。我受了他这些甜言蜜語的迷惑，从此甘心走上美帝国主义門路。

张君勱是怎样参加“国大”的

司徒雷登做了大使之后，我在民盟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张君勱馬上找我做他的英文秘书。那时我已是民盟的中央委員了，做张君勱的秘书，在名义上对我来說是降低身份的，但我还是愿意屈就。道理是什么呢？当时张君勱是民盟的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員，在盟內的地位很高，美国人也十分重视他。张君勱的中文秘书名叫蔣勻田，由于张君勱的关系而当了民盟的中央常务委員，并当了民盟的政协代表团秘书。我确实暗自欣喜，一方面在盟內借司徒雷登的关系提高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在司徒雷登面前又可以借民盟的关系提高自己的身价，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

我当了张君勱的英文秘书之后，替他把当时政协起草的宪法案譯成英文，又替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連同宪草譯稿通过美国上海領事館送交杜魯門征求意见。张君勱同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談話几乎每次都由我陪同前往。馬歇尔和司徒雷登对张君勱的重视超过任何其他民盟的人。在談話中他們总是鼓励张君勱把所有第三方面——当时所謂的“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賢达”三个方面——团結領導起来，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一方面可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同时又能孤立共产党”。当然前一

半話是虛，而后一半話才是實。有一次司徒雷登更露骨地說：“假如第三方面全體參加國民大會，共產黨完全孤立起來，那麼我就更有理由向我的政府建議更大規模地援助你們將來的聯合政府。”張君勱終於參加了“國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同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的拉攏鼓動分不開的。

在走美國門路這一點上我同張君勱雖然是一致的，但在投到蔣介石這一邊參加“國大”，我同張君勱是有分歧的。張君勱參加“國大”，脫離了民主同盟，從此我也就脫離了張君勱。

我為什麼繼續跟着司徒雷登走

我脫離了張君勱，但脫離不了司徒雷登。蔣介石的“國大”召開以後，馬歇爾不久即被杜魯門召回美國去當國務卿。馬歇爾走后，司徒雷登對我說，馬歇爾臨走時曾托他向我問候。現在我想這句話一定是司徒雷登編出來的。我同馬歇爾一共只見過三、四次面，兩三次是同張君勱一道去的，其餘一次是同梁漱溟去的。馬歇爾臨走的時候，絕對不會對司徒雷登談到我的。為什麼司徒雷登捏造這個假話呢？現在回想起來，司徒雷登對馬歇爾是推崇備至的，對我說過幾次：“自從羅斯福總統死后，馬歇爾先生是活著的最偉大的美國人了。”他的目的是想拉我跟着他走，於是捏造出這句話來，意思是說：“馬歇爾這樣大的人物還惦記到你呢，跟着我走吧！”而我確被這句話如同灌了迷魂湯，繼續跟着他走。

司徒雷登怎樣對待民主同盟

馬歇爾和司徒雷登雖然把張君勱拉去參加了“國大”，但還是不能達到他們“完全孤立共產黨”的目的。民主同盟以及一部分无

党派民主人士拒絕参加“国大”，拒絕参加蔣介石政府。“国大”召开不久，民盟在一九四六年底召开了自己的一届二中全会，会上提出“公开化、合法化”的口号和中間路線的政治綱領。一般地說，象民主同盟这样一种組織本来可以做为資產階級专政下的民主裝飾品的。但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即使是这样一个裝飾品，無論是病入膏肓的蔣介石看不上眼，百般加以压迫，連美国人也是千方百計地想破坏拆散它的。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將組織机构略作調整，取消国外关系委员会，国际联系由宣传委员会負責，罗隆基連任宣委会主任委員，我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員。蔣介石对民盟的压迫越来越重，标榜中間路線的民主同盟不把自己的前途依附在中共領導的人民大众革命力量上，而是把幻想寄托在自己的“国际地位”上，妄想以这个“国际地位”来抵制蔣介石的压迫。为了表示这样一个地位，民盟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在南京梅园新村总部（即中共代表团原来的办事处，代表团被迫撤退后迁給民盟的）設宴招待美国、英国和苏联大使。苏联和英国只是陪衬，主要对象是美国大使。但主觀的期望同实际得到的反应正相反。苏联大使（代办費德林代理大使职务）正式設宴还請民盟人士，英国大使只在大使館請民盟少数人吃下午茶，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則是吃完了以后根本沒有卖賬。当时我們总有一种幻想，以为在对待民盟的态度上，美国同蔣介石之間有分歧。实际的情况是，作为民盟一个一个的人來說，司徒雷登都发生兴趣、都想拉攏，但是对民盟这样一个組織的存在，司徒雷登和蔣介石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蔣介石公然以所謂“中共关东地委負責人”的罪名枪杀了民盟的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同志。这是对

民盟这个“公开化、合法化”組織的公开的镇压。民盟按照“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抗議，蔣介石置之不理。于是民盟又幻想到美国的支援，派沈衡老(鈞儒)、章伯鈞、罗隆基和我由上海到南京找司徒雷登。我記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談話非常重視，除了他自己而外，他还派了大使館參贊拉登(Ladden)参加，旁边并有一个记录(平常他同民盟的人談話向来是不用记录的)。我回忆談話的簡略內容是这样：我們表示說：“中国当前的局势，共产党在左边，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在右边，有民盟这样一个中間力量存在，不单对中国，就是对美国也有好处。去年馬歇尔將軍調停中共和国民党失敗了，这次希望你調停民盟和国民党能够成功等等。”司徒雷登答复非常干脆，簡單地說就是：“这是中国的內政，本人不便干涉。”

不久之后，国民党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十月中旬以后，国民党特务軍警把民盟南京总部包围封鎖起来，最后在十月廿七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派黃任老(炎培)和我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办交涉，同时找司徒雷登求助。由于民盟总部已被封鎖，黃任老、罗隆基和我的碰头，在罗隆基的提議下，經常借用司徒雷登的住所举行。对于我們的請求支援，司徒雷登照旧是拿“不便干涉內政”为借口加以拒絕。他“不便干涉蔣介石的內政”，但却偏要干涉民盟的內政，直接了当地向我們建議“光荣解散”。民盟就这样在蔣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于十一月五日发布了“解散总部”和“停止活动”的公告。

蔣介石于十月七日枪杀杜斌丞，紧接着二十天以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在这个时候，臭名远揚的美国反苏反共专家、前駐法国大使布立特到中国来活动。布立特在南京的时候，就作为司徒雷登的客人住在他的家里。蔣介石的这个罪恶

行动是得到司徒雷登的参預和支持的。

司徒雷登进一步施展手法

民盟宣告解散之后，司徒雷登于是又进一步施展手法。他企图通过我劝說民盟的少数人以个人身份参加蔣介石政府。他是这样說的：“蔣介石現在确实想实行民主，但由于他一生都是当軍人，因此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們应当参加进去，帮助他积极地实现民主政治，而不应当只是站在外面作消极的批評。”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上当，民盟的任何人也没有想去上当。我們认为参加了蔣介石政府，就失去了“第三者”的地位。我們幻想将来总有一天和談仍要恢复，而我們届时就可以大显身手。

在民盟参加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司徒雷登没有得到下文。一两个月之后，他和我談話的时候又試探地問我愿意不愿意到美国去一趟；无论是在大学里研究进修，或者是在联合国工作，他說都可以帮忙。当时我确是心里动了一下。美国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我从未到过，借这个机会出去玩一趟不是很好嗎？但随后又考虑到：（一）张表老（瀾）一个人住在上海，我走了以后把他交给誰（我同表老住在一起）？（二）我和民盟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断絕？（三）时局的发展总有一天要恢复和談，等到和談的时候临时跑回来参加，就会被人看不起了。以上三个原因，尤其是最后一个顧慮，拖住了我的腿。我回答司徒雷登容我考虑一下再說。以后見到面我没有回答他，他也就不再提了。

摸底和分化

民盟宣告解散之后，张表老、黃任老和罗隆基在上海往返过从

相当密切，他們通过我同司徒雷登保持着經常的联系。我們的看法是：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国共之間最終还要恢复和談，而中国的問題到头还要依靠美国来帮助解决。

以沈衡老为首的一批进步分子，在民盟解散之后南下到香港。他們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間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屆三中全会，提出“反蔣、反美、联共”的口号，并設立了临时总部。民盟由以往的“中間路綫”、“第三条道路”，轉而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道路，这是民盟历史上的轉折点。但民盟留在上海的一小部分人当时仍然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我即是其中的一个。我們认为：反蔣可以，事实上已經反了，但何必以此为口号来刺激他，怕因此而影响到我們住在上海的安全。我們最不同意的是提出“反美”的口号。我們幻想将来的民盟做中共和美国之間的桥梁，妄想以我們同美国之間的私人交情来抬高将来自己的身价。

司徒雷登对民盟的动态始終是注意的。民盟三中全会以后，司徒雷登有一天在談話当中突然插进这样一句問話：“沈鈞儒和章伯鈞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回答他：“据我所知，两个人都不是。章伯鈞过去一度是，后来又退出；沈鈞儒的女婿范长江是共产党员。”他通过我摸了民盟領導人的底，我供給了他想知道的材料。

在那次談話一两个月之后，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間，美国駐广州总領事拉登（原大使館参贊，后調到广州当总領事）由广东到南京向司徒雷登述职。他經過上海的时候，对罗隆基和我說，他在香港看到章伯鈞，章对香港民盟的做法也不同意。罗和我听到这个話之后，更增加了我們反对香港临时总部的借口。拉登为什么到香港去看章伯鈞而不去看沈老，現在回想一下，可能同我和司徒雷登上述談話有很大关系。

揭掉了“教育家”的假面皮

办了多年奴化教育的司徒雷登，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自然是十分注意的。他屡次不愿“干涉内政”的嫌疑，以他的大使兼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号召知识分子同蒋介石政府合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同政府合作来监督政府的革新”。但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蒋管区广大学生认清了应当走的正确道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从一九四六年底开始，逐步扩大，逐步高涨。蒋介石对待学生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手段，最后造成一九四七年五月廿日的“五二〇血案”。当时我正在南京。司徒雷登同我谈到这件事情，他怪蒋介石不应当用高压办法对待学生运动。他说“学生是社会阶层中最敏感的一部分人，他们往往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动向而为其先声。对待学生运动只能采取因势利导而不能用镇压的方法。学生在社会上的作用相等于测量气温的温度计，蒋介石对待学生运动的这种办法，等于一个人不愿意见到气温改变而打碎温度表一样”。我听了这一番话，真是佩服，认为他不愧是一个“教育家”。

学生运动并没有被蒋介石镇压下去，而且继续发展和提高，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逐步发展为“反美扶日”、“美军撤出中国去”的反美斗争。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间，上海学生运动发展到同整个文化界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时候司徒雷登急了，以他个人名义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极端无耻、极端狂妄的威胁声明，恐吓中国学生“准备自食恶果”。事后据上海美国领事齐艾斯(Chase)对我说，这篇东西是美国国务院拟好了的稿子，用司徒雷登个人的名字发表，企图利用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四十年教育的这点“声

望”，把学生运动压制下去。結果适得其反，司徒雷登这个声明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揭掉了他的“教育家”的假面皮，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本相。

在全国人民对司徒雷登非常愤怒痛恨的时候，我和盟内的一小部分人却是替司徒雷登惋惜。我用“陈光”的笔名在上海《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要打破温度表——敬告司徒雷登先生》，文章大意是引述头一年司徒雷登对我说的关于学生运动的话，以“为亲者所痛”的口气向他提意见。以后，张表老、黄任老和罗隆基三个人共同署名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黄任老亲笔写的，内容非常简单，大意是他们对司徒雷登有意见，由我转达，我把这封信和我上述文章译稿交给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并没有以他的声明是国务院起草而用他的名字发表的这个事实来推脱，而是把“责任”全部担当起来。他说：“我在我的国家里不知道为中国发表过多少文章。我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公开为我的国家讲话，而学生们居然骂我是伪君子、说谎者、老狐狸。这一定有共产党的背景。我对你们在这个时候以这样友谊的方式向我提意见，我表示万分的感谢。请代我向张、黄、罗三位先生致意。”

其实我们的本意也并不是真心想提什么意见，而不过是在他遭到大家痛骂的时候，借机向他卖弄一下交情。他既然“表示万分的感谢”，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关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一九四八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一幕丑剧中，蒋介石的“总统”是固定了的，而关于“副总统”的人选则有李宗仁 and 孙科之争。当时上海方面盛传美国人支持李宗仁竞选。为了

証实这点，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去摸底。当我到他家的时候，胡适正在那里同司徒雷登谈话。傅泾波当即把我让到隔壁房里坐。司徒雷登和胡适在旁边屋里讲的话，我虽然不能全部听得清楚，但从他们谈话中传出来的片断字句中，我立刻听出来内容是这样的：胡适代表蒋介石去见司徒雷登，要求他支持孙科而不要支持李宗仁，被司徒雷登拒绝了。我把这个猜测向当时陪着我的傅泾波证实，他笑而不答。从傅泾波的表情中我已经摸到底了。果然，几天之后李宗仁就当选“副总统”了。

不择手段地制造谣言

民盟宣告解散之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不定期地举行碰头会，大家交换消息，保持联系。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在一次碰头会上，黄任老一走进门就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报告你们一个大消息，周恩来已经到美国去了。”怎么知道的呢？任老说：“是跟随周恩来去美国的一个随员的住在上海的家属亲口说出来的，是千真万确的。”碰头会后，我马上找司徒雷登征询这件事情是否属实。他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只含含糊糊地说：“我也听到了这个话，我无法证实这个消息。南京大使馆同共产党区域里没有直接电讯联系。即使周恩来先生到了美国，也不是由我这里发出签证去的”等等。从他的回答里，我对任老所说的这个“千真万确的消息”只能信其有，无法说其无。而这个“消息”对我们少数对美国抱幻想的人发生了极大的迷惑作用。我当时心里这样想：“怎么样，最后连周恩来都到美国去了，我们这些人在上海同美国人来往不是更有理由了吗？香港民盟提出反美的口号，真是比共产党还左。”解放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消息”就是美国方面制造出来的。

在革命陣營中制造代理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了。三月間上海報上登出民革的朱蘊山由北平到南京找李宗仁接洽和談，并要求李宗仁把民盟留沪中委用飞机送到北平。張表老叫我到南京去找朱蘊山詢問究竟。朱蘊老對我說，報上所登是實，但李宗仁是否有力量指揮上海的軍警特務則還成問題。我於是順便到司徒雷登那里去辭行，說明我可能短期內回到北平。我起初猜想司徒雷登可能表示不贊成，沒有想到他聽到之後竟欣然表示非常同意。他首先說：“北平是你的家鄉，你應當回去”（其實我並不是北平人），但緊接着就講了下面一段挑撥策動的話：

“共產黨人是沒有祖國觀念的。他們的祖國就是蘇俄。我希望你作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要忘了我們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這是聖經上一句話，燕京大學拿來作為校訓。英文原文是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我這樣回答他：“我將永遠為是你的學生而感到驕傲。我絕對不會一切盲從蘇聯的。”

我由南京回到上海不久，張表老和羅隆基在五月十日被國民黨特務拘禁在虹橋療養院。特務們每天到我的住所去抓我，我已經逃出，幸免于難。我當即於五月十四日搭船逃往香港。臨離開上海之前，我到上海美國領事館找美國領事齊艾斯向他辭行，並告訴他張、羅二人被拘捕，要求他在可能範圍內予以營救。齊艾斯表示願意盡力而為，並寫了一個便條介紹我同香港美國副領事見面，由那里打听張、羅二人的消息。臨別的時候，他送了我一本美國國務院印的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同蘇聯政府之間的來往公文的

英文譯稿，說希望我看過之後能把這本小冊子帶到北平去送給任何願意看的人看看。這本小冊子我看過一遍以後，丟在香港了。我雖然未帶到北平來，但這本美國印的，肯定被歪曲了的書的內容却印在我的腦子里，跟我一同來到北平，對我一直起着腐蝕作用。

我在香港的期間，同香港的美國副領事（好象是一個W字母起頭的姓，我記不起來了）見過兩次面，在他那里打聽出來張表老和羅隆基的情況。他首先說，司徒雷登和齊艾斯托他向我致意，慶祝我安全到達香港。他告訴我，張、羅二人仍然被拘禁在虹橋療養院，齊艾斯曾去看過他們兩次，並贈送鮮花，表示關切之意。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了，我得到張表老和羅隆基已經脫險的消息。我第二次去見這個副領事，托他替我買一張美國船票到上海（上海解放之初，港滬之間沒有定期航行船隻，當時適有一只美國船定期由港開滬）。他說，需要有中共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喬冠華的字據才能搭客。下面的話就不象樣了。他問我：“過去中共香港辦事處是華崗負責，現在改由喬冠華負責。聽說華崗是犯了錯誤被免職的。你能打聽出來他是犯了什麼錯誤嗎？”我回答他：“這類事情我打聽不出來。”他緊接着又說：“請不要誤會我，你需要錢用嗎？”我立刻回答說不需要。我真沒有想到他居然想用金錢來收買我。從此我就再沒有同他見面。不久以後，我就離開香港回到北平，再沒有同任何美帝國主義分子接觸過了。

補述一段正面的教材

我的回憶到以上為止，但在結束這段回憶錄之前，我愿意把我在香港期間同喬冠華同志接觸的情況補充記述一下。寫完了上面那麼多反面教材之後，下面的回憶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有很大現實

教育意义的正面教材。

我五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十八日早晨到达香港。当天下午就到中共办事处找乔冠华。我告诉他张表老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托他代打一个电报报告北平。万想不到，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且已经报告北平了。他说，几天之前他从上海方面接到这样一个英文电报：“Old Chang and Tuberculosis arrested”（张老和肺病被捕），他就知道大概了。表老和罗隆基是在五月十日被拘捕的，上海报上从未登出这个消息，也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件事情。我五月十八日到达香港，而他几天之前已经接到上面那个电报。从这件事使我看到下面几个问题：

（一）党屡次通知我们这些人早离开上海，而我们拒绝不走。虽然如此，党对我们这些呆在虎口里玩火的人的安全还是始终关切的。

（二）党的地下工作已经深深打入了敌人心脏——特务组织里面。

（三）齐艾斯的两束鲜花对国民党特务起不了任何作用，而党的地下工作终于挽救了张、罗二人的性命。这对于我们这些走美国门路的人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此外，关于购买美国船票的事，美国领事说有乔冠华同志的字据才能搭客。我为这件事去找乔冠华，他当时马上写了一个字条，但想了一下以后，又很快收回去撕掉。他这样说：“我不愿意留任何字据在美国人手里。我帮助你将来搭别的船走吧。”从这件事看出乔冠华同志警惕性之高，敌我界限之分明。当时情节至今回忆，仍宛如目前。

1960年11月24日

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

王柔德^①

一 披着盟友外衣进行侵略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美帝为了控制国民党军队、作为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披着盟友的外衣，假借共同对日作战为名，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充当国民党军队顾问，训练国民党官兵。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除了在印度的训练基地，大批空运蒋军前往受训外，还在我国南方以桂林为中心、西南以昆明为中心，分别建立训练基地，对第三战区和远征军各部进行训练。此项训练，最初由史迪威以所谓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主持，后来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齟齬，由魏德迈接替。

设在印度的训练基地是为了专门装备训练一支美国式的军队。它的主要对象是新一军和新六军，遴选亲美分子担任军长。如

① 本文作者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在国民党军委会干训团驻滇干训团训导处任上校组长，一九四五年任军委会干训团（即青年军干训团）上校秘书、科长，一九四六年春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止，任国防部副官局上校参谋、科长等职。文中所述美军顾问团人员侵略我国的各种活动，与蒋介石集团官员的种种出卖国家民族的罪行，都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实。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妥当的地方，尚希阅者批评指正。

新一軍軍長孫立人，既是美國留學生，又是宋子文的親信；宋子文作財政部長，孫即在其下擔任稅警團團長；孫在蔣軍將領中是臭名昭著的親美分子。在印度，除了訓練新一軍和新六軍外，為了培養更多的親美軍官，還分批空運其它部隊的中上級軍官前往受訓。當時的“駐印軍”由史迪威直接指揮。

設在桂林的訓練機構名叫“軍委會東南幹部訓練團”，團長例由蔣介石兼任，教育長由陳誠親信羅卓英充任，輪訓第三戰區中下級軍官。

設在昆明的訓練機構為“軍委會駐滇幹部訓練團”，該團并在大理設了一個分團。該團教育長由遠征軍各集團軍正副總司令宋希濂、霍揆彰、梁華盛、杜聿明、關麟征、黃杰等輪流兼任，宋希濂還兼任了大理分團主任，分批調訓遠征軍各部中下級軍官。

一九四四年冬，蔣介石為了充實其反革命資本，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成立青年軍十個師。桂林干訓團遷至重慶，改稱“軍委會干訓團”，該團即專為訓練青年軍幹部而設，因此一般人叫作青年軍干訓團，仍由羅卓英以青年軍編練總監名義兼任教育長。

上述各訓練機構，除“軍委會干訓團”由曾在桂林干訓團受過美軍顧問訓練的人擔任教官以外，駐桂及駐滇干訓團均由美軍顧問擔任教官，直接加以訓練（後來培養了一批蔣軍軍官作助教）。其實，在美軍顧問人員中，大多數是沒有什麼軍事素養的人，他們只是在戰時才被征召入伍的預備役人員，只是在美國國內受過短期的某一項專業訓練的人員。他們當中有些人遠涉重洋來到我國，除了為完成壟斷資本家侵略中國的目的以外，只是為了獲得較多的海外津貼，積蓄一筆將來回國後謀生的資本。

這是一種短期的訓練，訓練期間為兩週至一月左右（步兵訓練

一般为两周)。即是当时美军所吹嘘的輪带式訓練,据說是馬歇尔的創造,其目的是要求在較短的时间內,訓練出大量的合乎作战要求的軍事人員。步兵訓練側重在兵器使用方面,如六〇炮、三〇三机关枪及火箭炮(反坦克炮)等。在战术方面,只讲一些小部队战术。

軍事技术的訓練,对蔣軍人員虽有影响,但还不十分重大。影响最大的是在政治方面的欺騙麻醉。美军顧問人員一貫以伪善的面孔,盟友的姿态出現,大肆宣揚所謂中美传统友誼,灌輸亲美思想。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竭力宣传美国的富強,美军在太平洋上逐島、越島进攻日軍,諾曼第登陸战的規模和击败德寇的决定性意义;美国是同盟国的兵工厂,原子弹的威力等等,灌輸恐美思想。此外,还极力宣揚美国的生活方式、物質文明,灌輸崇美思想。如駐滇干訓团一个首席顧問是一个美军上校,他就以有一架专用飞机而向蔣軍人員大肆炫耀。他們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控制蔣軍人員,使之成为甘为美帝效劳的奴才,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狂妄企图。

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上述各軍事訓練基地有美军顧問进行活动外,在其他蔣軍中也有美军顧問,人数最多的要算远征軍了。在各个集团軍內都有美军顧問的組織,設置各兵科的顧問人員。

美军顧問人員和蔣軍人員一样,都是銀样蜡枪头。在打通滇緬路的对日作战中,就是在美国顧問的策划下,在美国空軍的支援下,以数十倍于日寇的兵力,經過曠日持久的战斗,惨重的牺牲,才勉强把滇緬路打通的。

美军人員虽然嘴里唱着中美亲善的調子,而实际上不但不把中国人民放在眼里,而且还公然进行令人难以容忍的侮辱。如有

的人对小脚花鞋很感兴趣，把它带回国去作为到过中国的纪念品。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国侵略軍在我国各地以征服者自居，不断制造奸污中国妇女的事件。这类兽行，凡在美軍所到之处都层出不穷。当时美軍車禍之多，也达到惊人的程度。美軍人員駕駛車輛横冲直撞，草菅人命的事件，經常发生；美国軍車碾死了中国人頂多賠几文錢了事。至于酗酒鬧事，就成了家常便飯了。不仅如此，美軍人員还大量进行走私活动，他們和蔣介石軍政人員、不法商人互相勾結，盜賣軍用物品。当时在云南昆明一带，美軍物資充斥市場。昆明附近的云南驛是中印空运基地，也是美軍盜賣軍用物資的中心。該地虽然有美蔣軍隊严密警戒，但在儲藏物資的倉庫中，却仍然时常发生盜案，并且还常常发生因盜案而产生的枪杀案件。美軍軍紀的敗坏，并不比腐敗透頂的蔣介石軍隊相差多少。

当时以蔣介石为首的蔣軍中上层人員，向美帝卖身投靠，把維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統治，乃至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美帝身上。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美軍顧問人員逢迎諂媚，无所不用其极。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当上宾供养，住的是当地风景优美、建筑华丽的地方，吃的是山珍美味。最无耻的是在所謂“盟軍招待所”內，招收妓女供美軍人員发泄兽欲；还有所謂“吉普女郎”招搖过市。伤风敗俗、辱沒民族人格莫此为甚，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以为恥，反認为得計。

由于国民党政府卖国求榮，認賊作父，对广大官兵也通过电影、广播、报章杂志，以及各种集会講演、訓話，大量散布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毒素。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影响，不少蔣軍人員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走所謂美国路綫。如陈誠以得寵于美帝，取何应欽的軍政部长而代之，孙立人的飞黃騰达得力于美帝的支持，都是尽

人皆知的事实。而其他的中下层人员，则多方活动到印度或国内所办干训团，首先受美式训练，作为取得向上爬的优越条件。有些人甚至以穿美军衣服，说美国方式的英语，吃美国残羹剩饭（剩余物资），过美军的生活方式为荣，在反动集团中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在这些人的身上，充满了买办奴才气息，没有丝毫骨气，简直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的民族自尊心。

二 所谓“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

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迫使日寇投降。美帝为了进一步控制蒋介石军队，进行反苏、反共，实行所谓“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由魏德迈提出军委会改组为国防部的方案。军委会原为一个十分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除了军政、军令、军训、政治等四个部以外，还有办公厅、铨叙厅、调查统计局等单位。国防部于一九四六年夏改组成立，一切仿行美制，也就是“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的产物，是美帝直接控制蒋介石集团的最高统帅部的结果。按照美方的“建议”，国防部为行政院之一部，在部内又分部本部和参谋本部两大部门。部本部分设部长办公室及军制人事司（司长刘詠尧）等六个司，直接受部长的领导，是部长的幕僚机构。部长以内阁（即行政院）阁员身份职掌有关军政事宜，如军事预算、兵员征召等，对行政院负责。参谋本部的机构则极为庞大，除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钱卓伦）外，还设有一般参谋机构的六个厅，特设参谋机构的十一个局。六个厅的番号、职掌和负责人是：第一厅掌管人事及行政，厅长初为于达，后为方天；第二厅掌管军事情报，厅长初为郑介民，后由侯腾接替；第三厅掌管作战，厅长初为郭汝瑰，后为罗泽闓、蔡文治等；第四厅掌管后勤补给，厅长杨业孔（后留美）；第五厅

掌管編制訓練，厅长初为方天，后为刘云瀚；第六厅掌管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长錢昌祚。十一个局的名称职掌和負責人是：副官局主管人事及行政，局长初为陈春霖，后由萧西清繼任；預算局主管財務預算，局长赵志尧；政工局（前名新聞局）主管政治訓練，局长邓文仪；民政局主管战地民政，局长刘翔；保安局主管保安部队編練，局长唐縱；監察局主管監察，局长彭位仁；史政局主管史政，局长吳石；軍法局主管軍法，局长刘千俊；兵役局主管兵員征召，局长初为郑某后为戴高翔；預备干部管理局主管預备干部培养訓練，局长蔣經国；保密局主管軍事特务工作，局长初为郑介民，繼为毛人凤。特业參謀在业务上应受一般參謀指导，如第一厅及副官局都主管人事及行政，第一厅系主办人事及行政上的決策事項，即对有关人事及行政方面政策之确定，和有关法令規章之拟訂，而副官局則主办有关人事及行政的具体工作。在国防部之下，分設陸軍、海軍、空軍及联合勤务等四个总司令部。在各总司令部内分設各署、处，署为一般參謀机构，处为特业參謀机构，其分工及相互关系，与国防部厅局同。參謀总长在軍政方面，对国防部长負責，向部长請示汇报。在軍令方面，則是全軍的參謀长也是全軍統帥參謀长，直接向作为全軍最高統帥的总统負責。在总统府內設有軍务局（局长俞济时）掌管軍务。

国防部成立后，由白崇禧任部长，次长三員为秦德純、郑介民及刘士毅。陈誠任參謀总长，次长亦为三員，初为林蔚、刘斐、郭忏后方天繼郭，萧毅肃繼刘。其中負主要責任的为林蔚与刘斐，林管軍政，刘管作战。按照上述国防部长与參謀总长职权划分，部长只是一个按期参加行政院例会，照轉參謀总长提出的軍事預算案和兵員征召案，表面上是參謀总长的上司，实际上毫无实权，对下下达

命令都用參謀總長名義。所謂部長不過是一個名義好聽的閑員而已，大權完全操于參謀總長陳誠之手。這也是蔣介石一貫玩弄的排斥異己的手法之一，對桂系主要人物的白崇禧，表面上委以重任，實際上是奪其兵權。而白崇禧本來是一個不甘寂寞的野心家，豈肯雌伏、安于現狀，因而和蔣介石親信陳誠之間的明爭暗鬥至為劇烈。例如：關於國防部對下行文，用部長的名義還是用參謀總長的名義，是部本部與參謀本部之間長期爭執的問題。這項爭執，結果還是由美軍顧問團裁決，仍用參謀總長的名義行文了事。又如：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臨行前在南京表示很有把握，結果被人民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垂頭喪氣而回；白崇禧即趁機在國防部的一次紀念周上加以攻擊。大意是：“我歷來都不主張打打談談，我以為要打就打到底，我對馬歇爾三上廬山（因為蔣介石住在廬山，馬歇爾到廬山去會晤蔣介石），每次都很耽心，果不出我之所料，竟把事情弄到這樣糟糕的地步。”白崇禧的這一席話，不但打擊陳誠，而且對美蔣也非常不滿。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蔣介石軍隊連續在各地被人民解放軍大量歼滅。陳誠遭到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敵對派系的攻擊，一九四八年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同學春節聯歡會上，就有人公開提出撤換陳誠的要求，在國大中也有這樣的反映。陳誠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離開參謀總長的職位；而蔣介石也鑒于大勢已去，需要象陳誠那樣的親信為他準備後事，才把陳調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這時白崇禧也到“華中剿總”去了。國防部長由剛從美國回來的何應欽接替，參謀總長由顧祝同繼任。何、顧均系蔣介石嫡系人物，彼此交情又好，過去都是陳誠的老上司，並且都受過陳誠的氣，都是不滿意陳誠的人，彼此利害一致，而何的資格又在顧之上。所以在何顧上台以

后,对下下达命令(通令性质的复制文书)又改以部长名义行之。这里说明了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制度,是因人而异的,也说明了因人设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作风。这时美国顾问团已开始撤退,对于所谓新制也不似前此之坚持了。

三 美军顾问团高于一切

美国军事顾问团也是一个庞大的侵略机构,官兵人数达二千余人。它的组织悉如国防部,国防部有一个什么机构,顾问团就有一个什么组织。陆、海、空、联勤等四个总司令部的顾问机构也是一样。顾问团设在南京“国防部”对面的一幢华丽的大洋房中,住宿地点则在金陵女师大附近,都是当时的第一流建筑。除了在南京的机构以外,在上海还设有办事处。美军顾问团人员受到蒋介石政府的最好的供养,一个少校级的官员,就有一辆专用小轿车;当时南京顾问团的小汽车之多,就是国防部也比不上。

美军顾问团第一任团长为鲁克斯中将,继任者为巴大维中将。巴大维在侵朝战争中,曾任美国侵略军第四师师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手下的败将。这事足够说明这些所谓美军顾问到我国来是干什么的,他们原来是侵略我国的急先锋,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参谋长为白宁克准将,第一厅首席顾问为班维尔上校,副官局首席顾问为范希勒上校,顾问有魏才德少校等。当时不仅国防部各厅、局及四个总司令部各署、处有美军顾问组织,即各军事学校与实行所谓“新制”(按即美制)的单位如后调旅等也遍布美军顾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蒋介石既然倒在美帝怀抱,因此,国防部人员把美国军事顾问团当成最高决策机关、太上政府,把顾问当成太上皇,一切听命于美国顾问,形成了喧宾夺主的形势。这对

于美国侵略者来说，自然是“得其所哉”了。

美軍顧問团总是千方百计地对国防部进行控制，其具体作法是：（一）以顧問团或其各个系統的名义，用备忘录的形式向总统、国防部长参謀总长提出“建議”。（二）用中美联席会议的形式，贯彻美方意图。中美联席会议分高級的和一般的两种。高級的在国防部方面，由国防部次长、参謀次长以下，厅、局、司长及必要的处、科长以上人員出席，多半由掌握大权的林蔚亲自主持；顧問团方面，由参謀长，各系統的首席顧問和必要的顧問出席。此項會議旨在解决各厅、局、司和厅与厅、局与局、司与司間有关推行美制上的主要問題，每周或半月开会一次。名为會議，实际上是由美国顧問讲述其对某項制度的主张，或对某种問題的意見。国防部人員只是当学生，靜听訓誨，即使发言，也不过是对美方发言中的某些問題的質疑問难而已。一般的联席会议，即厅、局、司一級的联席会议，則极为頻繁，有时天天开，有时隔一天或两天开。美方由首席顧問和有关顧問出席，国防部則由厅、局、司、处科长以上人員出席。此項會議仍然和高級联席会议一样，由美国顧問提出对有关工作的主张和意見，或者讲述美国的軍事制度，或者对国防部人員提出的問題予以解释。（三）工作检查督促。美軍顧問人員对其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要求，中美联席会议所作出的决定非常重視，总是通过工作上的检查督促，求其实現。他們深知紧紧地控制国民党軍隊的最高統帥部，是达到侵略中国、进行反苏反共的必要途径，所以經常深入到厅局的处、科、股进行检查。在检查中，除了考查是否認真贯彻他們的主张以外，还注意到处理业务上的每一个細節，如收发文程序乃至应用卡片等，是否按照他們的慣例行事。按照他們的要求是：凡百事物，美化程度越彻底越好。

在当时的国防部中,美軍顧問团可以左右一切,它的权力是超乎一切之上的;顧問团的主张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顧問团团长不但可以直接对总统送备忘录,甚至还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使用压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一九四八年,魏德迈到我国各地视察以后,不是曾公开斥責国民党政府腐敗无能么?蔣介石集团不是乖乖地不敢做声么?在国防部内部,部本部与參謀本部之間,各厅与各厅之間,各局与各局之間,或厅局之間,常常发生爭权夺利、勾心斗角的糾紛。在双方打官司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总是乞求美国顧問作主,結果总是被美国顧問支持的一方获得胜利。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种奴才作风:大凡各单位做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事先都要走顧問路綫,先取得顧問的同意与支持;在各单位之間发生意見分歧时,在公文往返爭議中,彼此都爭相援引对本单位有利的顧問团备忘录、中美联席會議記錄、或某一顧問的談話記錄,罗列成几条几款的理由来駁倒对方,以贏得胜利。如副官局为了和第一厅爭夺人事业务的主管权,即搬出顧問团所建議的业务职掌划分:“一厅是一般參謀机构,是軍官人事任免升迁奖惩及行政的决策者(掌管將級独立团长以上的人事管理权);具体承办人事及行政业务是属于特业參謀机构的副官局的职掌范围。”就是这样副官局就夺得了除将官及独立团长以上的軍官人事管理权(后来又实行了各总司令部及各軍师的分权发布)。

美軍顧問高于一切,还表現在进出国防部及对国防部人員的态度方面。

国防部为蔣軍最高統帥部,同时又接近蔣介石“官邸”,警卫特別森严。除本部人員外,就是四个总司令部的高級人員,沒有来宾証也不能进出;而美軍顧問团人員則可以出入无阻。不仅如此,就是

进出各厅、局的办公室，也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可以随便打一个招呼就走进办公室，有时并且毫无礼貌地坐在办公桌上，要求国防部官员答复他所要了解的问题，或者陪同他一起去“视察”。按照军队的官阶，国防部人员总比同级美军顾问高得多，而实际上美军顾问的一个少校或上尉，可以驱使国防部的上校乃至至少将级的单位主管官。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和蒋帮人员的俯仰由人、卑躬屈膝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 引狼入室，推行美制

由于蒋介石集团引狼入室，实行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锐意推行“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对美帝彻头彻尾地做到了亲如一家。当时国防部对美军顾问，保密问题是不存在的。如上所述，各种重要措施都经过事先协商。而在文书方面，不但对下达全军的复制文书，如一般命令、人事命令、公报、通告等须分送美军顾问团各单位，而且对其它有关单行文件也送副本。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曾由美军顾问团用航空测量我国军用地图，此项纸版后来竟送到美国去了。美帝侵略的无孔不入，蒋介石集团的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行为，在在令人发指。

特别恶毒的是，美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把我国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以中国人作反苏战争的炮灰。美军顾问团在“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的口号下，为蒋介石反动政府设计的整个一套军事教育和国防设施，都以苏联为假想敌国。当时在国防部第二、三两厅和参谋学校（即前陆大）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参谋作业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苏联的国家性质能否改变？斯大林的继承者为何人？以及苏联的国防力量和对苏作战应采用什么战略战术

等。

“口蜜腹劍”是美軍人員的写照。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一次中美雙方副官人員的宴會上說：“中美之間既有傳統的友誼，現在又如此親密合作，將來如果中美之間會發生戰爭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強調中美傳統友誼的巴大維的部下，打巴大維的嘴巴。他們不斷地對中國人民發生暴行：如該團士兵以殺害中國人作為遊戲取樂，把在南京大中橋乘涼的我國同胞，從橋上拋到秦淮河里淹死。又如該團的某上尉在孝陵衛打獵，任意打傷中國居民。其它各地的美軍暴行也層出不窮，如漢口景明大樓的集體強姦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兵皮爾遜奸污案等，都是哄動全國的事件。賣身投靠美帝的國民黨政府竟不顧人民死活，對美帝暴行噤若寒蟬。當人民羣眾起來反對時，他們或者以“中美邦交為重”，來為美帝開脫，或者干脆禁止人民正義的反美運動。

美軍顧問團除了對國防部進行控制以外，還大力推行美式軍事教育。訓練對象有軍官的也有士兵的，訓練方式有正規的學校教育，也有短期的速成訓練。這也符合蔣介石所一貫推行的以軍事教育為手段，來培養其反動武裝力量，實行法西斯軍事獨裁的意圖的。在正規的學校教育方面，除把原來的陸軍大學改為參謀學校，步、騎、炮、工、通、輜等專科學校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學校，海軍學校等分別改隸於國防部及陸、海、空、聯勤四個總司令部以外，並新增設了許多學校，如副官學校、財務學校、情報學校等。單是聯勤總部所轄的學校，即達十餘個之多。這類所謂新制軍校，都有美軍顧問主持訓練。至於短期訓練，在南京是以“中央訓練團”為訓練基地，大量開設各種各樣的短期訓練班，如監察人員訓練班、保密人員訓練班、兵役人員訓練班、新制研習班、新聞班（後改稱

政工人員訓練班)、文書研習班等等。此外，還以蘇州、台灣、成都等地作為基地，開辦各種短期訓練班。一九四八年秋冬間，國民黨軍隊被人民解放軍歼滅殆盡。美蔣為了進行絕望的垂死掙扎，補充訓練反動軍隊，由陸軍總部成立陸軍訓練處，由副總司令孫立人兼任處長，先將二十個後調旅分別集中台灣、南京、蘇州等地訓練，然後再輪訓其它部隊，此項訓練也由美國顧問主持。此外，還派遣大量的軍官直接到美國去留學，以培養為美帝服務的第一等奴才。在當時的蔣介石軍事集團內，以留美學生最吃香。這就使得有不少的人多方鑽營到美國去鍍金，把精力集中到學習英語上面去了。

國防部對於“新制”(美制)的推行，確屬奉命唯謹，不遺余力。當時該部規定：該部及直屬單位，各新制軍校，陸軍訓練處所屬各後調旅等，都為實行新制單位，按照美軍制度辦事——實行人事日報制度，以考查和控制各單位員額，並根據員額核實補給。這樣作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消滅蔣軍中的吃缺貪污現象。但因國民黨反動透頂，其機構也腐朽透頂，事實上貪污現象既未根絕，部隊員額也無從核實。

國防部中的有些單位更是醉心美制，副官局就是這樣的單位之一。在人事及行政業務執行上，幾乎照美軍制度全部實行。在文書方面，一九四八年，實行文書改革，頒布文書手冊，把過去层层轉令的文件，改為集中一次複製發布——由國防部一次印發全軍受文單位，其它單行文件也去掉了“等因奉此”等套語。在檔案方面，擬訂檔案手冊，推行美軍檔案十進分類法。在人事方面，依照美軍方式，改用人事命令發布有關人員升遷調補等事項；實行員額日報以控制全軍定員和現員，仿照美軍方式整理人事籍錄，建立個人檔案等。為了建立和推行這些所謂新副官制度，除了在國防

部举办文书讲习班以外,还分别在中央训练团开办文书、档案讲习班,副官学校开办特别班和初级班,以培养训练副官人员,因而颇得美军顾问团的支持和赞扬。

不仅如此,在形式方面,连服装式样、官阶标志等等,都仿行美制,彻头彻尾地模倣美军,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奴才样子。

在淮海战役快要结束时,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美蒋自知大势已去,蒋政权向广东逃窜,美军顾问团人员则前往台湾、日本等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活动。

(政协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蔣家王朝末日的狐鼠哀鳴

蕭 作 霖

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到一九四八年，已臨于末日。從其親信和黃埔學生中許多人的喪氣哀鳴，即可見他當時已處絕境，力窮勢去，眾叛親離。

一九四八年初春，我和黃雍在上海同樣覺得有說不出一股郁悶無法排遣，因相約去游西湖。到達的當天晚上，浙江省保安處長竺鳴濤邀宴于其家，肴饌極盛，席間他說的却盡是那些頹喪消極的話。他本是信佛的，說什麼大劫已到，无可逃免，只有皈依我佛，了此殘生；并說他已決心要到天目山去靜修，無論怎樣也不再干下去了。他還勸我們說：“你們悶了到西湖來，可是我就住在西湖也是悶，就算你們來玩一趟覺得好點，回去上海又還是悶，反正氣數盡了，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一樣。我勸你們也一心虔誠，皈依我佛，那還有片淨土可以安身。”他的父親是蔣介石的把兄，並曾有恩于蔣，因此蔣介石視他為子侄，親信更異于其他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但在这時，他也不信蔣而只信佛了。我們在杭州住了四天，一連三天三夜都是在排定了的午宴、晚宴和夜宴相接連中混了過去。宴會都是極極奢侈，主人們都相互爭豪夸富、揮金如土，好象不赶快把錢花光就將不再是自己的了。在这三天三夜，我們醉得沒有醒過，醉中狂舞亂跳，大家倒在地板上打滾，有人狂笑不休，也有人痛哭不止，只覺得天昏地暗，不知此身竟在何所。笕橋的中央航空

学校教育长胡伟克(黄埔六期)也陪着我們一連狂醉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早晨他的副官来找他回学校做紀念周,晚上他来告訴我們說:“当时我在台上只看到台下烏黑一片,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們說我是倒了下去就鼾声大作起来,这几天真是醉得太厉害了。”我說:“你这个样子搞下去,恐怕你这个教育长就靠不住了。”他滿不在乎地說:“管他靠得住靠不住,反正誰也都是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了。其实我們这几天还算不了什么,前些日子經国(蔣介石的大儿子)在这里,比这几天这个样子还要鬧得凶,他醉得只要跳楼,我是醉死过了一次。現在还不及行乐,更待何时。”当时真說不出大家是一种什么心理,都象发了狂似的。現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末日临近的气压使然。

在“国大”丑剧开幕的前几天,竞选副总统的孙科、李宗仁、程潛都有人在上海进行活动,大家都竞赛着請客。孙科在上海的代表人,不知我是为程潛竞选的,而以为我是黄埔学生,一定会听蔣介石的話为孙帮忙,在一次宴会时竟也請了我;我也乐得去参加,看看他們是請的些什么人。这次宴会是在黄浦江边的一家外国人开的飯店举行,席散时我在厅外平台上,遙望到黄浦滩,不禁想起二十年前我从广州經香港逃到上海上岸时那个狼狽情景。忽然宣鉄吾走到我身旁問我在想什么,我說:“我在想当年从那个黄埔島逃到这个黄浦滩时的往事,現在可就只有这个黄浦,沒有那个黄埔了。”他說:“不,是那个黄埔变成了这个黄浦了。那时是我們对別人‘怒潮澎湃’,現在可是別人對我們‘怒潮澎湃’了。”我說:“革命怒潮是挡不住的,我們都是过来人啊!”他微微地叹口气說:“这有什么办法,我們从黄埔来,将来只好还是到黄浦去。”我問他怎么个去法,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指了指說:“跳黄浦江!我看这样下去,

将来我們恐怕只有这一条路好走。”我們都相互默然了許久。他又接着說：“老头子(指蔣介石)还要我帮忙孙科竞选副总统，还叫設法要人不选李宗仁。老实說，我是誰的忙也不帮，現在誰还管得了这些閑事。”宣鉄吾曾屡次任过蔣介石的侍卫长，为其最亲信的学生，这时是淞沪警备司令，却也居然不愿听話了。全国大陆解放后，听說他还在香港搞过些时的什么第三条路綫的活动。

更使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蔣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对蔣久已私怀离弃。远在一九四一年，我和他同住在重庆南岸黄桷埡；每到星期日，我們总是他来我往地在一起小飲談天。他說他原是在法国学农业化学的，对政治并无兴趣，回国后蔣介石硬要強迫他管机要，这已使他用非所学，事与愿违。尤其是对于許多年来他所亲知的蔣介石一切不可告人的肮脏秘密，他說“只要还稍稍有点人性的人，絕不会不感得万分可恥可恨而深恶痛絕的”。他說他有苦衷不能把蔣介石的許多罪惡秘密告訴我，他只談过一些关于蔣介石的家庭之类的丑惡瑣事。但他絕对肯定地說：“如果还想这个伤天害理的人会有一天能把国家搞好，如果說这个殘破局面还能維持得下去十年，我都愿意用輸头来打賭。”他說他对政治前途早已絕望，总想搞他的农业化学，只要等到抗战一結束，就杀头也不再干下去了。一九四八年我决定随程潛先生回湖南去时，他設宴为我餞行，却沒請一个陪客。他說：“我还很有点怀念过去我們在黄桷埡的那些日子，今后将永远不可再得了。老实說，你这一走后，我們恐怕也多半是后会无期了，所以我不請別人，还是我們两人象在黄桷埡那样的再最后欢談一次罢。”他不愿談时局，只說：“我也怕共产党来，不过早就沒有法子挡得住他不来了。我們只有准备作白华，別无出路，最好不再談这些。”我問他自己到底怎样打算，

他說：“我還能作什麼打算，辭職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因為我所知道的一切罪惡秘密就是我的絕命東西，我這一生還能有我自己的自由嗎？”可是解放後，聽說他畢竟還是離開了蔣介石，並在香港取了蔣介石借用他的名字存在外國銀行的一筆巨款跑到巴西去了。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也是蔣介石最親信學生之一的憲兵司令張鎮，回到湖南接他的家眷。他和我一向私交很好，當時他將家眷安頓到什麼適當地方才好的問題來和我商量。他說：“現在大局完蛋是肯定的了，將來不知要拖到哪裡去。我的家眷已經是病得要死的人，你看把她安頓到什麼地方為好？”我問他自己的主意怎樣，他說：“看來恐怕會只有到台灣去的了，我想把家眷先送到香港再說。”我說：“那末你何不就一直把她送到台灣去算了呢？”他說：“到台灣又誰知道蹲得住幾天？最後恐怕只有跳海這一條路！”我更主張他先把家眷安頓到澳門，同時我就試着想說服他跟着程潛先生走，建議他尽可能將他的憲兵團調集到江西和湖南來再說。他說：“你的意思我明白，老實說，你們的情況我也知道一點；我和你是這樣好的朋友，對頌公（指程潛）我也一向很尊敬，我絕不反對你們無論打算走什麼路。可是我自己就和你不同，無論如何，老头（指蔣介石）對我個人是不錯的，你知道戴笠和陳誠那樣的想把我打下來都沒有辦到。現在明知道到了只有跳海的時候了，我也只有跟着他跳海，沒有辦法。我們弟兄只有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臨別時，他淒然地握着我的手說：“老弟，我們這就是永別，不要說再會了！”

在最後兩年的那些日子裡，我所接觸到的還有許多黃埔同學和當權人物，一見面不是長吁短嘆、傷心喪氣的人是很少的，充耳都是一片悲慘的絕望哀鳴，充滿着末日淒涼氣氛。

袁世凱帝制活动与粵皖系之爭

周 志 俊

吾父周學熙字緝之，晚年別号止庵。在袁世凱統治時期，曾兩任財政總長（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五年）；第二次任職時，余隨侍在京。洪憲帝制經過，余略有所知，曾囑吾女周叔嬪寫入所作《周止庵先生別傳》中，茲特重作敘述如下：

袁世凱任總統時，有所謂皖系、粵系者。以粵系論，則為當日盛傳之交通系，以粵人梁士詒（燕孫）為領袖，而以叶恭綽（訥虎）等佐之。其大本營為鐵路、關稅與交通銀行、戊通公司等。至所謂皖系者，並無具體組織，當時以吾父為旗手。然吾父平日以剛愎自用、不樹朋黨自負（當時有《當代名人傳》，謂吾父剛愎自用，吾父見之亦不以為忤），實際上皖人楊士琦（杏城）為政事堂左丞，足智多謀，實為皖系中心人物；但以吾父不畏強御，又掌握財政經濟，故視為盟主。吾父之再長財政，本無出山之意，正避壽他去，楊親費總統命，以拜壽為名，入室搜索，擬強起任職。吾父入都謝壽，遂被留任。

時楊與梁同得袁信任而互不相下，遂伺隙相攻訐。津浦路局為交通系籌款之源，收入巨，用人多，借以培植實力，弊端日著，輿論譁然。遂由肅政使王瑚、蔡寶善赴津浦路密查，羅列十大罪狀，由都肅政使莊蘊寬具呈嚴參。時王瑚以廉勁著稱，所列當不虛。因此

更涉及京汉、京綏、沪宁、正太四路，即所謂袁劫一时之五路大参案也。当时众議沸騰，袁世凱迫于輿論，遂將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廣麟、京綏路局局长关冕鈞均离职听审，交通次长叶恭綽亦暫行停职，听候查办。同时，財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岱杉）虽为我父僚佐，而傾向于梁，阴为呼应，掣吾父肘，曾以重金收买吾父廢紙簍以偵查机密，为吾父所知。吾父遂先发制人，具折糾参，张奉令发往四川陈宦（二庵）处効力。一时粤系惶然，密議对策，思所以轉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凱长子克定相結納，迎合袁之意图，創为帝制之議。楊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建議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并通电各省軍民长官，嗣遂宣言君主立宪为最适宜。彼輩复利用美国人古德諾作文贊助之，組織全国請愿联合会，推定沈云霈为会长，那彥图、张鎮芳为副会长，梁士詒首先署名为发起人，并列名其他文电甚多。梁年譜中既不能掩盖其事，因詭称为他人代签。以如此重大事件而一签再签，当时既不申辯，則所謂“他人代笔”，殊难令人置信。

时梁任全国稅务督办，因以帝制筹款自任，并起用革职上海道粵人蔡乃煌充任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員，以港沪关栈存有印土六千箱，因借寓禁于征之詞，拟征收报効，每箱四千五百元，預計可得巨款二千余万元作为帝制經費。袁世凱帝制之决心因此更坚。吾觀梁年譜中明載由彼会同內务总长朱启鈴呈請特派員办理禁烟事宜，則蔡乃煌之任命及其以后之烟膏专卖、招商垫款等办法，皆当日秘密建議，以博当局欢心。盖在任何反动政府中，所謂禁烟机关，实际即为专卖筹款机构，决非真正执行禁毒工作，此乃人所共知之事。蔡乃煌之任命，既由內务部与稅务处会銜，自与財政部无

千。蔡之被任为禁烟特派員，在当时当然負有筹款責任，而梁燕孙年譜中竟謂梁拟肅清烟毒，特派“清正大員監察繩糾”，此种說法，适足令有識者齿冷。至蔡乃煌既系粵籍，原屬梁之私人，任上海道时声名狼籍，輿論沸騰，因此革职。梁、朱既起用蔡，必然有所勾結。蓋禁烟之事，何以要有稅务督办会銜，显見目标即为处理关栈存土，則在梁、朱会銜之时，即已早有打算。至于蔡乃煌到粵，在龙济光操縱之下，在具体处理办法上，新旧商行之間，可能有所爭執，但变卖烟土为帝制筹款，則已早决定于蔡乃煌出京之前。梁为洗刷自己，遂在年譜中将蔡乃煌筹款之責任推在財政部身上。其实关栈存烟，属于稅务处管轄范围，禁烟特派員屬內务部系統。当时吾父在財政部所管范围限于田賦、官产、一般烟酒公卖（鴉片不在內）及盐务等（盐务署长例由財政次长兼任，故隶属財部）。至关税則归稅务处，为独立系統，由梁士詒任督办，不受財部节制，是交通系之禁樹，絕不容皖系染指。若謂关栈存土变卖之款，不由梁經手上繳，而通过財政部来作帝制經費，則殊不可解。而且当时如果吾父有意利用烟土筹款，自必选用自己亲信，亦决不至假手于一粵籍之蔡乃煌当此重任。梁年譜中云：“外間不察，有疑蔡乃煌禁烟筹款为先生（指梁士詒）所主使者。”可見当时众目昭彰，已成定案。梁死后，交通系为梁翻案，亦为自己翻案，因此曲笔辯护。但只此数語，是非已明，欲蓋弥彰矣。

查筹安会六君子在政治上并无势力，而交通系在各方面羽翼甚多，既借帝制为重整旗鼓之妙計，遂成为帝制之中坚分子上基本力量。在筹安会成立以后，交通系人物积极活动，兴高彩烈，弹冠相庆。当日五路大参案中中心人物赵庆华竟得起复，由梁保荐办理向协約国运送軍械之重任，正說明当时袁、梁之关系，亦即为粵

系参与帝制、恢复势力之铁证。梁年谱中谓梁养病西山，受人监视，而竟能向袁保荐被参革职之交通系首要人物，并且与袁讨论参加欧战、运输军械等重要决策问题，岂不自相矛盾？至于吾父因反对帝制，失欢于袁世凯，奉命迁居北海“濠濮间”以防他去，则形同软禁，终至去官。（当时吾父几有生命之虞，幸吾祖父周馥与袁世凯为儿女亲家，曾致函关说，并询问有无称帝之议，袁复函以吾父多病，暂住北海，将来可准予辞职，对帝制则矢口否认，信中并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句。）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拥护共和之通电，为第一篇讨袁檄文，明明请“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铃、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此十三人即当时所谓“十三太保”。至袁世凯失败后，为惩办变更国体首祸诸人，梁士诒等受到通缉，至吾父原属袁氏多年亲信，且身居财政显职，而事后安居津门，则当日谁负帝制筹款之责，不辩自明。

查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为公使团中首席，在华多年，袁世凯称帝，事先曾得其谅解支持，故敢于发动。朱之目的为诱袁参战；向香港运军械，亦为交换条件之一，故由梁士诒保举赵庆华主持。梁、朱（尔典）在北洋多年友谊，袁与朱之勾结亦即通过梁手。英国后来表面变更态度，系迫于局势，其实朱尔典一贯好用两面派手法，所谓袁、朱（尔典）密谈，都离不开梁之穿针引线。

故论民国之变迁，既以洪宪启纷争之局，而洪宪之发动，实由于五路参案。杨、梁之斗法，亦即皖、粤两系之消长。当然袁世凯久蓄帝制野心，在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之下，迟早终必走上帝制之道路；但粤系为恢复势力，实起推波助澜之作用。当时各僚中反对帝

制者，为吾父与陆军总长段祺瑞，皆皖人也。楊士琦为固宠計，則倒向帝制方面。此亦足以見皖系并无正式組織，第各行其是耳。

內务总长朱启鈴，虽貴州人，而属于交通系，对帝制最熱中，曾担任大典筹备处事宜。筹安会初成立，吾父子进見时詢袁意旨，袁尙极端否認，及至后来，竟避而不談。吾父既作諫阻，遂相疏远矣。当张弧等被參时，北京报纸曾引唐诗諷之曰：“圣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踟躕”，盖知其必不安于失敗，即将卷土重来；而孰知彼輩竟将国家体制为孤注，以恢复其派系势力，盖所謂一切不顧者矣。

在袁世凱統治时期，皖、粵系之爭，主要在財政經濟方面；此时所謂皖系，与后来北洋軍閥皖、直系之爭中以段祺瑞为首之皖系，并非一事；当时皖系既无具体組織，亦无地盘，故吾父及楊士琦退出政治舞台，皖系遂不存在。而粵系則自梁士詒之交通系，后来轉为叶恭綽之新交通系，一脉相承，以交通邮电为根据地，势力頗大。

查旧社会有諛墓习惯，年譜、行狀、墓志銘多系亲友执笔，故不免隱惡揚善。梁之年譜作者为死友迴护，原屬一般慣例，不足为怪。但在新社会中，我們撰写历史資料，必須要有真实性，必須对后人負責。例如吾父在第一任財长时，經手善后大借款，助长袁世凱之反动势力，打击孙中山第二次革命，我固不能为吾父諱。至吾父第二次任財长时，整頓財政，变赤字为积余，并創辦紡織事业，幻想資本主义工业化，虽对袁氏素抱知己之感，但在帝制問題上竟不肯依附，此亦为不容歪曲之事实也。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

遇 变 日 記

金 梁

《遇变日記》是金梁（息侯）先生未經发表过的手稿，內容是关于一九二四年溥玉祥驅逐溥仪出宮时的一些資料。

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受到民国政府的优礼，在故宮繼續住了十三年。他在故宮里，不但照旧临朝听政，賜謚贈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复辟。

金梁当时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对复辟的幻想最为強烈，因此在溥仪被逐出宮后也最感到痛心。他曾付出极大力量替溥仪謀划应变的策略，《遇变日記》就是記叙这段事实經過的。

《遇变日記》中的甲子年部分，都是当时所記；乙丑年部分，是事后的追記。作者为了向他的朋友胡晴初介紹“遇变”的經過，曾把两部分輯在一起。后来又經作者重訂一次，并增輯了一部分奏疏、代拟文件、文稿和函牋，定名为《遇变記》，但內容甚为蕪杂。我現根据重輯本删減其无关重要或重复的資料（參閱文后目录），重新編次，拟添标题，加以校訂、标点，公諸于世，以供治清史及民国史者参考。

李 世 瑜 一九六〇·五·十

甲子十月初九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午下四鐘,警厅友言,始知有兵围大内、追上出宫之举。急奔至西华門,門閉不能入,复至神武門,聞駕已赴北府^①矣。追至府后胡同口,兵警严阻,行人不得过,遂急繞至旂坛寺,訪馮軍友人,托問确信。据云决无危险。又托友問張总监,电话亦云无危险。归已夜深矣。

后聞前一日郑苏公^②即請上出避,为左右所阻。是夜复偕日医至北府,請偕出,亦阻不得行。

初十日(六日)

閱报始見修正条件。邵伯綱諸君皆聞而来慰問,共議一面由蒙藏人力爭,一面由外交团抗議。

午至北府,兵警阻不令入,遂訪使館友人,均代不平,謂將提出質問;有請出避并設法謀派兵保护者,以求庇外人非正办,当以俟事迫再議答之。

夜罗雪堂^③自津归,謂段已来电,此盖事前往津求段,未知仓卒遽有此举,电来已不及阻矣。

是日内外消息隔絕,各出奔走,不及相謀,焦头烂額,狼狽已极。

十一日(七日)

議員罗、陆諸君来言:何不集同志力爭,两院当援助。又使館

① 北府,即醇王府,在德胜門內甘水桥。醇亲王奕譞之府,原在石駝馬大街西鮑家街南,光緒帝誕生于此,后改为醇王祠堂,另建府于德胜門內。因在原府之北,故称曰北府。

② 郑苏公即郑孝胥,字苏堪,曾任清室管理內务府大臣。

③ 罗雪堂(下雪叟同)即罗振玉,字叔韞,又字叔言,雪堂其別号。清室南书房行走。

友人亦來言：已口頭質問政府，如有正式團體公函，尙可據以提出正式質問。遂先草《滿蒙回藏人宣言書》一篇，訪蒙古王公，擬集眾會議，宣示中外。又托友向二李疏解，略謂上早派員清理古物，議設皇室博物院，用意正同，何相迫太過。并致一書解之。得復云：不為已甚。然封檢內宮，嚴圍北府，仍日迫一日也。

附录《滿蒙藏人宣言書》：

近見公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及各报所载強迫移宮情形，有強权，无公理，中外人无不同憤也。优待条件临时国會議決，与約法同效，是法律也。条約載明“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且曾通告各国，实与国际条約无异，是条約也。以命令变更法律是危国本也；以私意強改条約是破国交也。法律而可以命令变更也，非特清室一族已受其危也，凡滿蒙回藏实同等优待，无不同受其危也，即汉族全体亦将不能受法律之保护而人人自危也。国本危矣！条約而可以私意強改也，非特与条約同等之清室优待条件已破也，凡与东西各国所訂条約无不可以私意強改而全破之也。国交破矣！以一二人之私意遂至变乱，法律破坏，国交其失，不已甚乎！是当先請撤銷修正案，然后再將原訂优待条件明交議會，应否修改，依法議決，如果公議修改，仍須双方同意，并通告各国，始可履行。盖优待条件不尽限于內政，非特案关法律，且亦效等国际条約。此次国民軍事事以依法为号召，知与革命不同，而馮总司令諸公又皆尊民意，主公理，为中外所共欽，当必能依法据理，維国本而保国交，而有以平中外人之同憤也。公道自在人心，真理岂能久屈，愿与中外人共評之。

十二日(八日)

訪宝瑞臣^①，定次日在滿蒙协进会开会，复訪蒙藏人約會議。

至北府，仍被阻。唯陈、朱^②两师傅得入，即近支皇族亦不任出入也。訪陈师傅未遇，至焦急。唯聞段已連电飭阻，当无意外危险。

訪王靜安^③，晤儒二爷^④，知柯(劭恣)、罗偕庄士敦^⑤往謁英公使，尚无办法。

十三日(九日)

赴滿蒙协进会，会长那王及貢王等皆不到，宣言不能发。

宝瑞臣言，今日門禁稍寬。恩詠春言，方謁內閣总理，亦似稍有顧忌。余意此次事中外皆为不平，而表同情于我者，以上平日之言行能以德感人也。上久有“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之意，出宮时亦对众言之，聞者皆动容。今如本此意宣言，并将以后岁費拨办慈善教育及文化事业，庶足以維人心而挽众望。何景齐、孙伯恆实創此論。

夜草宣言书。

郑炎佐^⑥来，謂有日本武官赴津愿代說張，囑作书报近状以激动之。炎佐日夕奔走，頗尽心力。

附录：《創辦平民工厂学校及文化慈善等事业条例》：

序言

“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予怀此志久矣。今幸得遂初愿，脫去束縛，初不意怀之十年而償之一旦也。虽有以事出仓卒为

① 宝瑞臣即宝熙，是清室总管內务府大臣。

② 陈即陈宝琛，朱即朱益藩。

③ 王靜安即王国維，清室南书房行走。

④ 儒二爷即溥儒，字心畲，为恭亲王溥伟之胞弟。名画家。

⑤ 庄士敦，英国人，为溥仪英文教师。

⑥ 郑炎佐，名禹，为孝胥之子。后随溥仪赴滿，嫺日語。

予不平者，實則我心所安，又何必問緩急乎。予亦一平民耳，既享法律保護，何必更爭優待。

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歲費，不愿獨受，當撥辦平民工廠、平民學校，先就京城創設，逐漸推廣。予愿盡一手一足之烈，專心力于教養平民。此款雖微，愿与平民共之，即應得私產亦當捐充教育、慈善、文化各事業之用。召集中外名流，會議辦法。至圖書博物館，予早議設立，曾派員清查、籌備，尤乐观厥成。予毫无成見，但行我心之所安，想必為中外人所共諒也。

一、由清室定期約集中外名流，會議創辦平民工廠、學校及文化慈善等事業辦法（另有名單）。

一、酌定各項用途如左：

平民工廠十萬元，京城內外擬先設辦十處；

平民學校十萬元，京城內外擬先設二十處；

慈善事業十萬元，如擬設醫院于京城及頤和園等處；

文化事業十萬元，如擬補助北大國學研究古物調查等費；

其他備用十萬元，如各處振災及京城冬振粥廠等項。

（以上酌擬大略仍由會議決定）

一、創辦各事擬先設籌備委員會，俟陸續開辦當設董事會，均由中外名流公推組織成之。

一、所有應得私產擬撥充上項議辦各項事業之基金，只用利息，不動本金，當設“基金委員會”保管之。

一、常年各項及基金暨年息如何分配，均由公議決定，并得清室之同意行之。

一、第一次會議以在公共處所為宜，能借用北大講堂禮

堂为議場最佳。

一、“清室宣言书”拟用通电，庶中外皆知。

一、拟設一“平民日报”为所办各項事业作通告，事事公开。

十五日(十一日)

晨赴北府，見上頗有忧容，面递宣言书稿閱之，欣然曰：“此正合予意，数日悶甚，得此释然。非常之变，須非常之才，汝前所陈奏，如早能行，何至有今日事。当时予屢与众爭，皆力阻，真可恨。今日予决发宣言。”

时陈宝琛、朱汝珍同入見，遂交同閱。

陈言：“岁費尽捐，日用何恃？須提出日用。”

上曰：“予不忧餓死，此何必慮！”

梁曰：“岁費本不可靠，私产亦听人支配，捐办慈善教育等事，当集中外名流，合設财产保管会，正可据以代爭，此欲取姑与之策也。蓋优待一事，当由众人代爭，上非特不必自爭，且当表示不屑之意，以示天下为公。”

上大以为然，决发宣言，通电中外。及梁出，仍为众阻不得发。

十六日(十二日)

复召入見，并命侍膳，一再奖諭能見远大。

梁先递条議，中有“虛名上之帝号不可要，人心中之帝号不可不要”等語，尤蒙称叹。复囑拟目前应急办法数条，又飭开中外名流名单一紙。

又密諭：“左右日日言危险，又束手无术，予意唯謀出洋游学。”

梁对曰：“左右日日言危险，仅仅以身家性命为慮，用心未尝不佳，所見未免太小。天子受命于天，自有天眷，無論目前决无危险，

即此后待时而动，亦不必过于忧虑。天下无餓死之志士，更无餓死之圣君。且古来只有化家为国，未聞化国为家；盖化国为家者，国亡則家无不破，而身无不灭者也。观今日之人心輿論，因祸为福，实有轉机。倘能发表宣言，昭示中外，使人人皆知天下为公，别无他意，然后复我自由，再謀游学，托內事于忠貞之士，图其大者远者，一旦有机，立即归国。臣意乱极必治，其端已見，必不远也。”

是日孙伯恆^①来，言馮公度赴津說段，段連发五电，严責彼党，始稍斂迹。后知謀出公度，意思誣害，公度即避入法医院矣。又段复郑电，阻上入使館。

附录《中外名流名单》：

赵尔巽、王士珍、李家駒、蔡元培、熊希齡、梁启超、汪大燮、李煜瀛、蔣梦麟、胡适、江亢虎、薛篤弼、刘□□^② 牧师、馮恕、惲宝惠、庄士敦(英)、福开森(美)、鐸尔孟(法)、伊凤閣(俄)、載涛、載洵、溥伦、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宝熙、柯劭忞、罗振玉、那彦图、貢桑納尔布、叶公(应为“恭”字之誤)綽、孙壯、邵章、王揖唐、张学良、楊宇霆。

以上中外新旧各界及亲貴內廷均各略举数人，尙应添入。如外人須往来，各国皆有人为佳，又蒙藏亦应酌添数人。

十七日(十三日)

佟揖先^③来，言其本家佟上公有素識之义国武官，言可派队保

① 孙伯恆，名壯，北京商务印书館經理，为馮公度之弟子。公度名紹，北京电灯公司创办人。

② 刘□□牧师，是刘芳牧师，与馮玉祥有亲戚关系。

③ 佟揖先即佟繼煦，福州駐防旗人，郑孝胥管理內务府时，引为“堂郎中”。溥仪为伪滿皇帝时，佟任宮內府警卫处长。

护。罗雪叟及儒二爷闻而同往商请，未能如约。求助外人，实非得已，亦各行其是，各尽其心而已。

十八日(十四日)

至北府。王爷^①先出，数言近日事已和缓，汝所言，众议不妨再看云云。及入见，则王已先入，盖虑吾之多言来监视耳。时朱师傅亦在，亦言再看。

上谓：“十三年来无日不言再看，今万事已看完矣，何犹曰再看、再看也！”

梁对：“今所谓再看者，无非看段、张耳。无论段、张不足恃，即能恢复九日以前之局面，能再入宫乎？能再受赵孟贵贱之优待乎？今唯有还求诸己，速以收拾人心为主，不可束手待人宰割也。”朱以他语乱之。

上遂言：“内务府事事耽悞，即论御膳，前须月支三千余金，后减至月千余金，今予自料理，每日与后妃仅用四元耳。”言之叹息不置。

盖王出宫后，食用皆自备，王不供奉。又初拟赏溥军护兵需数百元，亦无款，当密奉千元，上御而后受。苏公请责亲贵各报効，上不愿也。

是日得章一山^②书，请东巡，并言陈筱石^③师、唐少川均有函致段、张，即为代奏。又奏：孙韬、沈继贤亦自上海来叩安。

附录《请速发宣言疏》：

古来英主必求自立，日前闻上决发宣言，此所谓求诸己

① 王爷即醇亲王载灃，溥仪之本身父。

② 章一山，名榘，浙江临海人，甲辰科翰林，与金梁同年。

③ 陈筱石即陈夔龙，曾任直隶总督。

也。乃左右仍以再看阻之，十三年来无日不言再看，今万事已为左右看完矣，犹曰再看、再看，誠不知是何心肝也。今彼党方内鬩，及是閑暇，正天賜以机，今再不言，恐后并发言之机而不可得矣。今所謂再看者，无非看段、张耳，無論段、张必不足恃，即能恢复九日以前之局面，上能再入宮乎？能再受赵孟貴賤之优待乎？事已至此，假【皇帝】必不可做，要做必做真【皇帝】；蓋必能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此臣目前所以言虛名上之【帝号】必不可要，而人心中之【帝号】必不可不要也。且□□老辣百倍今党，其束縛必亦百倍于前，我能忍乎？且即能复优待，还财产，□□有挾而求，彼时虽欲不受而不可得，进退維谷，不能自由，何如今日早发宣言，使中外皆知，确出于上一人天下为公之心乎？今事已至此，帝王自有真，岂不有命在天，万事不必过忧，即如前之議出避，后之求洋兵，皆作茧自縛，徒为人笑。今为上計，唯有速发宣言，收人心，以挽輿論。托內事于忠貞之士，而先出洋游学。图其大者远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臣意乱极必治，其机已动，必不远也。

二十二日(十八日)

至北府。久待，及入見，則王又出而監視，不能多言。上数目王，王不顧。梁只言：段、张将来京，应如何派員与之接商，請开御前會議，先議办法，万不可各执一見，各不相謀，使无所适从。蓋必上下一心，凡事預定，庶对内对外皆有把握，不致一誤再誤，俯仰由人也。上頗然之。蓋近日左右意見紛歧較甚于昔，仍是爭宠爭利之故态耳。主辱臣死，尚何宠利可爭，至死不悟，唯有痛哭而已。

訪罗雪叟。聞亲貴有公函与张雨亭，托使館轉天津領事代递。

又是日聞二廖被害于熱河，即上達，上頗惋惜。乃有人竟斥以變節。余確知二廖志節士，始終不變，迹雖為人，心實為我，此次無異于死王事也。

二十五日(二十一日)

至北府。先晤王爺，及召見，則王又先入，上已知有監視意，遂詢梁曰：“汝來已久耶？”王遂逡巡而退。

梁乃對曰：“初九之變，主辱臣死，諸臣共患難，以效奔走，感恩圖報，各盡其心而已。乃聖府叩安者，常為左右所尼阻，偶有入見者，且受無謂之監視，逐臣好為直言，尤觸左右之怒。特今日何日，同心御侮，猶慮不及，豈可再自疑忌，以誤大事！愿上速自振拔，能不効聲色而屏脫左右之拘束，以慰眾望，則幸甚。”

上曰：“予決敝屣一切，謀出洋耳。”

梁又對曰：“臣請分別論之：宜言敝屣，既示天下為公，歲費財產盡推與平民共之，尤足挽人心而塞眾口。然上可不爭优待，而眾不可不代爭优待。爭得以後，故宮不可再入，旧制不可再復，即帝号亦不可虛拥，但聲明如為對於蒙藏必須留此虛号，亦不堅持。一面自行清理，宮殿則一律開放，財產則分別公私，籌設博物、圖書館，并創辦工厂、學校及振濟等事。事必公開，利必濟眾，布置略定，再議出洋。此次實受過激派之波及，大亂未已，此其动机。清室為眾所指目，先出遊歷，避此風波，俟事定再歸，亦善策也。”

上曰：“汝言皆合予意，唯汝能有遠見，與諸臣不同。今時移勢異，將來即有恢復之日，亦不能尽拘旧法。故宮徒受束縛，旧制徒供剝削，虛号徒作傀儡，眾徒為自私自利計耳。”又詢：“出遊宜何國？經費約几何？”

對曰：“赴英為宜。當以遊學為名，上及后妃并帶教習、翻譯及

文学侍从各一、二人，約岁用十万元，以三年計，分年預备，亦不难筹。”

又詢：“众不見阻否？”

对曰：“左右唯在独断。至外間，当先疏解，名正言順，亦似不能強阻也。”

是日瑜、璿二太妃出宮。璿太妃金棺已于二十三日先厝广化寺，瑜、璿二太妃初誓不出宮，紹英等竟为人用危詞代迫先移金棺，二太妃不能忍，遂郁郁而出，暫住大公主府。

二十九日(二十五日)

謁張雨亭，对于优待一事，頗持公論，遂为拟維持办法五条：

一、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約法，非可輕議修改，应請交善后會議，在未議决以前，仍照辛亥原定条件办理；

一、“清室善后委员会”应停止，設“清宮管理处”，由清室自行清理、保管、开放、陈列、筹办博物、图书等館；

一、由清室約集中外名流，另开会議，筹議清理、保管、陈列、开放一切办法；

一、宮内現駐軍隊应撤退，由清宮管理处接管，調警保卫。

并另录送段合肥一份，倘能照行，及是閑暇，庶可急筹挽救之策。盖自段、張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原訂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宮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証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

是日聞北府駐守馮軍撤退。

十一月初一日(二十七日)

那王約在滿蒙协进会會議。初蒙古王公均畏事不敢出，及貢王謁張，張責以滿蒙休戚相關，何不力爭？至是始約众集議，以逢承張意，晚矣！

聞日前有面斥某毫無心肝者，有指笑某老而不死者，有面責某某自私自利不值一錢者。乃聞之不以為恥；近且欣欣然復有得色，又將騎馬乘肩輿出入神武門，以食三品料為榮矣。

是日聞宮內駐守馮軍將撤退，改歸陸軍部派兵駐守，足見交還之望已絕。或謂前日太妃如不出宮，此時即可據請收回，自行守衛，較之已完全交出者尚有措詞也。

初三日(二十九日)

下午至北府，駕已出，陳、鄭、庄侍行。先至德國醫院，即臨日本使館，是時大風揚塵，黃沙蔽日，黯淡無光，至暮始霽。柯鳳老^①筮易安吉。

聞今日趙次老^②承東張意來為政府任調人，唯謂必先正式承認修正條件，始可議還私產，保身費，否則身命且危云云。众聞之皆駭然，何其喪心病狂一至于此，或傳者故甚其辭耶！

初四日(三十日)

晨赴日館見上。請出洋留學，擬呈宣言書一篇。

左右以今既脫險，又聞各使館均示好意，一月忧虑，至是釋然。有主張力爭恢復優待者，有主張俟彼政府有正式表示再議者，有主速出洋者，有主緩出洋者。梁意既決出洋，所有優待、善後一切事宜，可責成諸臣，相機交涉。上對彼政府舉動，儘可置之不理，唯對

① 柯鳳老，即柯劭忞，字鳳蓀。

② 趙次老，即趙爾巽，字次珊。

于大众，不防(妨)仍本初意，宣示天下为公，以释人疑，而挽众望，此梁呈拟宣言之意也。人贵求自立耳，早行我策，财散于民，物公诸世，得道多助，以德服人，天下孰不怀而归之？较之求外人、求军人，不可并论矣。今不得已而出避，使君父託庇于外人，此亦吾辈之耻，忧患方深，詎可引以为功，自鸣得意，见之愧愤欲死矣。

初七日(十二月三日)

疏請出洋。略謂：左右忽进力爭优待之說，夫优待应爭也，然上不可自爭，仍当由众爭之。近聞□□将来京，□□軍隊尽为之用，将行过激，难免变出非常，請立速出洋。拟庄、罗随行，而王爷及陈、朱二师留京办理善后，并請授郑孝胥全权，力爭优待；至清理财产，則拟派近支王公及內廷书房、內务府各員分任之；清理內务府旧管款目、債務等事，則責成紹英、耆龄等专任之。附开名单呈覽，书上留中。

附录《請立速出洋疏》：

非常之变必以非常之举应之。上久怀非常之志，“敝屣一切，还我自由”，在宮时即时时言之，出宮后且对众言之，报纸宣传，中外称頌。及出避使館，左右忽进力爭优待之說，夫优待应爭也，然上不可自爭，仍当由众爭之。一至使館，忽然变計，似恃外力而假虎威，不慮为人笑乎？誠能早如上之初志，决发宣言，财散于民，物公諸世，得道多助，以德服人，天下孰不怀而归之？胜求外人、求軍閥多矣！今不得已而出避，致君父託命于外人，此正臣子之耻，何忍引以为功，自鸣得意！臣实愧愤欲死！今唯立速出洋耳。聞□□到京，□□軍隊尽归□□用，难免变出非常，愿上毅然独断，决計出洋，速为筹备，万勿迟疑，幸甚、幸甚！

再臣子上出遊之日，擬有出洋宣言書，曾交鄭孝胥、羅振玉閱之，茲復錄呈一紙。再上如決速出洋，所有隨侍出洋及留京辦理善後各事，宜急須派員，分別籌備，茲妄擬名單一紙呈覽。

附一、擬出洋宣言書

人貴自立耳。予久思出洋遊學，苦為舊制所拘。今幸脫去束縛，還我自由，決意出遊，求新知識于世界。唯平日待食于吾者眾，流離可憫，當為代籌生計；又目睹京外貧民，不免凍餒，亦當為廣謀教養。予不忍一人獨適，當將政府歲費，盡推與眾共之，先就京城內外創辦工廠、學校數十處、即應得私產亦當撥充慈善、教育及文化之用。圖書、博物等館，早曾派員籌備，尤樂觀成。擬即廣約中外名流，會議辦法，期在必行，事必公開，利必濟眾。予他年畢業歸國，亦唯專力于平民事業以盡吾心。此予素願，蓄之有年，今將行矣，幸一白于大眾之前。唯我邦人君子，其共鑒之！

附二、擬隨侍出洋及留京辦理善後各事人員名單

一、隨侍出洋：庄士敦、羅振玉、溥儒等。

一、留京辦理善後事宜：王爺、陳寶琛、朱益藩。

一、辦理善後并與民國交涉等事宜：鄭孝胥，（授以全權）。

一、清理財產事宜：近支王公、內廷書房、內務府各員。

一、清理內務府舊管款目債務等事：紹英、耆齡、寶熙、榮源等。

一、籌備約集中外名流會議設立清室財產保管會等事宜
另開名單

一、籌辦工廠學校等事宜：柯劭忞、馮恕等。

初九日（十二月五日）

聞升吉帥^①來京請安。初某與鄭大鬧意見，某乃召升來，挾以爲重，升見上而某之說行，鄭遂決然去矣。

近日衆對優待條件議論紛歧，鄭主力爭，某主訕步。余意目下彼政府負責無人，何必自擾？將來當爭原訂優待全文，不可爲枝節之談。唯上斷不可自爭，無論原訂條件，修正條件，皆當以不屑爭視之，乃今日竟諭下內務府行文，誤矣。

後知近日有人頗思爲包圍計，專在排鄭，非爲爭優待也。君子爭寵，小人爭利，嗚呼，死無日矣！

十二日(八日)

疏請追留鄭孝胥。略謂：鄭孝胥去矣！亦知其去實由左右之排擠乎？孝胥非畏禍之人也（諺者以畏禍責鄭，可笑。若則真畏禍，而入日營矣）。孝胥有毅力而无私心，可託大事。臣前請速出洋，而授孝胥以全權辦理善後，蓋知今日左右，唯孝胥能當此重任也。臣擬力疾往追，責以大義，強之回京，愿上一言以爲信。中心迫切，不知所云。

二十日(十六日)

代呈奉天袁金鎧等十六人進奉款。自遇變後，余函奉、沪，商進奉事，唯陳夔龍等五人及劉承幹各有進款。此次奉省且有不識姓名者數人與其列，可謂難得矣。乃內務府有款二十餘萬，上欲提一萬而只進五千，余皆耗去。若輩之肉，尙足食乎！

今日朱、柯、胡^②三人同見，三人先退，梁復密請追回鄭孝胥。上慨然曰：“予切望其來，汝速發函。”臨出又諭促即日發函，足見望鄭之切矣。

① 升吉帥，卽升允，字吉甫，曾任陝甘總督，積極主張復辟者。

② 胡爲胡嗣瑗，字晴初，貴州人，癸卯科翰林，其鄉試與金梁同年。

归立发快函、悬速来京，一面并电炎佐世兄亦函催。

二十九日(二十五日)

苏公复书不能来，即呈览。奉谕“决出洋，原拟过年，今提前。得当即行，倘不能遽脱身，当电召即来。并飭密谋独出，不必与众商”云云。上意既决，左右或不能再阻乎！然苏公不来，内外接洽皆无人，恐仍不能遽行。归即函达苏公，并劝速来。

今日蒙赐照片，赐茶，奖谕有加。又索阅“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集”，即进呈。

乙丑元旦(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入贺。上初谕元旦、万寿皆免贺祝。是日诸臣坚请入贺，梁随班入，相对凄然。礼毕退，不觉痛哭失声。急归，有诗纪感。诗曰：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駭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血淚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忽梦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余生唯一息，叩枕徒哀鸣。

十三日(二月五日)

诸臣入祝，梁避銜名，虑再失仪，未敢入。

近两月为奔走谋出洋，先后商诸日使及执政。上亦囑日使转商段执政，坚请始允。唯左右仍阻。初言无款，梁回知款已备矣；又言日本商接待，梁固知日本已允接待，特不能明布耳；又言执政不允，则时亦商妥，以为左右可无阻矣。乃抗阻如故，可叹可恨！

二月朔(二十三日)

夜，上奔津。先是决出洋，日使转商执政，初不允；后请之坚，段执政乃曰：“初欲留议善后事耳，今一时尚无办法，既坚欲出，不

敢強留。”行装备矣，左右仍尼阻。新党聞將行，登報攻击，且辱賢左右。諸老不自安，始決行。

是夜八時，日人護上乘京奉通車，羅振玉侍行，夜午抵津，宿大和旅館。

初二日(二十四日)

后妃亦到，移駐張園。上初意到津即出洋，諭不必租屋，并拟發通電，聲明出洋遊學，無他意。乃左右既抑電不發，且以万余元租張園為久居計；分派職事，稱“行在”，中外譁然。

初三日(二十五)

梁追赴叩安，請速出。上猶曰：“已發通電，即行。”而不意諸臣之抗阻如前也。

與胡晴初同年論爭優待書(代跋)

聞公力疾北來，至佩忠奮，亟思一談，乃彼此相左，至悵悵也。

近頗有以撤帝號、散私財，且阻爭優待為梁罪者，梁知罪矣。然梁實未嘗阻爭優待也，特言上不可自爭，當由眾代爭耳！辛亥優待，謀出彼黨，本非佳話；上“天下為公”，中外傳頌，昔日之優待不足為榮，今日之取消不足為辱。且上久有敵視一切之意，在宮時既時時言之，出宮時且對眾言之；趙孟貴賤，何足輕重；自當示不屑之意于天下，此不可自爭之說也。唯優待條件，效等約法，又同條約，詎容以私意變更？事關國信，非特我輩當力爭，即彼黨亦當同爭。且梁主當爭原訂全文，一字不能易，不可為枝節之爭，授人以隙，此由眾代爭之說也。至帝號，上意不愿虛擲，然梁仍請聲明，如為對於蒙藏必須留此虛號，亦不堅持。廓然大公，以退為進，則梁之意不待言矣。又

岁費私产，主权在人，皆不可靠，公諸于众，轉可代爭。此欲取姑与之策，財散民聚，梁意亦似未可全非也。总之，梁所議者，皆系更进一层之办法，其中实深有用意，聞者不諒，遂有誤传。

逐臣好为直言，久触众怒，欲假之罪，何患无辞。苏公且再被逐，梁何足論。恃公知我，妄贊一言，附呈日記，閱毕擲还。容暇再走談，匆匆不尽。

本文未录篇目：

- (一) 請籌議派員与段张接商疏，
- (二) 再請速发宣言疏，
- (三) 請預謀办法以处理善后疏，
- (四) 請尽脫左右之拘束疏，
- (五) 請追留郑孝胥疏，
- (六) 致张雨帅书稿，
- (七) 复章一山同年书，
- (八) 与梁众导同学书，
- (九) 与許俊人同年书，
- (十) 与人論清室早議設立图书、博物館书，
- (十一) 奉天进奉款人名单。

进步党和研究系*

華 覺 明

一 进步党的由来

民国成立，各省政客蜂起，团体林立。时同盟会已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国民党，主急进；而海内有些政客，以为宜有缓进党以调剂之，遂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之出现。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派蒋介石僱用光复会中人王竹三刺死后，会众无所归。黄羣、陈叔通原属光复会，因共发起民国公会。时北方有以籍忠寅为首之共和协进会，武汉有孙发绪、孙武、时功玖、刘成禺等人组成之民社。籍南下谋合并，与黄、陈到武汉晤民社诸人，遂商定三会成立共和党；后梁启超亦正式加入。民主党者，系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其前身为前清各省諮議局联合会，曾联合进京，请愿提前召集国会，被清廷驱逐出京。该党同人因曾共患难之故，颇有相当团结力。临时参议院成立时，院内惟国民党与共和党人数为最多，其次则民主党，与共和党为友党，互相提携。统一党者，以王揖唐（即王廣）为中心，初只二三十人，嗣经多方拉拢，旧与袁世凯统

* 本篇采取了华觉明原稿的一大部分，又从梁启勳所记乃兄梁启超当时事迹及籍忠寅《困斋文集》自叙成立进步党研究系始末情形中补充了一小部分，加以整理，仍由华觉明署名。华系汤化龙主办《天民报》的编辑，相随有年，故知之较详。又陈叔通副主席曾核阅此稿，来函提出意见；原函附文后，以供参证。邢贊亭附记

治集团有特別关系而当选为議員者紛紛加入，故人数驟有增加。

一九一二年八月，各省依照临时約法和临时参議院通过的国会組織法、参众两院議員选举法，开始办理选举。至同年十二月，参众两院議員均已选出。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第一屆正式国会召集会。四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各省依法当选的参众两院議員齐集北京象坊桥新落成的众議院議場，举行国会第一次开会典礼。当时检点人数，国民党議員将近五百人，在参众两院中均占絕對多数；共和党議員不足三百人，民主党議員不滿百人，統一党議員亦仅百余人。袁世凱見此情形，大为惊駭，派梁士詒、张一麐等四出活动，促使梁启超、湯化龙、王揖唐等把共和、民主、統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来与国民党相抗衡。

二 进步党的組織及其領袖人物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共和、民主、統一三党合并而为进步党，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湯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彥国、孙武、王廣（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为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党内組織分为政务、党务两部：政务部之下設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各科；党务部之下設文牒、會計、交际、地方、庶务各科。部有正、副部长各一人，科有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办公地点在宣內未英胡同，开大会地点則在七爷府，有些省份分設支部。进步党宗旨以国权主义相揭櫫，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反，凡旧官僚中不滿意国民党的人，多数加入。其議員中如梁善济、孙洪伊、田駿丰、林长民、李国珍、陈国祥、王家襄、陈汉第、籍忠寅、周大烈、刘崇佑、黃羣、徐佛苏、时功玖、蓝公武、方济川、周兆沅、胡源汇、彭汉遄、王敬芳、蕭湘、蹇念益、胡汝麟、向瑞

昆、陈光燾、罗綸等，皆为骨干分子。此外如张嘉璈、胡瑞霖、张瀾（进步党四川地方党务負責人）、张君勱、刘道鏗、陈博生等，虽非国会议員，因与湯、梁私交关系，亦加入該党供其驅策。未几，孙洪伊对于党內的民主派湯化龙、林长民等发生意見，就率領他的亲信議員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时功玖、周恭寿、謝远涵等三十余人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当时称他們为国民党的“小孙派”。

进步党的黨員虽由三党組成，惟有共和党的梁启超、民主党的湯化龙与周旋湯、梁之間的林长民等，对于党务很热心，經常到党部参加会议，因此进步党就形成湯、梁两派交换意見的机构。

参議院于四月二十六日选举张繼为議長，王正廷为副議長，国民党仍占上风。众議院于四月二十八日选举，湯化龙当选为議長，陈国祥当选为副議長，在众議院中进步党算是获胜。于是国会中成为两党对峙之势。

三 进步党的經濟来源和机关报

当进步党成立之时，袁世凱曾在借款項下撥給一批党費，該党通过会商，指定刘崇佑、胡瑞霖等三数人保管。該党最初之机关报为《天民报》，原在象坊桥观音寺出版，由湯化龙的友人毕惠康主办；后移至永光寺西街，由湯化龙的胞弟湯毓龙接办，湯化龙常在报上化名发表文章。洪宪帝制事起，湯逃往上海，該报就被帝制派的湯用彬打着湯蕓銘的旗号夺去了。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詳見后）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繼，法統恢复，湯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鏗为經理，李大釗为总編輯。不久，值张勳复辟，該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作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

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編輯，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此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亦皆研究系所办，为时較短。該系又在存款中提出一部分，派李大釗、南开鍾、蔡天民等赴日留学，后来湯化龙赴美考查，也是动用此項存款。

四 进步党与袁世凱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进步党开会討論时局問題，梁启超为主席，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当时以此議付表决，多数贊成，惜不能坚持到底。后宪法迄未草就，总统先行选出，一九一三年七月，进步党拥护熊希齡組閣。九月十一日，熊閣发表，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汪大燮，皆为进步党理事或名誉理事。另一进步党理事湯化龙則任众議院議長。他周旋于总统府、国务院及國會之間，甚得袁世凱的信任，以故其弟湯薌銘得任为湖南都督。这时进步党的主张是拥护袁世凱、抵制国民党，企图由該党出而組閣，借以扩充其政治势力。而袁世凱則欲一己独攬大权，不为政党政治所束縛，不但討厭国民党，即对于进步党也非真正信任，只是利用一时，使他的正式大总统得以当选，当选之后即欲其停止活动。未几熊閣垮台，該党閣員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也連帶辞职。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軍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十一月四日，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銷国民党的国会議員資格，并追繳其議員証及徽章。进步党虽未被逐，但已成虛設。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无形停頓。袁旋又下令取銷国民党的各省省議會議員。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机关至此已摧毀殆尽。此时袁世凱认为政客之流，除国民党外都可以設法使入彀中，于是悍然不顧一切，先組織政治會議代行国

会职权，复設立約法會議以修改元年約法，又成立參政院实施總統制，廢国务院，立政事堂，并下令解散殘留的國會議員及各省省議會。进步党的重要分子在政治上虽然敵視国民党，但看見这样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国民党人对湯、梁攻击則不遺余力，斥为阴谋派，是助紂为虐的劊子手。旧官僚加入进步党者睹此状况，紛紛宣告脫党。在此等情形下，进步党实已等于解散。湯化龙、梁启超等只好随时糾合少数人，在刘崇佑宅或其他适当地方会談，交換对时局的意見，保持联系。虽然如此，但袁世凱为羈縻进步党起見，对于湯、梁等重要分子仍优礼有加，分別罗致。一九一四年五月，任湯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參政院參政，任汪大燮为參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該党稍有資望者，或任为參政院參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湯化龙以众議院議長換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覲顏猎官，当时輿論多非难之。袁世凱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該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湯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該党主干人員商討就职后的安排，分別有所决定。因此湯于視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廢止讀經，只在修身教科书书里节取經訓，以孔子为旨归。湯明知袁世凱头脑頑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試探袁对該党是否尙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湯为离經叛道，請予罢免。參政院參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湯譴責甚力。湯上呈自行辯駁，結果仍准予照行。同时袁政府对于教育經費的拨款亦多方限制，如增加东西洋留学生名額、設立学术評定委员会、編纂教科图书等，表面上虽准如所請，实际上則事事勒指。湯曾上

呈陈訴，謂主計者与管学者背道而馳，一切教育事业无法进行，懇請辭職。袁仍批示慰留。即以此事而論，袁、湯之間的关系早已貌合神离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袁召集国务卿徐世昌率領各部总长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由外交次长曹汝霖报告已与日寇簽訂的卖国条約二十一条后，全席默然，无人主持异議。湯頗气愤，出来后就分邀林长民、蒲殿俊、梁善济、刘崇佑、罗綸、周兆沅等开会，报告此事，决定辭職。他隨即回家收拾行李，于次晨秘密赴津，住奧租界自宅，补上辭呈，交教育次长梁善济代递，部务由梁代行，未几即离津赴沪。由此可見，一九一五年七月以前，进步党与袁世凱是彼此互相利用的。以后就开始反袁了，述之于下。

梁启超自辭币制局總裁之后，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凱聘他为高等政治顧問；同年七月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推举他为該会委員之一。在楊度、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时候，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复議定改变国体問題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同年十月十六日，准該院咨称，已議定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會議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来解决国体問題，袁世凱申令允行。此时梁启超已准备反对帝制，与其学生蔡鍔佯示贊成，以释袁的疑心。蔡鍔并在將軍府領銜拥护帝制，使袁对他的严密監視稍稍松懈，乘机秘密赴津，东渡日本，偕其友戴戡經越南入滇，与督办云南軍务唐繼堯首先通电討袁，并請杀楊度等以謝天下。梁启超亦密行赴沪，在所办的《庸言报》上发表一文，題为《异哉所謂国体問題者》，措詞极为严厉，讀者无不称快。梁又亲往桂粵聯絡一切。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两广宣布独立，他倡为軍务統一之議。于是西南各省設軍务院于肇庆，为一切軍政民政、对内对外的机关。院置撫軍若干人，以唐繼堯为撫軍长，岑春煊为撫軍副长，梁启超为

撫軍長政務委員長，兼滇桂粵聯合軍都參謀。他五月二十日到滬，聞知父喪，遂辭去各職。由此可見，護國一役，四处奔走，使帝制速瀕崩潰，梁實與有力焉。

湯化龍赴滬後，在租界行踪甚密。梁過滬時，曾與湯會商，決定該黨要反對帝制到底。同時湯接到攻擊他的信帖甚多，為貫徹該黨主張計，發電切責袁世凱，說他的腦筋盡為舊思想所彌布，非時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謝國人，千夫所指，必至無病而死。電文甚長，曾見當時北京《順天時報》。當時一般輿論，謂湯氏兄弟二人，一個擁護帝制，一個參加討袁，各要一面，那面勝了，他家富貴如故。湯因此派該黨要員舒禮鑑特赴湖南，催促湯薌銘宣布獨立。湯薌銘初尚猶豫，說乃兄過于書生，不肯照辦。湯化龍復作專函，囑湯薌銘最親信的胡瑞霖切實勸告，湯薌銘始行獨立。及湯薌銘與陳樹藩、陳宦獨立電報至京，袁病勢業已沉重，以為親手提拔的人尚且如此，他復何言，因之羞愧而死。湯化龍與袁世凱的關係就是這樣結束的。

自此以上，為進步黨的活動時代；自此以下為研究系的活動時代。

五 研究系與黎元洪

研究系者，是進步黨憲法研究會的簡稱，亦即該黨的繼續。當反對帝制之時，國民、進步兩黨雖互相提携，袁世凱死後，乃又彼此背道而馳。兩大黨各分為數小黨。進步黨幹部中人則改組為憲法研究會，會址在石駝馬大街。既以研究憲法為標幟，不以黨名，也未設支部。當時湯化龍即有毀黨造黨之議，至此進步黨的名稱即無形中消滅了。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梁啟超、

湯化龍及其他骨干分子均回北京，乃以研究系為基礎，公開活動。在反對帝制時，梁、湯二人皆曾多所盡力，湯與黎曾共過患難，交誼尤篤（湯、黎同是辛亥武昌起義的人，黎膺湖北都督本湯向革命將領推薦，湯任軍政府民政部長亦是黎堅決主張的；湯薦銘得以出任湖南都督，也有黎暗中支援之力），黎既起用段祺瑞組織責任內閣，對於湯、梁所領導的研究系，衡情論事，似不宜過於冷淡，但事實並非如此。關於閣員人選，黎獨屬意於國民黨的譚延闓、孫洪伊、唐紹儀、伍廷芳諸人，于湯、梁並沒有特別推重。研究系當然不甚滿意，漸趨疏遠。推其致此之由，實因黎想借重國民黨以抵制北洋軍閥，期完成南北統一的大業；而研究系一向反對國民黨，國民黨銜之刺骨，黎若與研究系接近，國民黨的國會議員必不與黎合作，此黎所最慮者。加以內務總長孫洪伊與湯早已勢成水火；總統府秘書長丁世鐸，又系孫的亲信。湯認為黎已完全為國民黨的小孫派所包圍，不足與有為。孫洪伊主張孫（中山）、黎聯盟，來抵制北洋軍閥；研究系則主張黎段聯盟，來削弱國民黨。孫洪伊派與黎愈接近，研究系的湯化龍與黎的距離就愈遠，這是必然的趨勢。另外黎的左右如金永炎、饒漢祥、唐仲寅等，以為湯虽系湖北同鄉，已為研究系整體所控制而倒向段祺瑞的懷抱，害怕黎、湯經常晤談，于黎不利。當府院兩方衝突劇烈，要罷免段的總理時，湯化龍屢到東廠胡同求謀黎的一面，也被他們從中阻撓，迄未得見。湯很氣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劃一切；同時段在這一階段也想利用他們，故對於研究系的領袖極為優禮。而研究系亦認為段有實力，且做事負責，可以借其幫助，擴充該系的勢力，進而奪取政權。

六 研究系与段祺瑞

黎元洪繼任之初，段祺瑞組閣，府院之爭又起。研究系傾向段祺瑞，曾有相当之活跃。茲述其梗概如下：

（一）內务总长孙洪伊頗为黎所信任，参与一切密議，隱然执府中之牛耳。徐樹錚为段的左右手，以国务院秘书长而兼陸軍次长，儼然为总理第二。孙、徐二人彼此意見爭執，极不相容，黎、段感情因之益趋恶化。研究系对此問題，主张調換孙洪伊以息爭端。当时国民党的报纸都說研究系之提此議，是想以湯化龙接替內务总长，为段祺瑞捧場，其实众議院議長地位亦很重要，研究系詎肯輕易放弃。段以研究系对他十分殷勤，信任漸深。与研究系有密切关系的张謇、胡瑞霖二人分別被任为四川、福建省长，即是段根据湯化龙的意見，提交閣議通过者。

（二）黎元洪既繼任大总统，所遺副总统一职，依法当补行选举。国民党主张选段祺瑞，另举賢能为国务总理，借以削其实权。研究系則迎合段的意見，主张选馮国璋，并謂当选之后仍可以副总统領苏督，一以使东南重鎮，領袖諸省；一以使內閣不搖，中外相維，以固統一之局，实为两便。

（三）先是梁启超有对德絕交意見书，段見后极为贊賞，决意付诸施行，及至向黎提出，黎持慎重态度，謂必須征求国会同意，才能决定。研究系主张絕交，国民党以为非；院主絕交，府以为非，馴至党与党爭，府与院爭。段憤而离职赴津，經副总统馮国璋亲自由宁来津，从中斡旋，段始回京就职。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段在外交大樓宴請國會議員，疏通此案意見。湯化龙代表国会发言，表示全体贊成，研究系的議員亦尽力为段奔走呼号。三月十日，国会开

会，此案得以通过，黎元洪于三月十四日向中外公布此项文告。

(四) 文告公布后，南方要人如孙中山、唐紹仪及各省省議會、商会紛紛致电黎元洪，力陈加入协約国之失策。督軍中如張勳、倪嗣冲等亦来电表示异議。段以国内反对者众，乃电約各省督軍、省长曹錕、倪嗣冲等三十余人来京开会討論，結果一致贊成，并決議应当进而宣战。段恃有督軍团作后盾，把对德宣战案咨送国会，請迅速予以同意。当提交众議院審議时，段的亲信傅良佐(有說是王怀庆者，似非)竟僱用公民团包围国会，希图迫使通过，以致輿論譁然，更加激起国会議員的反对，决定无限期擱置。督軍团聞之大憤，主张解散国会，另行改选；而国会則要求黎元洪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两方各走极端。对这样严重的問題，研究系却玩了两面手法：对于公民团的要求，由湯化龙以議長資格接見其代表，予以駁斥；而对于罢免段的总理案，既不反对，又不贊成，抱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黎元洪从国会之請，免去段的总理本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另提李經羲为国务总理，征求国会同意。免职令下，段即卸职赴津。此时研究系的主要分子梁启超、湯化龙、林长民等仍然表示与段合作，取一致行动，随之共同赴津；研究系的机关报亦移津出版，为段宣传。

(五) 当参战案擱置之际，督軍团各派代表赴徐州开会，討論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提出改組总统府，解散国会，于必要时得进行复辟。以故會議之后，复辟之謠言甚熾。迨段免职令下，安徽督軍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奉天張作霖等十余人紛紛响应，并在天津設立軍务总參謀处，以复辟派雷震春为处长。而山东、直隶、河南各省亦各派重兵，向黎威胁。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

(六) 在此等情况下，南京的馮国璋忽向国会辭副总统职，表

示不負責任。黎元洪益感孤立，迫不得已，徇李經羲之請，電召張勳入京調停。張勳率軍隊五千人前來，抵津後，即電黎限期解散國會。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因不肯副署解散國會命令而辭職，黎改任江朝宗代理，使此項命令倉卒得以副署。黎之手忙腳亂，莫知所措，竟至于此。張勳入京後，並不與黎謀面，悍然演出復辟的丑劇。黎逃往日本使館，即電南京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并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令其興師討逆。段自聞復辟謠傳後，決意反對，事前已有所準備。他派徐樹錚往蚌埠詢倪嗣冲對於復辟的意見，倪復電不参加；又派傅良佐訪第八師師長李長泰征求意见，李謂唯命是听。故復辟事起，段于七月三日即到馬厂李長泰軍中督師戡亂，分三路進攻北京。梁啟超親贊戎機，軍中文告皆出其手。其他研究系要人湯化龍、林長民等亦皆通電聲討張勳，對段擁護備至。到了七月十二日，復辟亂平。

（七）復辟叛亂既已平定，黎元洪引咎卸職，堅不復職，元首虛位無人。湯化龍代表舊國會赴南京歡迎馮國璋到京就代行大總統職。馮于八月一日抵京視事，段援引研究系組成聯合內閣，以酬其合作之功。段以總理兼陸軍總長，湯化龍長內務，梁啟超長財政，林長民長司法，汪大燮長外交（汪為舊進步黨，雖非研究系，但事事跟着湯、梁走，與該系保持相當的聯繫），在九個閣員中已占其四。此外，教育總長范源濂亦與梁有師生關係。這算是研究系最得意的時期。

（八）段內閣再度成立之後，各方面的人士希望恢復舊國會，以完成和平統一的事業。但研究系的閣員們則認為中華民國約法已隨張勳復辟而消滅，今國家新造，應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勿須恢復舊國會。段亦慮舊國會不易駕馭，竟用其

謀，因而废旧法，定新法，召集国会。凡持法統論者，皆謂解散令本系非法行为，起而力爭。云南督軍唐繼堯首先通电拥护約法，西南各省紛紛响应，相繼宣布独立。而兩院議員的一部分，又自行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举林森为参議院議長，褚輔成成为众議院議長，另組軍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繼堯、陆荣廷为元帅，以与北京政府相抗衡。南北战争又起，国家元气因之大受损伤。推原祸始，实由于研究系反对恢复旧国会而主张召集新国会，致鑄成此六州大錯，不但誤段，而且誤国。

（九）段閣請馮代行大总统，公布对德奥参战文告之后，即設参战督办处以总其成，段自兼督办，并假借参战之名大借日寇款項，扩充軍隊，欲謀武力統一全国。在此等情形下，研究系才覺悟到北洋軍隊是不容易为政党所利用的，对于拥护段的态度稍稍有所轉变，不象从前那样积极了。

（十）湯化龙所长之内务部，本为办理国会的最高指导机关，又派研究系的重要分子籍忠寅为筹备国会事務局委員長，他以为拥有这两个地位，将来新国会选举时必可以获得多数議席。孰意临时参議院召集以后，选定王揖唐为議長，那彥图为副議長。段并使王揖唐組織安福俱乐部；关于新国会选举准备事宜，亦由王揖唐秉承徐樹錚意旨，一手办理。选举实权皆操諸安福系手中，内务部及筹备国会事務局不过徒具虛名，无法再行过問，这是对研究系当头一棒。从前扩大該系的迷梦，組織一党内閣的幻想，至此全化为泡影。研究系参加段內閣仅四个月，該系的閣員們只好憤而辞职。其他如内务次长兼北京市政督办蒲殿俊、財政次长凌文淵以及随梁、湯、林各总长上台的該系次要分子，亦相率与之俱去。研究系与段的关系即以此而告断絕。后来新国会选举揭晓，安福系占有

多数議席,事事为所操縱;研究系当选为議員者仅寥寥数十人,相形之下,已属无关輕重,結果如斯,当非該系預料所及。

七 湯、梁下野后的行动和湯死梁去后的研究系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研究系的閣員們退出段閣后,其重要分子經常在刘崇佑宅集合开会,梁启超偶然出席。在集会中,大家都感觉到北洋軍閥封建頑固,不足与謀宪政;段祺瑞迷信武力統一,再难共事,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鸛蚌相持的錯誤。他們决定派湯化龙、林长民两人同赴日本考查,与日本在野名流犬养毅等取得联系;湯在日本考查后,再赴美国一行,以期与美国朝野有所沟通。湯等出国以前,曾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发表一文,說明当时国家形势成为国民党、研究系、北洋軍閥相持的局面,及該党苦心調停,斡求共同制宪、納国家于正軌的經過。原文对北洋派多譴責語,对国民党多諒解語,頗引起各方的注意。湯在瀕行前一周,在石板房头条私宅宴請研究系留京要人三十余名。席間田駿丰因痛飲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过量,以致醉死于沙发上。湯頓足大哭,极为哀悼。越数日,湯、林束装就道,带陈博生为秘书,抵东京后曾与犬养毅晤談数次。任务完毕,湯因所余旅費不足游美之用,打算同林长民一道回国;但研究系北京方面不甚同意,当向四川省长张瀾在北京所設的行署借得万元,派霍烈白送往东京,促其成行。于是湯以霍烈白为秘书,乘舟赴美。抵华盛顿后,通过中国公使顧維鈞的介紹,分赴美国各州考查,并到处聯絡华侨,作公开的講演,随时将考查情况及演詞寄交《晨报》发表。一九一八年八月底,湯在維多利亞温哥华候船回国时,适当地华侨中湯姓較多,天天有人宴請。九月一日晚上,在当地华侨会馆宴毕步出門口时,

忽有理发师王昌从人丛中向他連击三枪，當場中弹毙命，王昌亦自戕而死。噩耗传来，研究系疑为是徐树錚遣人所刺，所以罗伦的輓联中，有“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之句，含有諷刺段系的意味。嗣經詳細調查，始知凶手王昌是由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当时正在温哥华，王昌亦系国民党党员）以五千元僱用，使之行凶者。虽然此事尚属疑案，后說似属可信。湯的遺骸由研究系运回北京，停在天坛月余。开吊之日，梁启超亲往致祭，哭之甚哀。其余研究系重要分子公祭时亦多流涕。徐世昌政府派員致祭，并給治喪費万元。后由其弟湯薌銘、其子湯佩松送柩回蕪水安葬。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启超辞去財政总长后，曾一再向社会声明，今后只与相知友好作学术上的研究，不参加任何政团作政治活动，以故一年之内，专心从事著述。一九一八年十月，南北名流曾有和平促进会之組織，他但表示贊成，并未参加。酝酿已久之欧游計劃，此时已告成熟。十二月八日，他由沪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出发，在欧洲游历一年；一九二〇年一月，由馬賽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沪。自茲以往，他創設誦学社，专以砥礪學問为宗旨，并与欧美学者杜威、罗素通音訊。杜、罗两人曾来华公开講演，他們的学說，也就是这个时候传播到中国来的。

湯化龙既被刺而死，梁启超亦赴欧游历一年，不复再問政事，羣龙无首，研究系形成涣散的局面。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首先撤銷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宣言繼續民国六年第二期常会。众議院副議長陈国祥（研究系）病故，选张伯烈为副議長。参議院議長仍为王家襄，他的資望既浅，领导力量亦不够，又用陈定远为参議院秘书长，为之联系一切，更

完全不能胜任。研究系的福建派陈博生等对陈定远甚轻视。陈定远系神州通讯社社长，《晨报》上如用神州通讯社稿，稿上有“陈定远”三字必被勾去。陈定远与曹錕佞臣李彦青往来甚密，对曹錕贿选很卖气力，凡与他相识的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多被拉去，拿到贿款五千元。王家襄与研究系的福建派既不能切实合作，自更谈不到恢复研究系的旧观了。且王家襄本人以议长资格，亦为贿选出了相当力量，所得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其他研究系各议员洁身自好，不肯受贿者，实属寥寥无几。至一九二四年秋，国会重遭解散，研究系即随之消灭了。

兹将研究系较为著名的分子，于汤死梁去之后的趋向，聊举数人简单叙述如下：（一）林长民在徐世昌非法总统时期虽亦有所活动，但以研究系色彩过浓，未被重用。一九一五年十月，他与饒汉祥秘密出关，参加郭松龄反张之战。郭败，他被乱兵击毙于奉天新民屯，饒汉祥幸而免。（二）蒲殿俊于汤死后任《晨报》社长，对宣传五四运动颇能有所贡献。后因业务管理不善，且与研究系的福建派发生意见，遂把《晨报》交给刘道鏗、陈博生接办而自行组织新剧团，经营新民大剧院，复以赔累不堪停业。后投四州军阀，为杨森的代表；杨倒，又为刘湘的高等顾问。（三）籍忠寅当贿选时，投票前先以自白书登诸报端，声明投票而不受金。又与研究系同志设立新学会，与梁启超的耕学社互相援应。后因病息影京门，每以诗文自娱，所刊《困斋诗文集》多系晚年作品。（四）刘崇佑于汤死后专执行律师业务，对外不谈政治。（五）胡瑞霖于汤死后专心研究佛学，每年必朝五台两次，经常在居士林诵经。（六）陈博生，于汤死后一心一意办理《晨报》，颇博北京文学界的好评；但对于国民党仍坚持研究系传统的对立政策，一点也不改变，国民党甚厌

惡之。一九二五年夏，朱家驊曾率領學生千餘人包圍晨報館，放火焚燒，賴軍警及時撲滅，未致成災。張學良住北京時，與陳往來頗密。一九二八年夏，國民革命軍進抵京郊，《晨報》自動停刊，研究系所遺的唯一刊物至此亦告完結。後來陳曾一度為張學良在奉天辦報，經人介紹，輾轉投向國民黨，現任台灣立法院立法委員兼中央通訊社總編輯。（七）張君勱自稱為梁啟超的學生，與湯化龍私交亦厚，厚顏無恥，常以研究系繼承人自居。一九三三年他擔任燕京大學教授時，租定石板房二十三號一所房子，以研究系殘余分子多人為基礎，秘密組織國社黨（國家社會黨），並刊印《再生》雜誌，作為宣傳刊物。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後，他帶領一部分親信黨徒前往重慶，表面上聲稱共赴國難，暗與汪精衛勾結，作出賣民族的卑鄙行為。迨至抗戰勝利，他代表國社黨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與張羣打成一片。未幾他又跑到舊金山，鼓動華僑的海外憲政黨伍憲子、朱大明等，改稱民主憲政黨，復要求海外的民主憲政黨與國內的國社黨並而為一，名曰民主社會黨，先後均經取得同意。比至回到上海，即召集黨員大會，推定中央常委十五人，他任主席，以伍憲子為副主席，參加了三黨聯盟的蔣介石反動政府。（八）胡源匯曾參加張君勱所組織的國社黨，及改組為民主社會黨時，他是河北省該黨的負責人，兼該黨中央常委，由此得任為南京反動政府國務委員，解放初病歿北京。

以上五、六、七各節所述，自憲法研究會成立起，至國會重遭解散研究系消滅時止，前後經過情形大概如此。

关于进步党史料的补充

陈叔通副主席的来函

贊廷先生：

昨談終以开会時間將到，匆匆未竟其詞。茲姑就記憶所及，寫如下：

辛亥革命后初期之政党有：一、国民党。二、共和协进会，籍忠寅等組成。三、民国公会，光复会分子改組而成。此会我与黃羣均以与光复会在清季有关系，加入发起。四、民社，在黎元洪之下，孙武、时功玖、刘成禺、孙发緒（安徽人）等人組成。籍忠寅（清季我与他同为資政院民选議員，由諮議局选出，以別于欽派議員；又同为宪友会會員，宪友会为梁启超所組成之秘密組織）南下与我接洽，又約黃羣，一共三人同至武汉，与民社商議，將以上三个組織（二、三、四）合并为共和党。五、共和建設討論会，后改称民主党，湯化龙、刘崇佑、孙洪伊、林长民組成。組成之前，梁启超在日本先与联系，实为该会主要人物。六、統一党，在袁世凱之下由一般官僚組成，而以王廣（揖唐）为首。

后由共和党、民主党（即共和建設討論会）合組成进步党（合組后一直并不融洽，仍各自主张）。統一党分子后来亦滲入，进步党更为混乱。

研究系不是党，并不是小集团，而且从来没有用过这三个字作为称号。乃系反对分子就当时进步党内所設宪法研究会，指出研

究会內某些分子为“研究系”乃一种冷嘲称号,意味着书生,又是钻牛角尖的;亦有解释为阴谋家。我与籍忠寅、蹇念益、黄羣、周大烈等均为被指出之研究系。其实如他們所指为研究系,政見亦不是一致,故研究系只是抽象名詞,无历史之可言,与政学系、安福系不同。此頌

即祉

叔通 九月廿二灯下

我对許崇智了解的片断

周 一 志

一

据我所知，国民党西山會議派的中央委員，到了前几年居正、邹魯在台湾相繼死去以后，似乎只有許崇智(在香港)、傅汝霖(在巴西)二人还在世了。我同許崇智在抗日戰爭以前，在上海宴会上見過两三次。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我在香港从事反动的“第三条路綫”活动，許崇智也曾一度热心于此种活动，因此，許同我有三次相当长的時間談話。由于許是西山會議派要角之一，加上在香港他同我曾有交往关系，我知道他的一些事实，特写此篇。

許崇智是广东人，他叔父許应騤在清末任福建巡撫等职。广州的“高第街”，即以許家大宅而聞名。清末，派青年人出洋学文学武，二品以上官員可以保一个子弟出去。許崇智父母早死，由許应騤保他赴日本，学軍事，毕业于士官学校。他回国到福建任軍官，以叔父的庇蔭，提升得特別快，帶兵不久即做協統。少年得志，福建人当时以貴公子称之。

辛亥革命福建光复时，許崇智在統制孙道仁之下出力甚多。一九一三年七月，方声涛、林虎、李烈鈞等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討袁世凱。許在福州会同刘通、黃光弼等謀胁孙道仁加入討袁，通电响应。等到他們部署刚刚就緒，将率軍取道閩江上游入江西，而

湖口軍事已告失敗。許不得已，只得遁去，孫道仁電袁世凱請罪^①。討袁失敗，許追隨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護法之役以後，許在福建、廣東兩省，率領一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軍隊。他不象其他軍人，對於中山先生的命令，是很服從的。陳炯明背叛了中山先生，許任粵軍總司令，在國民黨中是一個實力派。許軍在福建漳州時，蔣介石是他部下的參謀長。後來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時，還兼着粵軍總部的參謀長。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廣州成立國民政府，那時胡漢民是代理大元帥，似乎國府一職應由胡擔任。擁護革命三大政策最力的廖仲愷先生認為胡太右，不如汪精衛有朝氣，主張汪做主席。許崇智對胡，尤其是胡的家屬胡毅生等人包稅包捐的行為，平日不滿，也擁汪而抑胡。由於廖先生在黨內的發言權，以及許的實力派地位，胡漢民只得任國府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因為這件事，胡對許十分懷恨。胡曾對我們說，他生平有兩個政敵，一個是陳炯明，一個是許崇智。一九二八年秋，國民黨人在香港迎接胡漢民由歐洲回國，許也到船上相迎。胡只同他勉強拉一拉手，一句話不談，弄得許頗為難堪。

二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在廣州被反動派暗殺身死。當時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集緊急聯席會議，指定汪精衛、蔣介石、許崇智組成特別委員會，處理廖被刺案。二十五日，拘捕胡漢民及梁鴻楷等人，解除梁軍武裝。廣州市長伍朝樞

① 根據《文史資料》第二輯中劉通的《辛亥福建光復回憶》一文。

等人逃赴香港。到了九月二十日，蔣介石同汪精衛密謀成熟，國民政府下令說許崇智勾結反動軍人謀亂，解除許的軍職，並立即逐出廣東省。

據我後來了解，因廖案關係，汪精衛同蔣介石結合甚深，互相利用：蔣介石幫助汪精衛把胡漢民去掉（因胡派分子是刺廖的主謀者），汪精衛則幫助蔣介石把許崇智去掉；因為汪是國府主席又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不同意，蔣個人那時是不能逐許的。蔣介石逐許的手段甚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派人把許宅包圍，解除許的衛兵的武裝。蔣在電話中對許說：“現在廣東空氣，對總司令（指許）非常不利，不如請你短時期離開一下，等到我們把事情弄妥當了，以後一定再請你回來主持軍事。”在打電話的同時，蔣派的使者立即將預備好的離粵的船票、路費，並有蔣給許的一封親筆長信，一併交許。在武裝監視之下，許不得不被逐而出走了。蔣介石雖是許的部下，但一向對許不滿意，也看不起許的為人。因為許生活十分浪漫，除中山先生生前，他頗服從以外，沒有什麼作為。蔣是一個大野心分子，要想脫穎而出，不去掉許是不行的。

三

許被逐到上海後，同鄒魯、謝持、居正等人積極策動召開西山會議，使國民黨走背叛三大政策的反革命道路。由於蔣介石有親筆信給許，將來仍擁護他主軍，許仍存幻想，乃不列名西山會議，只躲在背後成為一個有力的支持者。居正同許在上海交往最密，居、許兩人也都同日本人來往。居主持《江南晚報》，是西山派行動方面中心人物。許當然不甘寂寞，總想找機會重抓兵權，在政治上再度翻身。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也繼上海的“四一二”之后，決議同共产党分裂。如前所述，汪精卫在广州被推为国府主席，許曾予以支持；以此关系，西山派看到汪精卫自己把假左派的面具去掉，政治上已經一致，乃推許崇智赴长江上游同汪見面，以便大家合作。汪为了对付蔣介石和胡汉民，当时汪、許間一拍即合，于是产生了一个宁方、汉方，以及西山派沪方三方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特別委员会。可是等到特別委员会的形势已成，宁方将計就計，在三方會議上主张由西山派的邹魯、謝持等在中央党部多負些責任。汪派人在会上格于面子，不便反对，知道上了大当。汪是一个最善变之人，不肯吃亏，于是迅即翻脸，攻击特別委员会违反党章，是不合法的。他重回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后汪又去广州，把李济深騙离广州，汪陪李一同北上，以便于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起事，夺取桂系地盘。武汉的唐生智被桂系的西征軍打败，张、黄广州之变也失敗，汪只得在暗中通过宋子文又同蔣介石合作，恢复第二屆的党統，打倒南京的特別委员会。蔣在此机会下，由下野而复出主軍間政。特別委员会垮台，西山派的邹、謝等又回到上海老巢，許崇智同汪精卫之間，当初留下的一点友情，从此以后也就消灭了。后来許崇智对胡頗有歉意，提到汪就罵。知道他們这段史实的人，是不难理解許的心情的。

四

蔣介石是阴謀能手，当初逐許崇智的时候，蔣写的那封亲笔长信，中間有許多情感之詞，力說事非得已，将来仍愿拥許。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蔣已大权在握，想起在許手中的那封信，未免大大地后悔。国民党所謂元老吳稚暉、张靜江等人，看出蔣的真意，

在蔣、許中間拉攏，由蔣又送了一筆大錢給許（許一到旁時，就向蔣告苦，蔣也就送錢），同時由許把当年的原信退回。不料原信回到蔣手，发觉每一張信紙的四角都有圖釘的痕迹，顯然是許把信照了相。原信雖退回，但仍把“把柄”抓一點在手。當時我們聽了這個故事，都說許這個人未免太無聊。後來我們慢慢知道許才真正了解蔣的流氓根性，故意叫蔣曉得他手中仍有信的照相稿，以便宜金錢上再敲竹杠。

許崇智在上海的生活，前後娶了几个姨太太，平日狂嫖濫賭，在家打麻將，出外賭“跑狗”或“回力球”。可笑的是在回力球場，他常常瞎吹他用的是兵家什麼大包围的方法，一定能贏，結果十之八九輸得一敗塗地。大家背後都以“許老总”的兵法靠不住作為笑談。

一九三一年廣州的國民黨非常會議，許崇智派代表參加。粵方筹划出兵討蔣，許派的代表力說許在福建如何如何有辦法，可以發動多少萬民兵，作為討蔣軍事上側面的大助。古應芬、汪精衛、孫科等都深刻了解許之為人，明知道他的話不見得可信，但彼此畢竟是老朋友，叫當時粵方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鄧召蔭撥給許几十萬元，敷衍他的要求。後來人人都說許拿了錢連一文都沒有用在福建真搞什麼軍隊。錢一到他手，不久就花天酒地地揮霍光了。

五

在抗日期間，許崇智住在香港。日本占領香港，駐港總督是磯谷，此人同許是士官學校同學。據說許利用這種關係，大做生意，很賺了些錢，生活十分闊綽。對於中山先生在澳門以及中山縣

翠亨乡的家属，許不时加以照顾。他虽然同日本人来往，但没有下海做汉奸。

抗日战争結束以后，許发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汉奸財”，内容值得一談。广东順德县有一个大鎮，叫做市桥。市桥有一个土皇帝，名叫李朗溪。此人勾結历任官府，包稅走私，販卖毒品，是一个大土豪而无恶不作的人。在广东未陷落前，李已十分有錢；到了陷落后，李勾結日本，更发了大財。抗战胜利，李被捕，好象由广东法院判他无期徒刑。也不知誰向李家献策，李家人找到許崇智，先送他一笔相当大数目的錢，請許亲到南京，見一見蔣介石卖一个老面子，設法把李朗溪释放；事如成功，答应还送許一笔更大的款子。許接受了李家的条件，特亲去南京，住在司法院长居正家里，进行此事。蔣得到許入京的消息，知道他此来必有一种目的，請他吃飯，飯后問他来意如何。許就老着面皮，告訴李家托他的事实。听說許說得很坦白，要求蔣帮他一帮。此事在独裁的蔣不过举手之劳，在許則可得巨款，又够他吃用多少年。蔣听了也給他面子，允为照办。乃由司法方面把李案移京办理，面子上加以审訊一下，竟把这个多年无恶不作的大坏蛋释放，使他逍遙法外了。照广东当地人的說法，李朗溪罪恶之大，應該被枪毙几次都不算多。这就是过去中国旧社会所謂“錢能通神”的一个最好說明。資產階級政治中的所謂“司法独立”的真正内幕，拆穿了原来是这样肮脏的。

六

我过去是一腦子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又看不清中国的大局，在一九四八年冬从上海跑去香港，犯了政治上大錯誤。一九五一年一、二月間，张发奎有一天同我談，許汝为(許的号)打几次電話給

他，也热心起来搞“第三条路綫”活动了。第二天张同我去許宅，想同許談談。在說了一些閑話之后，許拿出一份草拟好的什么同盟組織的初稿，同盟的主席可以指定或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的負責人，完全是首領制，毫无民主精神。当时一般圍繞着許企图攀龙附凤的人，都說“許老总”肯出来領導，大家还有什么話說呢。捧得許有飘飘然欲仙之概。許对人就說当年中山先生在护法之役后，組織大元帅府，如何如何，言外之意，他以“第三条路綫”的大元帅自居了。张发奎同我看了此組織草稿，都一声不响。最后，許又特別用广东話同张說（許以为我是外江佬，其实我完全懂广东話），他已写信給台灣的吳礼卿（吳忠信），叫吳代表蔣介石到香港談談，最好蔣能諒解香港的“第三条路綫”活动，因为前提上大家都是“反共的”，不妨殊途同归。又說，他希望吳最好能帶一笔錢来，因为現在流落香港的穷朋友太多了，都渴望救济救济云云。我同张离开許宅后，我对张說：“許老总真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現在还想来这一套，未免太可笑了。”张回答我說：“不必認真，他姓他的許，你姓你的周，我姓我的张，我們知道他的作风就是了。”不久我同青年党出身的一个分子談天，告訴他张发奎同我訪許的經過，我也坦白地說出我对許的批評的話。不料此人把我的話大事宣传，可能还加油加醋，因此許对我頗感头痛。那时許遇到有关的人就問：“周一志这几天又罵我沒有？”梁寒操后来因为不能去南洋某地做华侨学校校长（香港政府知道梁政治色彩太浓，不予簽證），也有一度短短時間搞“第三条路綫”活动，許竭力拉攏他，想收为己用。过些时梁对我說，“許老总”要到元朗乡間来看我。我体会到梁意，很想我对許的态度和緩一点。我想了一想，乃回答梁：不敢当，还是我去看他吧。于是我特別約了陈孚木一道，第二次去許宅。見面后，我開門見山

地对許說：“我当初也曾是你們西山派的一个小卒，大家无仇无怨，我前些时对你有一句批評的話，未免太过火了，我愿意向你道歉。不过你老人家对向华（张发奎的号）說的那一段話，内容实在大有問題，希望你以后多同寒操談談。”大家閑談了一陣就分手了。一九五四年，李宗仁想組織国民党复兴同志会，在美国写信囑陈孚木、程思远同我三个人代表他找許，想一同发起此事。另外李也有信給张发奎，于是陈、张、程同我一共四人又去許宅商談。許的表示，一定要在发起人中挂头一块招牌，否則他不干。我們深知李宗仁也非挂头牌不可，于是又成僵局，談不攏了。

在搞“第三条路綫”中，許鬧的笑話最多。比方說，他到处拜客，表示謙恭下士。过五月端阳节，他送礼又拜节。人們当他面常說“許老总是蔣介石的上司，以你的資格来領導‘新运动’，我們一定服从”。許一听誰对他說这一类話，回家后即对人大談誰已成他的部下了。他自己騙自己，还想騙人，情形頗为可笑。許的堂兄弟許齡君(?)，听說当时凡是誰反对許做章程草案上有大权的主席，就找此人質問：“你为什么反对我的哥哥‘登位’？”这“登位”两个字，用得太可笑了。我把这一点事写出来，使大家可以“举一反三”，推想到海外的所謂“第三条路綫”运动中的头面人物是怎样的人，同时也可以推想到这个反动的运动是如何的乱七八糟了。

詐欺取財的万国儲蓄會

祝世康

一 法國流氓的騙錢把戲

万国儲蓄會是外國冒險家最早在上海耍的騙錢把戲。有一個法國人叫作盤滕 (J. Bandin)，在二十世紀初到了上海以後，始終沒有找到正當的職業，一貫招搖撞騙，同時沾染了吸食鴉片煙的嗜好。可是因生活沒有着落，家里無法置備煙具，只好到鴉片館里去過癮。在那里他結識了一個叫作唐伯超的中國煙客。他們兩人窮極無聊，想出一個拿儲蓄做幌子的獎券辦法。但他們兩個都是光身漢，沒有資本，盤滕便同另外兩個法國伙伴商量。一個是希古 (Sigaut)，上海法商龍東洋行的經理，經銷三星斧頭牌白蘭地洋酒和 4711 香水，拿了一些錢出來支持盤滕；另一是法諾 (R. Fano) 也是一個窮光蛋。到了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這三個法國人便出面創辦万国儲蓄會。由盤滕做董事長，希古和法諾擔任常務董事，輪流做經理，唐伯超等一些華人為職員。當時先發行一百元票面的小額獎券，規定五年還本。後來看到生意有苗頭，儲戶只注意獎金，對還本期限的長短滿不在乎，便改為十年還本。發行了四期，生意還是很好，又將票面提高為二千元，十五年還本。這樣一來，万国儲蓄會騙取的儲款愈來愈多，在愛多亞路七號至九號建造了總會的房屋。房屋內筑有一座貯藏財寶的庫房，連匯豐銀行所有

貴重的東西都寄存在這座庫房里。同時萬國儲蓄會的全部資金也存放在匯豐銀行，不斷地將大量資金變為外匯匯往法國。另以一小部分的資金開設寶泰保險公司、建業地產公司等，由希古兼任兩公司的董事長。一個潑辣凶狠的法國女子勃蘭萊（J. Braley）擔任萬國儲蓄會的內部行政工作。後來盤膝本人因發了大財，經常往來於上海與巴黎兩地。法國政府因他吸收了大量中國人民的財富，常常支持他。他在法租界工部局的董事會也就具有很大的勢力，一切措施由他在幕後操縱。最後盤膝將掠奪所得，滿載而回到法國去了。一九二一年由另一個法籍投機商人司比門（M. Speelman）繼任董事長。

當時參加萬國儲蓄會組織的中國人雖先後有楊潤生、虞洽卿、葉琢堂、席錫藩和章鴻笙等人，他們在名義上雖擔任了華董或監察人或華總經理等，但在事實上不過利用他們做幌子，作為中國儲戶利益的代表人，對萬國儲蓄會根本無權過問。因為他們是法國大班的買辦，只可分沾一些佣金。這種佣金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從他們經銷的會單中提出的。在一九二一年萬國儲蓄會改組時，由葉琢堂保荐章鴻笙擔任華經理和他的女婿李叔明擔任副經理。他們兩人所得的圓佣駭人聽聞；他們每銷售一份會單，就可在第一年内拿到六十元。這就是從儲戶每月所交的十二元中提出五元作為經銷佣金。華經理利用這筆巨大的佣金，再委派許多代理人和推銷員到內地去設立分會或代理處，招徠生意。李叔明為了朋分這筆巨額利益，在一九二三年與章鴻笙想出平分秋色的辦法，另辟了一個推銷部，由他擔任經理。章鴻笙與李叔明不久都變成了百萬富翁。

當李叔明任萬國儲蓄會推銷部經理時，正值萬國儲蓄會生意

興隆的黃金時代；因為那時許許多多的儲戶迷信洋商，墮入了萬國儲蓄會的羅網。而且該會所登廣告具有誘惑力：既有頭獎二千元還有特獎，到十五年期滿，本錢仍有着落，另外還有什麼“紅利”可分。如拿該會的章程來看，也說得很動聽，規定以下幾點：（1）以二千元的儲款為一個整戶，一千元為四分之二的分戶，五百元為四分之一的分戶。（2）儲戶每月交納儲款十二元，須到十五年才算滿期。事實上每月交十二元，到第十三年底便交納了一千八百七十二元，其餘一百二十八元可到第十四年內交納，在交足了二千元便不必再交。可是必須等到滿足十五年時方能還本。（3）所發的獎金規定為当月所收儲款的四分之一，其種類計分頭獎、二獎、三獎、四獎和每十個中有一個末尾的末獎。按每二千個整戶為一組，分配這些獎金。除了這些獎金以外再就所提四分之一的儲款中，提出半元作為特獎，這項獎金因隨着會單的數目遞增，它的數額按月增多，用來引誘儲戶。（4）儲戶入會後，如果所中的獎金總數超過了二千元，叫作中獎滿額，在領取獎金以後，即將其會單的號碼取消，由儲戶按照章程規定的退會金數目領回儲款的一部分。（5）關於儲款的利率按照章程規定，並不具體說明，僅僅含糊其詞地提到儲款的投資，是按照周息五厘生息來補足每月所提的獎金和在第一年儲款中所提的巨額開支。

照一般天真的儲戶抱着中獎發財的幻想，去看萬國儲蓄會這份章程，只會覺得比普通儲蓄上算，很不容易看出它的破綻。因為這份章程所訂的騙錢辦法很巧妙，完全從漫長的還本期間上打主意。它仿照資本主義國家人壽保險公司的保險金表，精打細算；并由該會請了一個精于計算的人精密地設計，使規定的辦法看起來仿佛公平合理。落網的儲戶單從章程上去看，決不會看出它詐騙

取財的漏洞。必須到入會一年半載交納了相當大的儲款，中獎的幻想破滅以後，再拿普通一般銀行的另存整取儲蓄的計算表仔細一算，才知上了當。如果將當時一般銀行如通易信託公司等十五年長期儲蓄的計算表作為比較，儲款到滿足十五年時應得的本金利息，有五千七百十六元八角之多，而萬國儲蓄會期滿還本卻只有二千元。至於所謂“紅利”則根本用來騙人，所得數目微乎其微。那末儲戶的損失，至少在三千五百元以上。如再照另存整付辦法來推算，在不到九年的時間，只須分期交納一千二百九十六元便可領回二千一百六十一元另八分的本金和利息。可是，一般萬國儲蓄會的儲戶在填寫了入會志願書後，只知按月交款來得獎，不知一連要交十四五年之久，使該會騙取的儲款，象滾雪球似的愈滾愈多。如果中途停交，大部分的本金便被沒收，使儲戶入會以後，欲罷不能。有些儲戶在不斷交款的漫長期間得到一二次獎金，便歡天喜地；決不再去計算本利，並會拿獎金再多買幾份會單，使該會發出的獎金仍然回籠。同時萬國儲蓄會的推銷員，遇到得獎儲戶去領獎時，也一步不放鬆，一定甜言蜜語地勸誘儲戶繼續入會。結果儲戶中了獎還是被萬國儲蓄會吸收回去，依舊得不償失。如果儲戶在第一年內中了頭獎不再入會，那末比起另存整付還便宜了一千八百四十九元零四分，但到第十一年時得了頭獎亦只多得二百二十元二角五分。如果到第十二年才得到二千元的獎金，那就反而虧折了一百十八元五角一分了。

由於絕大多數的儲戶因被二千元的獎金所迷惑，只把注意力放在獎金上，對儲本和利息決不會去計算。他們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每月拿出十二元的儲款博取二千元的頭獎和特獎，以少博多是一種上算的事情。事實上萬國儲蓄會在十五年內的開獎次數

只有一百八十次，每次開獎是以每二千戶為一組。在一百八十次開獎中能夠抽得頭獎的儲戶只占百分之九，其餘百分之九十一得不到頭獎。按零存整取儲蓄在滿足十五年所得的本利，雖在第十五年不必交款也在五千五百元以上。而萬國儲蓄會在滿足十五年時所還的儲本却只有二千元。從這一點與另存整取儲蓄的本利比較起來已相差二千五百元。

二 千方百計剝削儲戶

萬國儲蓄會利用十五年還本的詐欺取財方法，殘酷剝削儲戶，還本的期間越長，儲戶受到的剝削越重。所以它用種種渲染辦法，使儲戶按月交款，一直交到第十四年滿足二千元，還要等待一年之久，才到十五年滿期領取二千元的本金。至於所謂紅利，根本數目很少，不超過一百元，只是一個幌子，誘引儲戶存滿十五年罷了。章程雖規定所謂“紅利”，並不明確敘明數額。因為這種紅利的來源，不是運用全部儲款所得的利潤，而是在償還準備金運用所得的利息。如果超過了周息五厘，即以超過數的百分之五十作為儲戶的紅利。所謂償還準備金不是儲戶的全部儲款，而是指在第一年的儲款中提取了開支一百零八元和每年的獎金以後剩餘下來的錢而言。而且運用償還準備金所得利息究竟有多少，萬國儲蓄會並不公開帳目，連該會的中国職員都不能過問，只有高級法籍職員知其底蘊。因為該會置備二種帳冊，一種是法國人保存的秘密帳，一種是專供中國人使用的公開帳。

關於紅利的分配既由盤膝或司比門等人掌握，所以在章程中規定：“由董事會決定，儲戶不得有異議”等語。這也是掠奪儲戶的一個巧妙辦法，使法國人侵蝕紅利成為合法化。因為按照當時一

般銀行存款的利率，在一年以上的定期大都是周息一分二厘以上。至于銀行貸款的利率大都是一分五厘左右。照理說，万国儲蓄會既從儲款中提存了龐大的開支，使儲戶遭受到很大的剝削，那末從儲款償還準備金運用所得的紅利應該有相當可觀的數額可得。可是該會在這一點上也絲毫不放鬆，想出以下三種辦法來暗中侵蝕：

- (1) 把利潤較高的投資，划入普通投資後，即將其中收益完全歸股東；再把最低收益的投資和一些呆帳轉入償還準備金投資項下。
- (2) 將資金抽出秘密設立一些企業如建業地產公司和寶泰保險公司，乃至一本萬利的跑狗場和回力球場等；股東再暗中借這些公司的名義，從償還準備金項下獲得巨額的低利質押貸款，使投資所得的利息只有周息六、七厘，最高也不超過八厘。
- (3) 在章程中嚴格規定領取紅利的限制，必須儲戶交存儲款滿足十四年，直到第十五年到期時才有享受領取紅利的權利。事實上万国儲蓄會的儲戶大多數是依靠薪工收入的人，能夠存儲滿期的儲戶只占百分之二左右。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經過了漫長的十五年，通貨不斷的貶值，儲戶在幣值上的損失，却比所得的紅利要大得多。

万国儲蓄會剝奪儲戶的辦法層出不窮，除了在帳面上偷天換日以外，還有提取開支八厘五毫獨創先例的黑幕。這就是章程中規定：從儲戶的儲款中提出八厘五毫作為會中的開支。此數照二千元的儲款計算，應當是一百七十元。該會既不在存款交足二千元時提取，也不是在儲戶按月存入時按比例提取，而是在最初存入的十二個月儲款時即將這項開支的一大部分預先提取。例如，在第一年內儲戶存入的儲款是一百四十四元，除了提出獎金三十六元外，其餘一百零八元全部提作開支，把儲戶所存的第一年的儲款花得干干淨淨。因此章程里不得不規定必須儲戶存滿二足年方能

申請退會。至于預提開支的原因，主要為刺激華經理和推銷員招徠營業。在第一年儲款中所提的一百另八元，除了股東朋分、花用以及會中各項開支以外，其餘六十元作為華經理的手續費（即買辦的佣金）。在這六十元中買辦除了不勞而獲坐享二十四元的佣金以外，再以三十六元作為代理人或推銷員的佣金。這樣，萬國儲蓄會的總會雖設在上海舊法租界內，但它的代理人和推銷員卻滿布于全國各地，使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上了鉤，做了萬國儲蓄會的落網之魚。

此外，在該會的章程中還附有一張中途退會的還本表，用這張表來大肆渲染說是存滿二年就可還本。實際上章程里規定的還本辦法很嚴格，必須存滿二足年，交足二百八十八元的儲款才能享受還本的權利，凡儲款不滿二年則分文拿不回來。而且存款雖滿足二年也不是十足還本，不能拿回全部儲款，只可按照這項還本表拿回一百另二元九角四分，同時還要扣除中途退會的罰金百分之五。儲戶實際上所能領回的數目大約只有儲款的三分之一。至于存滿二年後的另月也不計算在內。例如，儲戶交存了二年十個月（應為四二〇元）也只能按二年計算領取一百另二元九角四分，再扣去罰金百分之五，實際拿回九十八元七角九分。

該會的章程對儲戶應得的款項還有種種嚴厲的限制，剝奪儲戶的權利。只要儲戶所執會單稍稍逾越了這些限制，會單就失效或者被沒收。例如：（1）儲戶交款的日子以開獎前一天的上午為限，一過了十二點鐘去交款即拒不接受，作為欠交。（2）如果儲戶因逾時欠交儲款，即使中了獎也不能領取。（3）儲戶中了獎如果三年內不去領取，也就變成失效，不能再領。（4）如儲戶欠交了儲款三個月，他所持的會單號碼即行作廢；倘儲戶要繼續存儲，那就一定要將欠

交的儲款交清，并且加收欠交利息八厘。至于在欠交期間所中的獎金，却又不能領取。如果儲戶欠交儲款，在一年內不辦理繼續儲款的手續，那就連申請繼續儲款的權利都喪失。(5)儲戶欠交儲款滿四個月，即作停交論，他所執會單即永遠取消作廢。(6)儲戶的會單號碼被作廢後，如果已交儲款不滿二年，不能領回任何款項；倘所交儲款超過二年，亦只能按還本表扣去百分之五罰金領回退會金；如果儲戶三年內不去領取，那就連退會金也被一併沒收。(7)儲戶對存儲滿十五年應領的滿期還本如在三年內不領，即被宣布失效沒收。照以上各種各樣的限制，使儲戶一不小心就被宣布失效，儲款被沒收，分文無着。這類失效會單，在萬國款儲會的全盛時期是很多的。因為那時正值國內軍閥連年混戰，加上常常發生嚴重的水旱災害，種種天災人禍使很多儲戶喪失了退會或領獎的權利。這一筆巨大的失效沒收會單，當然也是該會的額外收益。

三 進行各種投機倒把的活動

萬國儲蓄會除用以上種種的剝削辦法侵蝕儲戶的利益以外，還將它所吸收的大量資金進行形形色色的投機活動，獲取暴利。這些非法投資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大類：

(一)套取外匯：該會騙取了巨額的儲款後，除了歸盤膝和司比門等人中飽，使他們腰纏萬貫，通過匯豐銀行或東方匯理銀行匯往法國以外，還利用外匯波動，在一漲一落時，攫取暴利。由於那時國內通貨貶值，常常將多餘的資金全部變成外匯，隨時進行套匯獲利。可是這種利潤並不列入公開的帳目，無形中化為盤膝和司比門等的私人財產。

(二)地產買賣：舊法租界的地皮房產差不多一半是該會的產

业，从外滩到徐家汇，沿淮海路一带几乎所有的高大公寓和新式里弄房屋都是属于该会所有。如淮海中路的戴司康公寓（即淮海公寓）、衡山路的毕卡第公寓（即衡山宾馆）、重庆南路的巴黎公寓，万宜坊等。至于地产公司方面的投资除了建业地产公司以外，还向华洋地产公司、均益地产公司等大量投资。据美国人估计，单在一九三一年中，这些法国人以抵押方式取得的地产已值九百万两①。

（三）操纵公债：在该会的储款偿还准备金中有一部分是旧法租界的公债和外商公司的债票，其他还购买一些反动政府发行的公债。在反动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该会掌握了大量的现货公债，便用作投机的筹码，在公债市场中常常兴风作浪。

（四）赌博事业：该会对旧上海的赌博场所，如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等，也以贷款方式投入大量的资金，因而这些赌博场所的主要股东也都是该会的股东。这些赌博场所耍的是一套骗人把戏。例如跑狗场在赌注的狗起跑时，先用白兰地酒灌给狗吃或以白兰地给它打针，控制跑的速度，操纵着奖金，骗取赌客们的赌注。

此外，该会还通过不断增资的掠夺方式来获取巨额利润。本来该会在一九一二年成立时公布的资本是规元四千两，实收百分之五十。事实上这项微薄的资本早已消耗在筹备费用和广告费用方面，它显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空头公司。可是到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间这些股东竟不名一文宣布增资为规银一百万两和八百万法国法郎。这些增资的来源当然就是把储户的储款化为利润，再从利润帐中转出来的。增资的结果使股东们的收益除了高

① 见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论》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版，第六三〇页。

額的工資和优厚的佣金以外，又有更多的股息紅利。

該會一再增資說明業務不斷發展，儲款有了惊人的增加。它的发展过程大約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在这个阶段里发展的速度还很慢，会单只有一万多全会，每月收入儲款十余万元。第二个阶段，即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是最发达的阶段，会单竟达二十六万个全会以上，每月儲款三百余万元。第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是萎縮的阶段。这是因大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思想高涨，人民的思想認識有所提高，逐漸破除了迷信洋商的观念。同时因儲戶們大都感觉到遭受該會的殘酷剝削，尤其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馬寅初在报刊上写了一篇清算万国儲蓄会的文章，引起儲戶普遍注意；各地紛紛揭露它的黑幕，造成了提存退会风潮。国民党反动派頒布新刑法时禁止中国人参加未經核准的有奖儲蓄工作，使它不得不从內地撤出，把所有分支会結束，集中在上海、汉口、青島、天津、广州五处，凭借租界来掙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該會还千方百計想卷土重来，再向內地发展；但因黑幕已被揭穿，騙錢伎倆已无法施展。第四阶段是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是一个停頓結束的阶段。因太平洋战事发生，日本人进入租界后，把該會的当事人不分青紅皂白都送进集中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該會一再进行欺騙性的清理，企图利用购买力不断低落的法币将它发出的会单全部收回。这样不仅可将該會的資產完全化为股东所有，同时还可掩盖它的剝削行为。这种欺騙性的清理也象它推銷会单那样由掮客来进行，发动了原来兜攬生意的許許多多推銷員向儲戶劝說退会；只要退回一张会单，經手的掮客就可以得到巨額的報酬。同时向儲戶宣称不照还本表退款而可照原交儲款数目十足退回。后来因法币貶值的速度很快，

又宣称可按照原交儲款加倍退回。最后竟采用餅價錢的方式来劝誘儲戶退会,即对退回儲款若干,沒有一定的标准,可以討价还价;只要在談妥以后便由万国儲蓄会照付。可是尽管它想办法誘使儲戶退会,在一九五三年清理解放前存款时,該会的帳册虽不完全,大部分已被法国人銷毀,但是它应偿还儲戶的儲款,尚折合旧人民币一千余亿元(即人民币一千余万元)。

四 騙取巨款过荒淫无耻生活

万国儲蓄会的实收儲款数目在一九二七年最发达时期,估計至少在二亿五千万元到三亿元之間。这一笔巨大的儲款在当时通貨尚稳定的期間,可以說是一个惊人的庞大数字了。在这时期,銀元与紙币同时流通,由中国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享有发行权的銀行所发行的紙币总数也不过一亿三千余万元。而且当时三十多家重要銀行如浙江兴业銀行、浙江实业銀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四行儲蓄会等,儲蓄存款的总数亦不过五千万元左右。而万国儲蓄会一家却騙取了这种惊人的巨額儲款。它千方百計进行欺騙性的宣传,例如:这种儲蓄的名称就有欺騙性,在它散发的英文章程里本来是“Savings bond redeemable by monthly drawing,”照原文意义应当認為“按月抽签还本的儲蓄証”,在譯成中文时把这会单的名称尽力加以渲染美化,說成一种有奖有利的儲蓄,使我国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它欺騙。同时更狡猾地在章程的最后一条,加上一段附注:“章程如有不同解释时,以法文原文为准”,这就說明它所譯的中文与原文意义大有出入。

万国儲蓄会在上海开业时本来並沒有取得清朝政府許可,却向儲戶詭称:“曾在法国政府所在地的巴黎注册”,实际上这种詐欺

取財的机构不仅法国政府不准它在法国国内開設，連法国的殖民地也不准营业的。它成立后不仅在上海租界里大登广告公开活动，同时还深入內地，在广州、福州、青島、天津、北京、汉口、云南（大理）、重庆、成都、奉天（沈阳）、哈尔滨等地公开設立分会；还在其他地区設立成千个支会，招徠营业的代理人或推銷員到內地每一个角落去活动。当时軍閥政府財政部因各地受害的人民不断呼吁，揭发它的黑幕，曾一度頒布禁令說：“凡各处发行的儲蓄奖券，無論用何种名称，未經呈部有案，一律飭由本部及各省区軍民长官查明，从严禁止”等語。該会以租界为护符，对这一紙空文当然置之不理，逍遙法外照常营业。

帝国主义国家的冒险家，本来大都一到上海便橫行霸道，作威作福；万国儲蓄会几个股东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由无家可归的冒险家在短短的几年內一跃而为大腹便便的銀行家。以中国人民的血汗，飽他們的私囊，供他們的揮霍。除了每月拿合法的高額薪俸以外，还从每一会单的儲款中抽取巨額开支，每年年終又朋分成百万元的股息紅利。这种滾滾而来的不尽之財当然使他們生活腐化，过着荒淫无耻的奢侈生活。例如該会董事长司比門就是上海冶游場中的一个赫赫有名的聞人。他原来是一个荷兰人，在帝俄时代取得了俄国籍，便在上海进了华俄道胜銀行。后来因亏空公款，溜之大吉。隔了些时他又取得了法国籍回到上海，接替了盘膝的董事长，便一帆風順地发了大財，狂嫖滥賭过着紙醉金迷的生活。后来結識了一个青年歌女同她結了婚。这位歌女也就成为大名鼎鼎的“司比門太太”裝飾得滿身珠光宝气，是上海第一号的闊綽妇女。头上裝飾用的假发，每天花样翻新。鞋子装滿了两間屋子。每双鞋子的鞋尖上都可以鑲嵌鑽石，在穿鞋时将同样大小，价值連城的两

粒巨大鑽石嵌上，在电灯照耀下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另外有两間房专供貯藏衣服，成千件的衣服都仿照巴黎最时髦的花色式样縫制，只要在宴会場中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至于她所用珠翠宝石当然更多得堆积如山，不計其数。每天洗澡时所用的不是水，而是搀着香水的牛奶。他們日常的伙食費用也就更大得駭人听闻，据说每餐动不动就是数十百元。单单所吃的白塔面包都向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精致的花紋和司比門的縮写名字。每次举行盛大宴会时餐室里更布置得富丽堂皇，除了名贵的山珍海味和香檳白兰地以外，单单鮮艳夺目的花朵，已可供給普通人一两年的伙食費。可是他們二人的家庭生活毕竟是建立在金錢关系上的。每遇司比門在娱乐场所要中途回家时，这位“司比門太太”非當場取得五千到一万元的支票，就会破臉爭吵。因此，隔了几年他們二人感情破裂，司比門終于化了五十万元同她离了婚。司比門腰纏万貫，也在解放前席卷巨額外汇跑到美国去了。

解放前的上海真是一个鬼域世界。象司比門那样一个流浪的无賴，凭着他胆子大，手段辣，靠万国儲蓄会一套騙錢的鬼把戏竟发了大財，在广大中国人民飢餓哀号声中过着朱門酒肉臭的荒唐生活。他这套騙局当然引起一般外国冒险家的艳羨，大家都想用詐欺取財的方法来捞一把，紛紛掛着洋商招牌办起儲蓄会来。有一个葡萄牙人也想步盘膝和司比門的后尘，在一九二三年九月設立一个远东儲蓄会。他別出心裁地想出一个招徠办法，以五年还本为号召与万国儲蓄会竞争。在一年多時間虽騙取了三十多万元，但因这笔儲款被股东随收随化在短短期間內化得精光，到一九二四年关门大吉，宣告倒閉。儲戶們因遭受了損失，联名吁請軍閥政府向葡萄牙領事交涉。葡萄牙領事有租界为护含糊答复，推諉了

事。又如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有一个西班牙人创办了东方儲蓄会，因期間較长騙取了上百萬的儲款，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停業時，帳上的存款只剩三元三角。到那時外國冒險家的騙錢把戲終於被中國人看穿了，隔了不久，萬國儲蓄會的營業也就漸漸衰落。這些風行一時的儲蓄會顯然是萬國儲蓄會首開其端。在這些人類渣滓的心目中，上海是一塊肥沃的騙錢膏壤。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辦銀行既沒有檢查員也沒有監理員，誰都不來管閑事。只要有一面領事裁判權的特殊國旗做護符，盡可張牙舞爪混水撈魚。人瘠我肥，掠奪人家的勞動果實。現在我們將萬國儲蓄會的畫皮揭穿後，殖民主義的丑惡形相就纖維畢露了。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文史資料辦公室供稿)
上 海 市 文 史 館